THE OBSERVER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一、十六出版・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　・每份售二千元・

第六卷　第八期

向黨幹部的學習高潮看齊（社論）
京滬生產實例反擊了敵人的封鎖（社論）

專論
科學在新時代裏　陶孟和
人民幣的管理本位　劉滌源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階段　陶大鏞

介紹與翻譯
在胡志明旗幟下的越南　薛謀洪

哀思
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台被殺是政治性暗殺的種種事實　李何林

思想與生活
我的思想總結　謝逢我
北京大學一年來的改革和學習　彭越明

觀察通信
記上海解放後肅清特務、盜匪、偷竊以及救火的工作　曹錫珍

人物及事業
解放以後的蘭州　觀察特約記者
蘇聯勞動英雄烏巴伊杜拉耶娃　于夫

觀察文摘
學習了「榮譽是屬于誰的？」以後
給高崗同志　王文鐸
要向前看　方非
站穩自己的工作崗位　雷麗珍
對于榮譽的新認識　吳世昌
工作檢討　鄒再萍

學習資料
「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名詞有什麼區別？
在無階級社會中的社會發展原動力是什麼？
什麼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請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

多購一分公債

多加一分力量

本刊獻出

二百個「三月定戶」

所收訂費購買公債

讀者先生：這次政府發行勝利公債，目的在彌補赤字，穩定物價，支援前線，把革命進行到底。購債運動的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教育意義，使購買公債成爲熱愛祖國和擁護政府的具體表現。本社目前的經濟情況雖然嚴重，但仍舊積極地熱情地來購買公債。

本社除已認購了一定數額的公債以外，特再舉辦訂刊購債運動，獻出二百個「三個月定戶」，把收到的刊費去購買公債。希望讀者響應我們這一運動，在後面規定的日期內，定閱本刊，一方面幫助本社購買更多的公債，一方面自己又定閱了刊物，公私兩利，現將辦法說明如左：

觀察獻刊購債辦法

一、舉辦時間：即日起三月二十日止。

二、爭取目標：二百個「三個月定戶」。（本社內部分配：滬社一百四十個，京社六十個）

三、付款辦法：定戶來函註明「定刊購債」四字，按照本社所定三個月訂費付款。（目前定閱三個月六期收款一萬二千元。）手續與普通定閱相同。

四、訂費購債：本社收到「定刊購債」定戶的訂費後，隨時彙集整數，購買公債，在規定的時期內至額滿爲止。

五、公佈結果：全部結果在四月一日出版的本刊六卷十一期上公佈。

大事記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一月十六日

京市軍管會維護國家主權，收回市內前美、法、荷兵營地產。

新疆省召開財經委員會議。王震司令員報告關於軍隊生產建設的方針與任務。

滇南蒙自解放。

周外長分別電覆以色列、阿富汗、芬蘭三國，歡迎與我建立外交關係。

法人民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爭取越南和平。

一月十七日

毛主席自列寧格勒返抵莫斯科。

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日共領袖野坂參三的錯誤，及今後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

鐵道部在京召開工程計劃聯席會議，討論今年全國鐵路修建工程。

中原臨時人民政府通令所屬各地執行貫徹合理負担政策。

周外長電覆瑞典政府，請其與殘匪斷絕關係後，派遣代表來京談判。

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代表抗議殘匪代表非法出席，退出聯合國三委員會會議。

烏茲貝克人民慶祝國慶，首都塔什干舉行盛大閱兵。

芬總統選舉人團選出，民主聯盟獲六十五席。

世界民主青聯在羅京召開執委會議。

一月十八日

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朱副主席重申解放西藏人民決心。

我照會法外長舒曼，抗議法軍迫害我僑胞。

中國農工民主黨召開中央執監委會議。

周外長電覆越外長，歡迎中越兩國建立外交關係。

艾奇遜發表聲明，擬與佛朗哥締結友好、貿易及航運條約。

耶索普在港宣揚美帝侵略計劃繼續與亞洲及遠東人民爲敵。

蘇聯發表去年經濟計劃總結公報，工業生產已超過今年目標。

保議會選出主席團，授命科拉羅夫組織新政府。

一月十九日

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原陝甘寧邊區政府光榮結束。

周外長照會聯合國，我已任命張聞天爲聯合國首席代表，要求立即開除殘匪非法代表。

保加利亞新政府組成，科拉羅夫任部長會議主席。

一月二十日

周總理抵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談。

政務院舉行第十六次會議，通過河北省府名單，批准河南省土改條例。

海關總署改訂各關名稱。

朝鮮駐我大使李周淵抵京。

新聞總署胡喬木署長駁斥美國務卿艾奇遜無恥造謠。

外部發言人就西藏問題發表談話：如果拉薩當局背叛祖國，我將不能容忍。

蘇聯中央選舉委員會組成，奧希波夫、米哈依洛夫分任正副主席。

日共中央發表聲明，接受情報局對野坂參三的批評。

一月二十一日

列寧逝世二十六週年，各國人民隆重悼念，莫斯科舉行莊嚴紀念大會，斯大林毛澤東等均參加。

鐵路工程聯席會議閉幕，號召提前完成計劃，提高技術。

全總電意大利工會，支援意工人英勇鬥爭，抗議反動派屠殺摩登納工人。

朝鮮政府批准中朝郵電協定。

蘇外長維辛斯基發表聲明，駁斥艾奇遜對中蘇關係的誹謗。

民主德國外長德丁格爾，發表聲明，反對法國吞併薩爾區。

世界民主青聯執委會發表告世界青年書。

一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接見周總理。

黃河水利委員會在開封召開治黃會議。

一月二十三日

重慶召開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蘇代表團抗議殘匪非法代表出席，退出遠東委員會。

列寧格勒人種博物館舉行中國文物展覽會。

保部長會議主席科拉羅夫逝世，保共中央發佈訃告。

一月二十四日

招商局戶輪海玄號在新加坡起義。

聯合國托管理事會非法通過意大利托管索馬利蘭。

拉姆蘇倫繼喬巴山元帥担任蒙古人民共和國外長。

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世界民主青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蕭華等返國。

全國人民電信會議在京開幕。

西南殘匪兩個軍覆滅，偽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就擒。

鐵道部召集全國材料會議，實行企業化與供應負責制。

蘇聯任命別爾烏辛爲部長會議副主席。

巴黎三萬群衆舉行大會，爭取越南和平日。

保京隆重舉行科拉羅夫葬儀。

蘇波簽訂一九五〇年換貨協定。

一月二十六日

美國務院發表「背景材料」製造謠言，挑撥中蘇友好關係。

李克農副外長致電泰政府，抗議迫害我僑胞。

印度共和國宣佈成立，印共號召人民示威罷工，反對「奴隸憲法」。

英共競選活動遭受限制，波立特函艾德禮表示抗議。

法共政治局通過決議，揭穿「法越協定」侵略本質。

（下接第二十四頁）

發行者：觀察社

編輯部：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④一一九六號
電報掛號：六〇三四號

發行所：①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168
電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②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觀察

第六卷 第八期

1950.2.16.

本期作者

陶孟和：科學院副院長
劉滌源：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
陶大鏞：出版總署翻譯局第一處處長
薛謀洪：北京大學研究生
李何林：華北大學國文系主任、教育部秘書處長
謝逢我：清華大學學生
彭越明：北京大學學生
曹錫珍：上海文匯報記者
（後面六位作者都是第一次在本刊上寫稿）

社論

向黨幹部的學習高潮看齊

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已經全部解放，我們的國家在長期戰爭之後，現已轉入和平建設的新的時期。爲了順利完成新中國各項建設的任務，中共中央各地方局連續號召在職幹部加强學習，努力從現有的基礎上再提高一步。由于東北全區解放最早，東北局早于去年五月即指出：在各級在職幹部中組織進行馬列主義理論及中國革命各種具體政策的學習乃是一九四九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去年八月，東北局對于在職幹部學習的內容、組織、領導等問題，又進一步地作了具體的決定。今年一月，中南局和西北局也先後發出指示，號召展開一九五〇年在職幹部的巨大的學習運動，認爲在這和平建設開始的新時期，如其不用大力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知識把在職幹部從理論上、政策上、以至文化上提高一步，即將無法完成重大的各項建設任務。號召在職幹部認眞學習的基本精神是加强理論與政策的學習，從而樹立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用以分析問題，指導實踐。加强理論與政策的學習，乃是提高幹部水平、加强工作效率、克服經驗主義的銳利武器！

一般說來，由于全國廣大地區的迅速解放，各地幹部的情況都發生了一些變化。由于革命形勢的急劇發展，以及隨着此種發展而來的急切需要，新幹部在數量上都有大量的增加。新幹部大都是些年青人，熱情高，進步快，但是缺乏理論政策的基本修養和革命鬥爭的實際鍛鍊。對于這些新參加工作的幹部，假若不以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有系統地批判舊思想，建立新思想，確立革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則將無法堅定其爲人民服務的觀念。老幹部是大都具有了一定的理論政策修養的，但因過去長期處于戰爭艱苦的鬥爭環境中，對理論政策有的還缺乏系統理解，工作經驗也未能完全很好整理，有的還不免存在着嚴重的經驗主義傾向。再加上黨的領導從鄉村移到了城市以後，一般工作重點和業務內容都起了改變，正如毛主席說的：「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也就必須加倍學習，以期逐漸學會並熟悉新的事物。此外還有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一部分人員，他們一般是願意進步的，可以改造的，但必須有組織、有領導地去幫助他們改造，使他們丢開舊思想、舊作風，樹立新立場、新觀點，積極參加爲人民服務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黨號召各地在職幹部認眞學習、堅持學習，開展一個廣大規模的學習運動。

學習的內容，理論部分，以中央規定的「幹部必讀」十二本書爲基礎，並學習毛主席所著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十二本「幹部必讀」學習先後的次序，各地所定的不完全相同，主要是把這十二本書分爲三個階段，爭取在三年以內學完。馬恩列斯論中國和毛主席的著作應分別插在各階段中閱讀研究，以求所學理論密切結合着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政策部分：以中共中央指定的四十四個文件、去年三月二十三日新華總社關于二中全會的報導、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和黨的指示文告、以及新華社、北京人民日報、各地黨報發表的重要文件作爲基本內容，在學習過程中，並應將總路線總政策和各個具體政策加以適當的區別。除了理論學習和政策學習外，文化水平不够一定程度的幹部應補習文化，所有幹部並應就其業務範圍，做什麼，學什麼，提高自己的業務技術的水平。

各地方局都把領導黨幹部進行學習作爲一項巨大的工作任務和政治任務。醫治戰爭的創傷，恢復和建設工作的進行，在在都是極其繁重而複雜的；這一切工作的順利實現，既需要在職幹部充實理論，熟悉政策，並且還需要掌握業務、掌握技術。幹部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直接間接牽連到廣大人民的利益，牽連到革命成果的鞏固和發展，必須使在職幹部在理論、政策、文化、業務各方面加强學習，提高修養，才能順利完成建設新中國的重大任務。

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廣大人民親眼看到人民解放軍紀律的嚴明、戰鬥意志的堅强，幹部的刻苦耐勞、實事求是的忘我

的工作作風，都獲有鮮明強烈的印象：時代是完全變了，我們的社會正在空前的速度下向前躍進！現在又看到大陸戰爭才告結束，和平建設正剛開始，黨就立刻抓緊時機，展開在職幹部的學習運動，以提高新舊幹部的理論政策思想水平。黨這一行動，也就說明了黨是如何正確地在領導着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同時也就保證了，在黨的這樣的正確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必然將獲得歷史的偉大的成功的。

我們廣大人民面對這樣一個情況，每一個人都應當自己嚴肅檢討，在被解放以後的一段時期中，自己究竟有了什麼改變和進步！我們是否已經進行學習，積極地來改造自己？或者多少已經嚴重地意識到，正如上期本刊所列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所指示的：不改造，就落後？我們所面臨的時代事實上是跑得太快了，即使我們努力學習，也常常會有追不上去的感覺，但若我們仍舊漠視無動，我們顯然將不可避免地要被時代扔掉了！歷史是無情的，時代不等我們，必須我們追上時代！

各地區的被解放，在時間上有先有後，因之各地人民的學習和改造的工作，在進展的程度上也有前有後。一般說來，東北要比華北走前一步，華北要比華東中南各地走前一步，華東中南各地又要比西南各地走前一走。走前走後，並不發生嚴重的區別，祇要是在向前進的，就是良好的、正常的現象；停止不進的，就是不良好的、不正常的現象。已在向前進的，我們應當使他一步一步提高，還沒有向前進的，我們應當推動他前進！

除了西南方面的情況還不清楚之外，就我們所知，從東北、華北、西北到華東、中南，一直到極南的廣州，整個的社會都在天翻地覆的向前發展之中。特別是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已解放的地域中都掀起了熱烈的學習運動。各機關每天都經常規定了一定的時間來進行學習，各學校則更精簡課程、改革課程，政治課用大課及小組的方式進行思想改造。本刊本期所列北京大學一位同學的報導和清華大學一位同學的思想總結，就是最好的說明。部隊裏和工廠裏也在同樣的高情緒下進行政治學習。新華、三聯等書店所出版的政治理論書籍的空前大量的銷行，以及「學習」月刊的十幾萬份的巨大發行數，都說明了在一九四九年這一年，特別是這一年的下半年，新中國的人民是如何的投入了學習的高潮之中。

已經進行學習的，應當加緊自己的學習，堅定自己的學習，更有系統地提高自己的學習；還沒有開始、或者還沒有認眞進行學習的，必須立刻開始並認眞進行自己的學習。這一關是遲早要過的，越早過，對于自己，對于國家，都越有好處。在一般的學習情況下，最容易表現的一些偏向，是集中于原則理論，而忽略具體政策；集中于抽象的理論，而不聯系自己的思想生活和作風。前一種偏向的結果是對于大道理都能談得頭頭是道，而處理具體的政策問題，往往常搵不定；後一種偏向的結果是表面上顯得進步了，而實際上仍舊停頓在原來的地方。艾思奇先生在「從頭學起」一文中說，學習馬列主義聯系實際的初步方法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能够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對自己原有的非馬列主義的觀點反對一分，也就是眞的進步了一分。我們每一個人應當在內心裏，用這樣一個尺度來檢查自己的是否眞正有了改造。知識份子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工作，不一定能用一尺一尺來量，有時祇能用一寸一寸或一分一分來量，但祇要是眞進步、眞改造了的，則雖然祇進了一分也是好的，因爲這進了的一分是眞的、實在的。

要保持人民學習的計劃性和經常性，必須建立健全的組織和領導。半年來的經驗說明，在機關、學校、工廠、部隊、企業單位，以及一些群衆團體裏進行的學習工作，成績比較良好。但是，今天還有廣大的人民，由于工作和環境，他們可能還沒有機會那樣密切地和任何一個機關或團體發生聯系，因之他們在學習上將不能獲得緊密的領導和幫助。理想的學習生活，應該使自學與集體討論互相配合，以補不足。假如沒有個人自學的基礎，到參加任何集體的討論都將流于空洞的形式，但是假如沒有參加集體討論的機會，則他將不能得到更高的啓示和更深入的瞭解。集體的力量還大於個人，特別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驗說明群衆的力量是大大有助于個人的改造的。我們相信今天中國廣大的人民都是願意改造自己、力求進步、爲人民服務的，因之，廣大的人民都熱切地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更有組織的領導，以加強自己的學習，加速自己的改造。新型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的社會，我們希望在我們的新社會中，盡可能把每個人都吸引進一定的集體生活之中，使每個人都能依靠集體的力量來更堅強自己。同時，我們希望政府能運用各種方法來領導、幫助一般人民的學習，使廣大的人民在學習中獲得更多的指導。我們現在提出四個建議如左：

一、我們希望各地當局，能够根據當地的具體情况，經常擬訂一個每一月或每一季的學習計劃，指出學習的範圍、步驟、綱[illegible]，以及參考書目等，在地方報紙上公佈，領導一般人民學習；這樣，可以使迫切需要學習的人民跟着政府規定的計劃，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學習。

二、各地當局可以利用廣播，約定專人，編排課程，規定時間，按時廣播，使廣大人民在家裏也能上政治大課。廣播的內容和進度最好能配合當地擬定的學習計劃。約定的人不宜臨時缺席或請人代替，課程內容要先有一個商討，以免重複或深淺度的過分參差。東北局宣傳部已經利用這個方式組織了一次「初級組廣義政治經濟學廣播講座」，瀋陽市委宣傳部也自二月十日起開始「瀋陽市工廠在職幹部學習初級組廣義政治經濟學廣播講座」，他們的經驗可供關內各地參考。

三、我們建議在各地的領導機關或黨報中，設立一個「學習指導委員會」，專門解答一般人民在學習中所提出的問題，幫助人民對於學習的內容有進一步

的瞭解。

四、我們建議在各地設立學習夜校，使不屬於任何機關、學校、團體、工廠等的人民，有參加集體學習的機會。可以按照人民的文化水平，分爲高、中、初、三組，假如限于人力，並可暫定每組每週上課兩次，分「一、四」「二、五」「三、六」等班，這樣就使政府和尚無機會參加任何團體組織的人民得到聯系的機會，透過這種聯系來領導人民學習。

可能還有其他的方式而爲我們沒有想到的，凡是可以加强人民學習的方式我們都應設法運用。我們總的目的是要推動更多的人民參加學習，在今天，非黨幹部要向黨幹部看齊，普通人民要向在職幹部看齊。大家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一步，努力改造，親密團結，來爲人民服務，來爲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京津生產實例反擊了敵人的封鎖

帝國主義者一向有這樣一個錯覺，以爲中國離開了帝國主義者便會活不下去。這半年來，中國的沿海給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封鎖」了，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情形又是如何呢？過去一年京津兩地的生產是給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匪幫們的最好的答覆。

最近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在南京「新華之友會」上就當前中國經濟問題作了一次很長的講演，他在講演中指出：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於克服了十四個國家的圍攻和經濟封鎖以後，終于成爲了世界第一個繁榮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在延安時，胡宗南四十萬匪軍三面圍着陝甘寧邊區，同時又有着日本人的封鎖，那時陝北根本沒有工業，吃飯的筷子和飯碗都要外邊運去，可是努力的結果，終於有了紙，有了布，還煉出了鐵，「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我們完全戰勝了封鎖，到我們從陝北出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一百多個工廠了。」這是說明勤勞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沒有不可以克服的困難的。

南氏在那篇演講中還這樣說：「如果不是國民黨封鎖我們三年，那我們穿的衣服，一定不是難民工廠出的布，而是西安的來貨了；所用的火柴，一定不會是聯足牌，而是丹鳳牌了。走遍邊區，看不到外來的東西，完全是自己生產出來的，是否市場蕭條了呢？延安北六十里的眞武洞村，從前只有四個小攤子，後來發展成爲一百六十多家有門面的商店，還是發展生產後而繁榮的證明。我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陝甘寧邊區的條件，是那樣差，經過短短的幾年尙且變得如此，今天我們大大的不同了，差不多已解放了全中國，有四萬萬多的同胞，有廣大的土地富源，有許多新式的機器，這些機器，現在尙未使用，過去國民黨接收日本人的九千多箱機器，擺在那裏不動，我們有了這些機器，有了地大物博的國土，加上世界上生產力最大的朋友——蘇聯的幫助，這個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有了這些條件，還怕美帝的封鎖嗎？他們遲早是要封鎖我們的，這個關係遲早是要割斷，不如早點割斷好。目前的困難用不着怕，是可以克服的。」（見一月二十九日南京新華日報）

「封鎖」反而幫助我們改造了現有城市的殖民地性質。在這短短的半年中，上海的生產已面向內地，而解放了一年的北京和天津在生產方面更有突出的發展。北京和天津，在去年一年中，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一般說來，公私工業的單位都增加了，職工及產量數字也增加了，工業生產已開始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在正確的工商政策及勞資政策領導下，尤其是私營的某些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重要行業而且有了顯著的發展。這是消滅了官僚資本的限制和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並溝通了多年隔絕的城鄉關係，面對着土改以後和平生產的農村，而使某些重要工業產品獲得了新的銷路的顯著的結果。生產數字雖不如理想，但是趨勢則至爲顯著。

以天津來說，公營工業生產已全部恢復，部分提高了解放前的工廠數字。由於工人階級積極發揮創造作用與勞動熱情，一般生產都有增加，湧出了不少的勞動模範。至於私營工業解放前後的比較，一般已達到解放前正常產量百分之八十。根據本刊上期天津通信中所報導的數字，紡織業在解放前爲二八七家，解放後增爲三三〇家；機器工業解放前爲五七〇家，解放後爲七七五家；電器業由四十六家增爲六十家，化學業由二一七家增爲二四九家，其中特別獲利的是染料工業與橡膠工業，在客觀的大量需要下，有了空前的發展。至於紡織工業和機器工業的輝煌的前途，更是方興未艾。要不是多少受了大水的影響，去年天津工業的發展尙不止此。

從北京來看，也可以看出去年私營工業發展的幾個很顯著的趨向。第一、凡合於城鄉廣大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工業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需要愈多，發展也愈多，如機器鐵工業、麵粉業、織染業等就是；反之，凡是當前廣大人民所不需要的，如洋酒、飾物工業、及迷信品製造業等，則趨向衰落。第二、在同一行業中，用機器生產的趨向發展，手工生產的趨向衰落，如電力機織業發展、人力機織業衰落，機染業發展、土染業衰落，因而在織布業中，有的已由人力改爲電力機了。第三、從商業經營轉向工業經營的趨勢業已開始，比如機織業中就有三家是由商業方面轉過來的，但是還不普遍。第四、與國家貿易機關的聯繫日漸密切，爲國家貿易機關加工的部分，日益增多，如機製麵粉業爲貿易公司加工的部分已由一九四九年三月佔總產量的百分之一七・五，升到十二月的百分之

七十一。第五、小廠家採取聯營的辦法，從分散的小經營聯合爲較大的經營，以提高質量，減低成本，解決了產銷方面的某些困難。

工業生產恢復以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組織起來，從事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在京津的私營工業中，這一點，特別來得重要，一方面是公營企業的領導性，另方面也要有關的部門密切聯繫與合作，逐漸改良技術，提高質量，這樣便打開了銷路，逐步提高了生產。在解放以前，各城市中最感困難的機器工業，在去年這一年中有了空前的發展，從這個例子看，就是由於有計劃生產的結果。

以天津私營機器工業爲例，全市較大的工廠一百一十家中，發展最快的是麵粉、橡膠、及榨油等機器製造業。如去年計產各種麵粉機器八五七台，較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各種橡膠機器生產四十九台，較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國營華北機器公司，去年八月曾組織了一百二十餘家私營機器工廠，承造鐵道部的四十四萬套磁瓶螺絲，在這次的生產中，使原來有五家停工的工廠恢復了生產。再以中華工業社爲例，一九四八年開工時只有六個工人，業務是修配機器，現在已增到三十三人，正提製鄭州察哈爾及大同等地的榨油機器，生產熱情提高，業務日有增加。

以北京私營機器爲例，大小工廠由七百四十五家增到一千零十八家，職工人數則增加了一倍。產品中只水車一項就製造了七千九百多台，超過了解放前年產量四、五十倍。如慈型鐵工廠工人爲完成給鐵道部承造水管的緊急任務，在黨團帶頭下，把兩個半月的工作在一個半月中突擊完成。慈型廠是北京規模最大的私營翻砂廠，有較完善的翻砂廠和三十八部床子，在解放前夕只剩了十七名職工，生產全部停頓，到去年四月，先爲華北水利推進社委託該廠鑄造水車三百三十台（計七十噸），翻砂廠全恢復，工人增到九十人。六月間華北水泥公司委託鑄造生鐵棍二十噸，七月份起得到鐵道部一百五十噸訂貨，工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二人，尙且要加班趕活，方才能夠達到任務。該廠去年全年共鑄造了三百噸產品，其中給公營企業加工二百五十噸，本年度該廠將繼續給公營工業加工，並計劃製造機器，將來並向專業化方面發展，繼續提高技術，成爲恢復與發展的最高範例。

天津中華工業社及北京慈型鐵工廠的發展實例，說明了私營工業發展的道路。機器工業是一切工業的骨幹，以機器代替人力，這也是正常發展的路線。又據一百六十九家私營工廠的統計，過去必須依賴進口的機器原料共有一百四十種，其中機器方面有五十多種和化學方面的十多種已然能逐步自給自足，這是自力更生克服對外依賴的具體表現。

一九五〇年工業生產的任務是什麼呢？北京市委書記彭眞在北京解放一週年的紀念文章中指出：

「首先應當發展公營生產，提高他的計劃性，嚴格實施成本計算，開展生產競賽和新記錄運動。一切公營企業也應該以工會爲代表和工人訂立集體合同，應該進一步完成工廠管理制度上的民主改革，切實改善工廠的管理，並注意工人的福利事業。應該改變國民黨留下來的工資上的平均主義及其他不合理的現象，根據按勞取酬和超額獎勵的原則，調整工資。一切公營企業中的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支部及工會組織，必須把領導職工積極生產、改進生產技術和勞動組織，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

「應該加強政府和公營企業對私營企業的領導，減少他們生產的盲目性，使他們按照新民主主義經濟原則和城鄉人民的需要，來繼續恢復改組與發展他們的生產。過去一年，我們在調整勞資關係、訂立勞資集體合同、供給原料、打開銷路、實行低利貸款和減輕工業稅方面，曾給了私營工業以很大的幫助和便利。沒有這些條件，私營工業是不可能獲得這樣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的，我們應該繼續給他們以應有的扶植和幫助。」

一九四九年京津的工業生產，充分表明了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及自強奮鬥的優秀品質，這個成績也很有力的回答了帝國主義的狂妄態度，——認爲中國離開了他們就活不下去。上述實例無可爭辯的證明了人民已然贏得了恢復生產的初步勝利，特別是私營工業有了很大發展，而且骨幹性的機械工業起了帶頭作用，這樣的事實也就是夠狠狠的給了帝國主義一記耳光。美製的蔣匪飛機連日狂炸上海，上海工商業者應當更認識了美帝與蔣匪的反人民實質。上海工商業者在長期戰爭中早已獲有充分經驗，會用京津一樣的生產實例而向內地艱苦生產，再給敵人的狂炸，作一次有歷史先例的答覆。

科學在新時代裏

陶孟和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起，我們中國的人民，已經踏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我們一切的事物，如思想、制度、事業、活動，都要接受一番新的估價，重新決定它們各自的地位。科學，無論是它的觀點，它的方法，它的工作，它的任務，或是它的成績，在這個新時代裏，也自然要被重新衡量一番，要被安放在一個與前不同的位置。

首先應該提出的，這次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在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是意味着科學的勝利。中國人民革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的基礎在於馬恩列斯的學說與理論，而那些學說與理論，主要的是辯證唯物論，乃是十足的科學的。由於科學的，也就是正確的理論的指導而成功了的革命，當然要承認科學有它的一部分的功績。

在馬克思的時候，歐洲的自然科學研究已經開始旺盛的發展了。自然科學並研究的對象是物質，是自然界。大體說來，自然科學家相信，至少也必須假定，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屬於第一性的現象，乃不依賴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事實。因此他們便想法去了解它，認識它的各現象間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情形，尋出它的發展變化的規律。自然科學家們，至少在他們自已研究的範圍以內，承認物質現象是眞實的，他們研究的觀點與方法都是科學的，他們是唯物主義者。哲學唯物論是科學發展的基礎。馬克思，正如列寧所說的，則「充實與發展了哲學唯物論，以致達到完善無缺的程度，並把唯物論對自然的認識發展到對人類的認識上去。」馬克思是一個唯物論者。因爲他在探討人類社會，探討人類社會裏的思想、理論、觀點、制度的來源的時候，他與唯心派的學者們不同，並沒有向思想、理論、觀點、制度本身上去找尋，他却在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裏，在社會存在裏去追尋。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哲學唯物論者，他還是一個辯證唯物論者。因爲他觀察人類發展的現像，由他的時代裏資本制度的發展過程，看出它的實際的矛盾，一方面，生產是社會合作的，而它方面，分配是個人主義方式的，產生了資本的、剝削人的與無產的、被剝削的兩階級的對立，演出了資本競爭以及繼續不已、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促成了資本制度的傾覆，最總必然引進了社會主義的實現。由此他發見了由矛盾對立中產生新的發展的基本原則。這是辯證唯物論的看法。然而辯證唯物論不單是一個看法，或一種哲學，它的重要性，它的最可寶貴的特色，乃在它同時是一種行動的綱領。辯證唯物論的中心觀念是變化，不單是對變化的認識，不單是了解如何變化，還要知道如何造成變化，如何使變化出現。因此在觀察或研究一種現像的時候，不單是要了解它，明白它，能夠透澈的解釋它，同時還必須要知道如何影響它，支配它。對於任何現象及其發展的認識是必要的，然而僅有認識是不夠的，僅僅對於一種現象及其發展得到一個科學的、清楚詳盡的敘述，並不能認爲滿足的，因爲認識或敘述本身並非目的，它祇可供給行動的一個根據。科學的方法及科學的成果能供獻解決更爲一般性的問題的資料罷了。由此可見，馬克思已經還超過他的時代的科學家的階段，他爲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不僅僅線於觀察與敘述，他更深入的分析人類進步的內部關鍵，這個關鍵就是發展的前一階段的內部矛盾，以期能夠支配它，統率它。馬克思認爲僅僅得到些關於過去的知識，得到許許多多學院式的、教條式的、與實際不相干的知識是不夠的，他要利用那些知識做更重要、更根本的事情，就是，根據那些知識來做對現在，對未來，實際活動的讀論。因此，辯證唯物論不單是思想的哲學，同時它還是行動的哲學。這是馬克思首創的、獨特的、最偉大的貢獻。

因爲辯證唯物論不單是思想的，同時還是行動的哲學，所以馬克思思想的偉大的貢獻不單是在思想上、理論上掀起了一個大革命，更重要的，還在它的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做了人類行動的指南針。像它曾經勝利的指導了蘇聯的革命、建設與發展一樣，它已經指導了我們成功了人民解放的革命，它今後必然還要繼續指導我們進行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以及它的邁向社會主義的前途無限的發展。由此可見科學的辯證唯物論所居的地位的重要了。雖然，辯證唯物論本身畢竟不是科學。它既不能代替實驗的方法，它又不能代替實驗上所需用的任何工具，它也不能代替邏輯上的推理與證明。可是它却在極重要的方面補充了科學本身的不足；它不像任何專門的科學一樣，陷於一個專門的狹隘的看法，它使人知道如何聯繫若干科學的組類，它指示科學家以新的實驗與發見的途徑，同樣的，它使人瞭解現像間的相互聯繫、相互聯繫的情形，尋出變化發展的規律，進行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是對於科學上極重要的貢獻，這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由研究社會現象得到的結論貢獻給整個科學的領域的。

在過去，人們常說現在已經進到科學的時代了。嚴格說來，這句話完全是不正確的。唯有人們能夠澈底的採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及方法去觀察、研究、整理、改革社會現象及自然現象的時候，才可以說眞正的進到了科學的時代。在人類能夠應用辯證唯物論的鑰匙探討人類現象、宇宙現像以前，我們根本不能承認爲科學的時代。過去所謂科學的時代與我們今日所說的科學的時代，意義不相同的。這個，可以由幾方面觀察。

第一、過去的科學家的思想與觀點常是機械的唯物論，而不是辯證的唯物論。因此他們的科學研究常變爲玄妙的、神話式的抽象概念，他們根據那些概念，使宇宙的萬千現象歸宿成爲若干獨立、不相干的抽象的範疇，終至莫可究詰，至甚乞靈於上帝。近年來，有些有名的科學家，如物理學家愛丁頓、天文學家詹斯，便都走上了這條不通的道路，這種看法乃是玄學的、唯心主義的、神秘主義的、根本反科學的。一個產生這樣科學研究成果的時代，如何能稱爲科學的時代呢？依據辯證唯物論的看法，要充分的了解宇宙，並不是造出一個抽象的系統或抽象的理論以說明或解釋經驗上所尋到的情況。了解宇宙，或任何現象，乃是利用最高科學化的經驗，就是將所研究的對象，發展成爲精細高深的科學知識，只由那些科學知識本身，只由那些嚴格的、純粹的科學概念，不必藉助於抽象的概念或玄秘的系統，也不必乞靈於神靈，便可顯示它們的內部聯繫及其發展。這才是眞正的科學，唯有在如此探討科學的時候，才可以說進入科學的時代，才可以充分的發展科學。

第二、過去的科學是帶着階級性的，是保守的，是維持原狀的，是偏於靜態的。現在的科學與之相反，是變化的，是行動的，是打破現狀的，是動態的。一個是受社會束縛的，一個是與社會相携並進的。在過去封建制度資本制度的社會裡，人類常按財富權力分爲若干階級，於是那些享有特權的人們便爲他們的階級的利益，努力維護固有秩序，保衛原有制度。這樣的社會對於科學的研究當然發生了深厚的影響。因此過去的社會科學裡便充滿了階級利益的與維持原狀的概念與理論。自然科學本身雖然不一定反映階級的利益或保守的性質，但至少它的成果主要的還是用來保護特權階級，增進它的利益。自然科學的應用，在過去兩世紀裏雖然曾經在世界上造出了空前的劇烈變化，但是如果評定這個科學應用的功罪，如果要追問它有幾分是增進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有

幾分是加强財富權力的不平等，有幾分是增長工農大衆的福利，有幾分是在擴張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權利利益，就是最寬厚的評價，也只可說是功罪參半的。封建制度或資本制度下所產生的科學不可能不染上那個制度的色彩的，不可能不帶上階級性的惡影響的，不可能不變成頑固的、保持原狀的。因此，自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的發展便一天一天的與社會脫節而不相結合，一天一天的與不合時宜的畸形發展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相容。因此，有些人竟說現在社會上、世界上一切的擾亂都是科學的進步所造成的。假使科學沒有達到現在的進步，便不會發生像今天的社會與世界的紛爭不寧。於是有些人竟高唱停止科學研究若干年的怪論。他們說，科學的進步太快了，不是社會的發展所能追隨的，因此科學應停止發展，以等待着社會的進步。這類荒謬的見解充分的反映了過去社會制度保守的觀念，也就是維持原狀的頑固的勢力。要知過去的社會不安，世界紛爭的根本原因，決不是科學的前進，而是社會制度的停頓不前，決不是科學的進步，而是社會制度的頑固不變。英國物理學家貝爾納說的好：「資本制度產生了科學，然而科學卻使資本制度變爲多餘無用了。」在新時代裏，科學不再受過了時的社會制度的束縛，不再爲那維持社會原狀的任務。相反的，它一方面要促進社會的變化與進步，另一方面要受社會的刺激與鼓舞，加强它自己的進步，勝過以先的任何時代。

第三，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新時代裏的科學與過去的不同。在過去的階級社會裏，與權力及財富相交叉的，還有勞心與勞力的階級差別。「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兩者的貴賤高下是顯然的。於是社會裏便產生了所謂勞心者的一個階級，他們專門的任務在製造思想理論，或玩弄文字藝術，他們看不起體力的勞動，他們也不肯從事任何行動。他們的活動限於文藝思想的領域。這些勞心者雖然不必屬於擁有權力財富的階級，但是因爲他們要依附那個階級而生存着，兩者的利益便自然而然的結合一致。於是他們便用許許多多玄妙的、形而上的、神話體裁的思想、學說、理論，那些他們最善於玩弄的把戲，以擁護既得權利，以保衛固有制度。於是他們便讚揚他們的技能，造出文藝的作品，以娛慰他們所依附的階級，以頌揚它們的尊貴。勞心者主要的人物，在中國過去便是儒者、士大夫，在有些國家裏，便是僧侶。到了後來，便是所謂知識階級、學者、文藝人士、科學家，都屬於它。在勞心勞力兩階級相對立而分別高下的時代裏，科學，系統的科學知識，簡直無法開展。因此，在古代希臘，在我們中國長久的歷史期間，科學雖然顯露了萌芽，卻始終沒有能生長出來。一直到了科學發達以後，這個勞心勞力區別的傳統觀念依然變相的在各方面殘存着，它的一個最顯明的表現就是科學的理論與應用的分立。在過去，人們通常將科學分爲理論與應用兩個部門，以爲兩者雖然是相連的，而不必一定要相連的，就是研究科學理論的人不必管實際，或者竟不屑於管實際。他們認爲他們的任務在研究科學上基本的、高深的問題，在明白自然，在了解宇宙，並不在控制它或支配它。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受了過去封建社會裏勞心勞力對立的影響，一部分的勞心者，即不事生產、永遠不從事手足勞動的有閑階級站在它的立場所應有的主張。不待言，這主張完全是錯誤的。按辯證唯物論，理論與實踐是統一的，是分不開的，缺一不可的，二者缺少一個便失去科學的意義。科學的發展可以說是倚靠着理論與實踐的鬥爭。新的理論便是正，新的事實便是反，如何使理論說明或解釋新的事實，如何使新的事實修正舊有的理論，乃一番鬥爭的工作，結果成爲綜合。這個綜合表示出一個新的理論，一個新的實踐。科學在如是循環不已的程序中，繼續獲得進步。科學理論與應用的密切相依在蘇聯的科學與工業技術的關係上可以最清楚的看出。在那裏，一方面工業因爲科學，即科學理論的知識，能夠很快的解決生產上的許多問題，能夠由科學方面提供新的生產程序：另一方面，科學理論的研究，能夠從工業技術方面，即生產方面，得到大量的、充分的經驗，得理更嚴密的組織，因此便能夠在研究上進行大規模的、工廠式的實驗，更重要的，科學研究可以由實際問題得到靈感，可以由努力解決實際問題裏，得到工人們的知識的合作，這些都是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裏所找不到的。在蘇聯，科學與產業便是如此的相携並進齊。總而言之，科學的理論與實踐永遠是統一的。從每個基礎科學裏，可以藉出可以實用的，可以應用的，而實際的需要對於科學的研究乃是一個極有力的刺激，是以在基礎科學的領域裏，引起新的問題的發見與解決。

第四，隨着辯證唯物論的採用，不但是科學的觀點與性質，如上所述，完全改變，就是科學研究的組織，也必然要有一番澈底的變革。在過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科學研究是由社會的及經濟的需要決定的，是靠着社會上的物質的條件的，是受它的限制的，因此科學各部門的研究常是科學家們偶然的選擇的，常是缺乏統籌的、總括的、計劃的。至於科學研究的成果，它的在社會裏的應用，以及它的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則常在發明或發見長久期間之後。在過去，自最初一個科學問題的探討到最後那個科學問題探討的結果得到充分的應用，常須一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這乃是在過去社會裏當然的現象。在資本制度的社會裏，科學研究與一般的生產事業一樣，是放任的，是個人主義的，是缺之計劃的。同時它又不與實際相結合，不與人民生活相配合。因此，科學的進步是遲緩的，而科學的應用比起科學本身的進步還要推緩一個世紀以上。到了戰時，因爲戰爭上迫切的需要，科學研究與實用，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也不得不加强組織。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們看見英美兩國都成立了戰時的科學組織，在科學方面協助戰事的進行，計劃戰爭的勝利，使它們的科學家各按其所專門的科學，參加那個總的科學組織，或軍事的任何單位，發揮他們每個人最大的技能，這些科學家的努力——自天文學者至地質學者——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會有偉大的不可泯沒的功勳。由此可見有計劃的、有組織的、與實際相配合的科學研究，能夠如何很快的、有效的獻出它的成果於社會。但可惜，在一個日暮途窮的資本制度的社會裏，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科學研究，在平時是不能實現的。要擬定一種科學研究的計劃不能不顧到它所在的社會的情形，於是便不能不對於那個社會做一個分析。唯有先做出一個社會的分析，才可以決定科學在那個社會裏扮一個什麼角色，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並且如何扮那個角色，如何發揮它的作用。按着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分析，以計劃科學的研究，要處處，照顧到資本家的利益、階級的利益、私人贏利的生產、以及不合理的分配等等，乃是不可能的，不相爲謀的。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約是一九三五年光景，英國的科學家們，如生物學家赫胥黎，便提倡過計劃的科學研究，但是無計劃的社會與有計劃的科學研究畢竟是不能並容的。計劃的科學研究並非空中樓閣，必須與整個社會結構相聯繫的。在一個沒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如英國，要建立一個合理的完整的科學研究計劃乃是不可能的。所以後來像貝爾納教授便認清此點，他在他的討論科學研究的大著作「科學的社會功用」裏，便大大的稱讚蘇聯的科學研究計劃，從此他便確信祇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祇有在如蘇聯那樣的國家裏，才可以發展由社會決定的科學研究計劃。

蘇聯三十年來科學的發展，可以做爲中國科學在新時代裡發展的榜樣。蘇聯的科學家們，在短短的一代裏，完成了雙重的任務：一方面，他們在帝俄時代所遺留的一個脆弱的、無根基的科學基礎之上，建設了、發展了一個極廣大的、互相聯繫的、與國計民生相關切的科學研究組織，另一方面，他們使科學伸入工業、農業、醫藥衛生，解決它們無數的問題，因科學與勞動、與生活的接觸，遂能將科學普及於廣大的人民，使原來千萬的文盲今日變爲千萬的科學家。蘇聯的科學家們編製科學研究計劃的時候，並不是隨着自己的興趣，或者根據個人的、本位的利益決定的，也不是將若干不相聯屬的題目排列而成爲計劃的。他們確是察明若干科學裏所需要迫切探討的問題，將它們聯繫成爲一個整的計劃，做爲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的目標。同時，這些問題還與工業、農業、醫藥衛生諸方面發生着許許多多的聯繫。這樣的科學研究的組織與計劃，祇有在馬列主義的國家裏，才能實現，祇有根據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才可以造出。這顯然是我們今後發展科學所應走的途徑。

最後，在一個廣大的、互相聯繫的科學研究計劃之下，像過去所常見的科學家的門戶之見，科學的本位主義，各種科學分別高下等級的觀念，都要一掃無餘。科學是一個整體，科學的各部門各有其重要性，各有其用處，不能說那一門科學是高的、是基本的，那一門是低的、是次要的。自人類歷史或社會發展的廣大運動方面看來，科學的各部門都有它的功用，各有它的承待探討發展的問題。由這一方面看來，即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領域，有時都極難劃分清楚。例如關於營養問題、衛生問題、土壤保持問題、土地利用問題、水利問題、技術發展所引起的失業問題等等，便極難嚴格的說屬於社會科學，還是屬於自然科學，因爲它們與兩方面都聯繫着，它們進入了兩個領域。我們在探討這些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們不能認定爲自然科學的或社會科學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求兩方面的探討，兩方面的密切合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如過去所常討論的社會科學是否爲科學，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屬於同一範疇等問題，都變成爲無意義的了。

人民幣的管理本位

劉滌源

「人民幣是採管理本位，不以金銀爲準備，而以全國流通中的物資爲準備。」在人民幣誕生之初，即已對這爲人民服務、執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底積極的新貨幣，明確地規定了它的本位制度和發行準備制度。但是，究竟什麼是管理本位？英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管理本位和我國的管理本位有些什麼區別？「以全國流通中的物資爲準備」——這種準備制度的具體內容如何？「不以金銀爲準備」，是否會有礙於人民幣的健全性？這種新的貨幣制度究竟具有些什麼優點？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我們對人民幣管理本位的認識。本文目的即在通過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討論和解釋，藉以闡明人民幣管理本位的特質和優點。

一　管理本位底一般的內容

管理本位最初出現於英美資本主義社會，它是金本位制度崩潰以後，繼之而起的一種貨幣制度。也可以說，它是相對於金本位自由放任制度而定出來的一個名詞。所以，在討論管理本位的內容時，應該把前此的金本位制度對比地加以觀察，以期了解的更加明確。

金本位的主要特點是用自由兌現、自由鑄造、自由熔毀、及自由輸入輸出的辦法，來使本位貨幣的價值與一定量的純金保持等價關係。幣值與一定量的純金間的等價關係，是通過黃金流動所發生的自動調節作用來保持的。對內的自動調節作用，使國內流通的貨幣數量，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如果貨幣太多，則由貨幣名目價值與實質價值的乖離，使現有貨幣被熔毀一部分；在另一方，如果貨幣太少，則民間會把金塊送入鑄幣廠請求鑄造貨幣，使貨幣數量有所增加。同時，對外的自動調節作用，以國內物價與國外物價的關係爲契機，由貨物輸出或輸入的變化，使黃金輸入或輸出，來調節國內的貨幣數量。這樣，對內與對外兩種自動調節作用，使鑄幣的名目價值與實質價值趨於一致，保持幣值與一定純金量的等價關係。

管理本位則放棄了金本位的這種自動調節作用來保持幣值安定的基本方法。對貨幣數量採用各種政策去加以管理，進而求貨幣價值的安定。這樣，過去金本位貨幣價值與一定量純金間的等價關係，在管理本位下已不再存在了。管理本位制度中，貨幣價值不再是一定純金量，而是對一般物資的購買力，由一般物價水準去體現出來；國內流通的本位幣，不再是金鑄幣，而是不能兌現的紙幣

；貨幣自由鑄造、熔毀、及黃金自由輸出入已經取消；政府對貨幣數量積極地用各種政策加以管理，不再採取過去自由放任的態度；過去金本位中貨幣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是會趨於一致的，現在則會彼此乖離，很難做到二者同時穩定，而只能穩定其中一種價值，讓另一種價值在一定限度內自由波動。

從上所述金本位與管理本位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知道：管理本位是根據國內物價水準的動態，用各種政策去控制並調節貨幣數量，藉以維持貨幣價值的一種貨幣制度。在這種本位制度下，政府對貨幣問題的基本態度，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任其自動調節，而是用積極的指揮和管理，去維持貨幣制度的運行。相對於金本位制度而言，管理本位實爲發展到了較高階段的一種貨幣形態。在這種本位制度中，貨幣價值的含義、本位幣的形態、貨幣與黃金的關係、以及維持貨幣價值的基本方法，都與過去金本位制度根本不同，而有了新的內容。

二　管理本位的兩個範疇

在上節中已經指出了管理本位的一般的內容。現在我們要問：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本位與我國人民幣的管理本位，究竟有沒有區別？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本位與我國人民幣管理本位，實爲在本質上彼此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不容許混爲一談。要徹底明瞭我國人民幣管理本位的特質和內容，必須了解管理本位兩個範疇的差異。這種對比的分析和解釋，使我們對人民幣的本位制度有更確切的認識。英美管理本位，與我國的管理本位的差異，可分下列四方面去觀察。

第一，從貨幣的階級本質方面看。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具有兩重資格：一是當作純粹貨幣用的貨幣，即克盡價值尺度交換媒介等一般性能的貨幣；一是當作資本用的貨幣（即貨幣的資本化），即資本家用作剝削勞動階級去累積資本的貨幣。（參考資本論卷一第四章）純粹的貨幣固然使人民營經濟生活時得到不少方便，但資本化的貨幣成爲資產階級刻毒地榨取無產階級，並掠奪殖民地人民的搜括工具。基於這種階級本質，英美貨幣是爲剝削階級服務的，是資產階級鞏固政權和剝削人民的重要武器。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這個國家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任務與英美資本主義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中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雖然仍舊存在着剝削關係，但成爲「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的領導力量」的國營經濟，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此外合作社經濟及個體經濟，基本上已沒有剝削關係的存在。同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剝削關係的經濟，將逐漸減輕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而最後歸于消滅。所以，新民主主義經濟在本質上是和英美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不同的。人民幣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有機的一環，它是幫助新民主主義經濟繼續向上發展的重要槓桿之一。所以，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階級本質規定了人民幣是一種爲全國人民謀福利的工具，雖然它仍殘存着「當作資本用的貨幣」的若干成分，但基本上它已不是爲少數資本家剝削勞動大衆、去積累資本的血腥利器，而是以「純粹的貨幣」的資格去克盡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工具、及儲藏價值手段等職能，去爲人民服務的工具。

第二，從貨幣政策的基本目的方面看。英美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已達極端尖銳化的境地，大量失業經常存在，生產量長期而且大量衰退，經濟危機的爆發爲時已很迫近。英美資本主義貨幣政策的基本目的即在於延遲經濟恐慌來臨的時機，並和緩這種恐慌的程度。換言之，他們在維持現有剝削的生產關係的前提之下，枝枝節節地用貨幣政策去增加就業量，去維繫生產力，他們不求生產力有大的發展與增長，只求維持已有的生產力使其不衰退過度而已。我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已經不再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新民主主義經濟使新從舊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能飛速而長足地發展與增長。我國新民主主義貨幣政策的基本目的，在於發展和提高生產力：第一步在恢復戰前的生產水平，醫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多年來搜括和破壞所引起的瘡傷，使百孔千瘡的國民經濟迅速地復蘇過來；第二步在恢復了的經濟基礎上，進一步求生產力的大量發展，爲社會主義經濟奠定鞏固的基礎。英美貨幣的基本目的是在現有的剝削的生產關係下去維持生產力，使其不衰退過度，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苟延殘喘。我國人民幣的貨幣政策，是以發展生產力爲第一要着，人民幣成爲輔導生產、改善民生、促進累積、加速擴大再生產底極重要的因素之一。英美貨幣政策卻是反動的，成爲資本家阻礙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兇器，我國貨幣政策卻是進步地爲發展生產力服務的重要槓桿。所以，對於生產力與國民經濟的向上發展而論，英美貨幣政策具有壓抑性、保守性和反動性；而我國人民幣的貨幣政策則充分具有助長性、進步性和革命性。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所賦予舊型管理貨幣的基本任務，與新民主主義經濟所賦予新型管理貨幣的基本任務，彼此根本不同。

第三，從管理貨幣的方法方面去看。在管理本位制度中，貨幣價值的安定不能再如金本位時代一樣，依靠自動調節作用去維持，而須由政府採取積極的管理方法去維持。英美管理貨幣價值的方法，是以金銀爲發行準備，通過發行準備去控制並調節管理貨幣發行數量，進而維持貨幣價值。在正常的狀態中，他們不直接管理物資，所以他們對於貨幣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的維持，基本上都不採直接管理的方法，而是只採間接管理的方法。英國現雖繼續採取戰時管制外匯和對外貿易的政策，但他們認爲「自由」是此種政策的最後目的，此種政策只是一種恢復國內經濟和改善國際收支的手段，等到時機成熟，此種過渡性質的管理政策即須放棄。我國人民幣的管理方法與英美者完全不同，我們底管理方法的基本原則是：「不以金銀爲準備，而以全國流通中的物資爲準備」。這就是說，我們不採取用貴金屬爲發行準備，藉發行準備去調節發行數量，進而維持貨幣價值的間接管理方法；而採取直接的管理方法，即一方面藉健全的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去嚴格控制發行數量與金融動態，另一方面採取健全的

物資政策，對現有物資加以嚴格而合理的管理，同時努力發展生產，去鞏固人民幣的物質基礎。這種直接管理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內容是非常複雜而豐富的，而且這些方法彼此間的配合和聯繫是非常緊密的。爲求條理淸楚起見，茲將人民幣的管理方法表列如左：

人民幣幣值的管理
- 基本原則
  - (一) 不以金銀爲發行準備，而以全國流通中的物資爲準備。
  - (二) 以貨幣對內價值爲管理的直接和主要對象，即以穩定物價水準爲主要任務；對外價值隨對內價值而機動調整。
- 具體方法
  - 對內價值的力求安定
    - 直接控制發行與金融
      - 財政政策
        - 厲行節約，並努力經濟建設與發展生產。
        - 公平合理的租稅政策。
        - 健全而富建設性的公債。
        - 謹愼的貨幣發行政策。
      - ……(兩者間的聯繫)……
      - 貨幣與金融政策
        - 機動調節的利息政策。
        - 保障存戶利益的折實儲蓄。
        - 嚴格管理金融，取締投機。
        - 獎勵與扶助生產，疏導流通。
    - ……(兩者間的聯繫)……
    - 直接管理物資—物資政策
      - 物資的生產
        - 領導力量的國營經濟。
        - 其他四種經濟形態。
      - 物資的流通
        - 國營貿易公司調節並控制市場。
        - 私營商業之管理。
      - 交通運輸與其他。
  - ……(兩者間的聯繫)……
  - 對外價值的機動調整
    - 嚴格管理對外貿易，限制輸入並獎勵輸出。
    - 嚴格管理外匯，並機動調整匯率。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採行嚴格而健全的財政金融政策，直接而有效地保證貨幣發行的嚴謹和金融活動的正常；同時另一方面採行週密而靈活的物資政策，直接而全般地控制和運用物資。這樣，不論是對於貨幣或對於物資的管理和控制，都是直接的、全面的、嚴密而有效的。這就是人民幣的物資基礎。政府有健全的財政金融政策，可以保證貨幣不致濫發，金融鬆緊可以調節自如，自然用不着要以金銀爲準備。同時，政府有方法有力量來直接管理並運用全國物資，所以能用這些物資來充準備，以保證貨幣價值的安定。英美管理本位的方法是間接的、局部的、鬆弛的；我國管理本位的方法是直接的、全面的、嚴密的。這是兩種管理不同的主要特徵之一。

第四，從任務的能否完成方面看。英美資本主義垂死階段的經濟，規定了英美管理貨幣的內容和任務。這種管理貨幣是以枝節而不對症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政策，去彌縫資本主義經濟總危機所表露出來的破綻。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也規定了這種管理貨幣任務失敗的必然性。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並未充分好轉，失業仍舊大量存在，生產力普遍低落。這就證明英美管理本位必然的無法完成其解救經濟危機的任務。英美管理貨幣與英美資本主義經濟將以同一命運而趨於崩潰與消滅。在我國人民幣的管理本位方面，新民主主義經濟規定了這種新管理本位的內容和形式，它的歷史任務是當作新民主主義經濟底重要槓桿之一，扶助生產力之發展，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資基礎。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富有新生力量的經濟體制，成爲其重要槓桿之一的管理貨幣，自然也力量充沛，能充分的發揮效能，完成這光榮的歷史任務。

綜括的說，現階段英美資本主義經濟規定了英美管理貨幣的特質和內容，我國新民主主義經濟規定了人民幣管理本位的特質和內容；經濟體制的兩種範疇使管理本位成爲截然不同的兩種範疇。兩種管理本位貨幣的階級本質、管理方法、基本任務、以及完成任務的可能性，彼此完全不同。貨幣制度方面的這些差異，實由兩種經濟體制各有其不同的特質和要求所規定出來的。所以，在字義上及一般的內容上雖同爲「管理貨幣」，但彼此所依存的經濟基礎不同，所担當的任務和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同時管理方法也不同。把貨幣制度和經濟制度聯繫起來觀察，貨幣制度的特質實由經濟制度所規定出來的；所以，管理貨幣兩種範疇之差異性，實由兩種經濟的體制的差異性所派生出來的。

三　不用金銀爲準備

在金本位時代，紙幣不過爲金鑄幣的代替品，故須有較大量的現金準備以充兌現之用。所以當時金銀準備之基本作用在於兌現。到管理本位時代，紙幣成爲無限法償的本位貨幣，兌現已不存在。但是，在英美管理貨幣制度下，金銀準備仍成爲其重要的部分。金銀準備在英美管理貨幣中的基本作用可分下列兩方面去觀察：第一，金銀準備爲應付國際收支的最後防線，對於維持貨幣對外價值起很大的安定作用。第二，在對內價值之維繫方面，現金準備對貨幣數量有一種限制的作用，因現金準備無法自由的大量增加，能藉此防止紙幣的濫發，同時，利用一般人民對於黃金或白銀底傳統的迷信觀念，來增強人民對於紙幣的信仰，使貨幣流通速度保持正常狀態，免貨幣價值跌落。他們無法直接管理物資，他們無法把全國物資直接地成爲貨幣的物資基礎，不得不利用現金準備來做調節貨幣數量的工具，來做間接的、局部的、和鬆弛的管理。我國政府能用健全而有力的財政政策、貨幣與金融政策、及物資政策，一方面能保證發行的絕對謹愼，並使人民幣的發行數量和生產緊密地聯繫起來，大體上是根據生產狀況和流通需要來決定和調節發行數量；另一方面政府能掌握與管理物資的生產與流通，使人民幣的物資基礎堅強有力。政府既有力量來充分控制和調節發行，而且發行與生產相結合，則我們已有更有力的方法來控制發行，用不着藉金銀準備來完成此種任務。我們有更有效的直接管理貨幣的機構，自然應當放棄以金銀爲準備底軟弱無力的落後辦法。不

以金銀為準備的理由，此其一。

我國既非產金國，又非產銀國，國內金銀存量也不豐富。假如以金銀為發行準備，則勢必發生下列諸種惡果：

（一）假如以金銀為準備，則人民幣誕生之始即須大量搜集貴金屬，這是一大負擔，而且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國內貴金屬的生產與存儲既少，勢必向國外去借去買。這樣，就使人民幣的獨立自主失掉了保障。

（二）假如以金銀為準備，則貨幣數量即受現金準備底不合理的硬性限制，無法按一定原則而自由調節。這樣，現金準備成了人民幣的枷鎖，此種枷鎖勢必使人民幣支援戰爭及促進生產的任務無法順利完成。

（三）金銀價格有國際性，貨幣價值易受國際金銀市場價格的影響，使管理更加困難。同時，貨幣與金銀有國際流通性，假如以金銀為準備，則政府勢必分出一股力量去阻截國內金銀的外流。這樣，人民幣和國際金銀市場保持關聯，徒然使人民幣暴露於資本主義金銀集團之前，遭受不必要的侵襲。

（四）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惡性通貨膨脹的搜括政策，培育了許多人重視金銀的反常心理，在這種反常的心理基礎上，使金銀投機在過去能夠滋長蔓延。假如以金銀為準備，使人民幣對於金銀的依存性增大，勢將使民間重視金銀的反常心理更形穩固。金銀投機對於人民幣的危害性，也將繼續存在。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人民幣的管理本位自始即根絕對於金銀的依存性，一方面對外能確保貨幣與經濟的完全獨立自主，免受國際資本主義金銀集團的侵襲；另一方面對內能逐漸消除民間重視金銀的變態心理，鞏固人民幣的信任，並使人民幣能按一定原則自由調節發行數量，不受現金準備的硬性限制。不以金銀為準備的理由，此其二。

我們不用金銀為準備，不僅減除了搜聚金銀的負擔；並且將國內所產及所存金銀有利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用途。將金銀外運去換取外匯，輸入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各種物資，即為國內金銀最有利的使用方法。這樣，使在英美管理貨幣死藏於金庫中成為國民經濟一大負擔的金銀，到我國新型管理貨幣之下，即變成對國民經濟富有助長作用的資源。不以金銀為準備的理由，此其三。

總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革命性和完整性，締造了人民幣不用金銀為準備的可能性。假如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各種健全、嚴密、正確、而面面俱到的經濟政策，則人民幣是無法主觀地擺脫於金銀的依存性的。惟有在我國這種新型的經濟體制中，才使這種不用金銀為準備的新型管理貨幣，能夠誕生、成長、而日益發展與強大有力。所以，對於不用金銀為準備一事，我們不能孤立的去看，必須從人民幣與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有機關係去聯繫起來看。人民幣不以金銀為準備，確有許多優點；但是，惟有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這些優點才有具體實現的可能。丟開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整套體制，「不用金銀為準備」的管理貨幣，是不可想像的。

四、結論

貨幣是一種富有階級性的歷史產物。各時代中，以及同一時代的各階段中，貨幣制度的內容和任務，是由社會發展規律所規範出來的。從上面所述管理本位的一般內容，人民幣管理本位相對於英美管理本位所具有的各種特質，及不用金銀為準備的種種理由，歸納起來，人民幣管理本位具有下列諸優點：第一、它是完全獨立自主的貨幣；它絕對不是任何帝國主義貨幣集團的附庸品。第二、它是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利器，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種重要槓桿；它絕對不再是為資本家剝削勞動大衆的血腥兇器。第三、管理方法是直接的、全面的、科學的、和富有革命性的。它不再採間接的、局部的、和落後的管理方法。第四、不用金銀為準備是完全符合經濟原則的，從此貨幣形態超脫了金銀的束縛，使金銀能為新民主主義經濟而服務，人民幣不致成為金銀的奴隸。第五、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完全符合社會發展原則的。人民幣在這種革命的經濟體制中擔任着瓦解反動的經濟和貨幣體系、支援解放戰爭、和扶助並發展生產等任務。這種艱難的三項光榮任務中，現已基本上完成了前兩項，第三項任務現正逐步發開，成為人民幣今後的主要和中心任務。儘管人民幣在擔當這些任務時，會遭遇着或大或小的許多困難，但必能有辦法來加以克服。所以人民幣是必能勝利地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賦予的任務的。

一九五〇、一、三〇、珞珈山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階段

陶大鏞

一、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大轉變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必然會暴露出它的腐爛性、寄生性和畸形的發展不平衡性，它集中表現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開始否定着自己的存在，它已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了。

具體說來，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一個歷史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時期開始的。因為，「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頁二六〇），它使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動搖，而開始走上了崩潰之路。所以，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使世界經濟分裂為兩大體系（舊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和新世界的社會主義體系），就是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決定性的表現。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全世界的一切事變，都貫串着兩大體系的鬥爭。這次大戰後，「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的排列是出現了。」（日丹諾夫演辭，一九四七，七月）一方面，是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另一方面，則是蘇聯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戰爭剛停下來，由於軸心帝國主義（德、日、意）的解體、英國獨佔資本主義的貧困和西歐資本主義的脆敝，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是大大削弱了；同時、由於蘇聯國際威望和經濟實力的增長、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已使民主陣營的力量，有了空前的膨大。如果說：上次大戰後，人類歷史開始由資本主義的舊世界轉變爲社會主義的新世界；那末，這次大戰後，就加速了這一個行程——一面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崩潰，另一面則加速了社會主義的成長。

這就是戰後世界的基本形勢。到今天，更由於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全面勝利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逼於眉睫，顯然已使這一個基本形勢繼續向前推進了一步，它不僅僅表現爲兩大體系的對立與雄峙，並且標誌出一個新的形勢——一個社會主義佔相對優勢的新形勢了。

在這個新形勢下，不可避免地將會擴大與激化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使人類歷史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轉變過程，發展到一個更高的新階段。從一九四七年、特別從一九四八年起，這個歷史大轉變的過程，已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發展

這里，我們來看一看當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癱瘓症吧：

首先，它表現在生產力的萎縮上，從工業生產到農業生產，都普遍存在着這一個癱瘓的現象。拿金元帝國的工業生產來說，倘以一九三七年的產量爲基數一〇〇，它已從一九四三年最高峯的二二二跌到一九四八年的一七〇。而一九四八年十月份以來，更是每況愈下。十月份的指數爲一七五，十一月份爲一七三，十二月份已跌爲一六八。一九四九年一月份爲一六五，四月份爲一五七，七月份爲一四五，十月份竟陡落到一三七了。農業的情形，也是一樣。一九四八年美國的農民所得，已比一九四七年降低了百分之八；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更比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跌落了百分之十一。美國如此，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尤其嚴重。英國許多工業部門的產量，都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倘以一九四八年與一九三七年相比，棉紡織品的產量僅及戰前的百分之五五，煤產亦僅及五分之四）。至於法國的摩托工業和影片工業、意大利的冶鐵工業和機器工業以及比利時的紡織工業和玻璃工業等，又都在風雨飄搖之中。在農業方面，更是不堪回首。西歐各國一九四八——四九年的穀物產量，祇及戰前（一九三四——三八年）的百分之八十七而已。這些事實具體地指明出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僅停滯不前，並且日益倒退了，它滋長了資本主義腐爛性的蔓延。

其次，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還表現在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消長上。在兩次大戰之間，美國每年的輸出總值，平均爲三十六億美元，約佔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三；到一九四七年，輸出總值已增爲一百五十億美元，佔了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八。然而，資本主義世界的金元饑饉，使美國商品失去了「生存空間」，即使靠着「馬歇爾計劃」，也無法挽回這個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一九四八年的輸出總值，已比一九四七年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如果從貿易總量來看，更比一九四七年倒縮了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四九年的情形，基本上一點也沒有好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時，輸出總值尚達十三億一千七百萬美元，一九四九年三月份，已減爲十一億五千九百萬美元，到七月份，更下跌爲八億九千七百萬美元了。西歐各國，亦呈銳減，比起戰前的輸出總值來，平均降跌了三分之一光景。

在另一方面，華爾街寡頭卻以金元的獨裁，伸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去。資本輸出的膨脹與商品輸出的萎縮，恰恰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在一九一三年時，英國海外投資總額尚爲美國的五‧八倍，可是，到一九四七年，美已祇及美國的五分之一了。在戰前的五十年間（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美國的資本輸出率，每年平均爲二億四千萬美元；而這次大戰後，它的增長率，竟比戰前膨大了三十倍。根據可靠估計，一九四八年時，美國海外的投資總額，早已超過三百億美元了！（一九三六年時，祇有一百二十四億美元）到今天，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變成了金元世界，它使美國獨佔資本家從國內的資本累積，擴大爲國際的資本累積，加強了它在世界範圍內的剩餘價值剝削，也就是強化了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列寧曾經這樣指出：「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它日益使食利階級和生產完全絕緣，使少數靠着榨取海外國家及殖民地人民的勞動爲生的國家，處處呈現着寄生的特徵。」（「帝國主義論」）

再次，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更表現在發展的不平衡性上。大戰以前，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的總生產量中，大約佔到百分之四十，而大戰以後，它卻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了。今天，美國每年用於建設設備（如蓋建工廠、購置機器等）上的資本支出，總在一百五、六十億美元；可是，英國還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紡紗廠和百分之六十九的織布廠，依然襲用着十九世紀的紡織機，英國的煤礦設備，比美國至少落後了一百年，英國的熔鐵爐，很多還是上次大戰時代的平底爐，而不是新式的煤氣爐。法國也一樣，它今天尚有五萬五千架機器，平均年齡已在二十五年以上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有機構成，更參差不齊。這一個畸形的不平衡現象，很生動地集中表現在西歐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逆差上。一九三八年時，西歐各國的貿易逆差，共計爲十八億美元，對美的貿易逆差，祇有七億美元；可是，一九四八年時，貿易逆差總額已增爲六十二億美元，對美的貿易逆差，也躍達三十七億美元，比戰前膨大了四倍多。就看西歐對美的國際收支逆差吧：一九三八年祇有四億美元，而一九四八

年時竟昇達三十六億美元，更比戰前增加了八倍之多！（根據聯合國「一九四八年世界經濟報告」，頁一六三）這個剪刀形的經濟發展趨勢，一定還會激化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

總括說來，資本主義腐爛性的蔓延、寄生性的增強和發展不平衡性的激化，就是現階段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繼續惡化的基本原因。當然，許多別的現像（如商品價格的驟起驟落、股票價格的狂瀉、社會購買力的下降、商品存貨的山積，失業人口的累增等），也可襯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現已跨進一個更成熟、更險惡的階段，它不斷地削弱着世界資本主義，使它永遠也不能回復到從前的「平衡」和「穩固性」，這樣，就必然會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過程，而使資本主義總危機繼續尖銳化，並且把它帶向總崩潰的邊緣，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推進一個新的階段去。

三、資本主義世界基本矛盾的尖銳化

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到這樣一個新階段，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就必然會有更多的與更大的矛盾孕育出來。這中間，有國內矛盾（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間的矛盾），也有國際矛盾（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及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這國內矛盾與國際矛盾是交織在一起的。社會性生產與私人性佔有間的矛盾，使貧富向兩極分化、使生產與消費脫節，也就是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成爲不可調和。「到最後，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就發展到一種程度，使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外殼，變成不能相容了。」（「資本論」，英譯本、卷一，頁八三七）這樣，在國內終將燃燒起階級鬥爭之火。拿美國爲例吧：金元巨頭大發血腥財，已膨脹得不像樣子了。戰爭結束那年（一九四五年），美國的企業利潤，已達八十七億美元，估了全年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九；這幾年來，還累增不已，一九四六年爲一百二十八億美元，一九四八年竟躍爲二百零八億美元，幾乎佔到國民所得的十分之一！（根據美國勞動研究協會所編的 Labor Fact Book，第九冊，頁十八）可是，戰後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卻已降低了百分之四．二。因爲，貨幣工資雖則增加了百分之百分之二九．八；而同一時期的物價，卻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五。（全上，頁四〇）儘管戰後美國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已比戰前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可是他們今天要想維持一個「合理的最低生活水準」，也辦不到。所謂「合理的最低生活水準」，祇是指他「每六年買一套西服、每一禮拜消費半磅牛油，每半個月去看一次電影……」而已。美國工人爲了爭取麵包的自由，就進行了一次次的英勇鬥爭。一九四七年間，有十五次大罷工；一九四八年，也有二十次大罷工。工人階級的鬥爭情緒，正在繼續高漲，像最近一次的煤礦罷工，人數就到達了一百萬。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里，階級鬥爭也正閃閃發光。英國經濟危機的慘重和工黨改良主義的垮台，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兒不再贅述了。即使根據聯合國的報告，也不得不這樣承認：「法國的實際工資，已較戰前降落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生活費用，則較戰前增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其次，如果我們放眼看看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它更刻劃出資本主義世界的垂死掙扎。不用說，在這些矛盾中，英美矛盾始終是資本主義世界最深刻的矛盾。它的具體形態，就表現在市場的爭奪戰上。美國正施種種壓力，要攫取馬來亞的錫和樹膠，南非和澳大利亞的羊毛，錫蘭的茶葉和印度的学蘇。美國的人造橡皮已經壓倒了馬來亞的樹膠，美國自製的威士忌酒也已排斥了蘇格蘭的威士忌酒。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英國對印度的輸出，不過增加四倍，美國卻增了七倍；英國對馬來亞的輸出，所增不過三倍，美國更增加了八倍。今天，不但英鎊已被迫貶值，不但中東油田快被美帝搶光，就連英鎊區域的門戶，也早被杜魯門主義所闖開了。當然，除了英美之間的矛盾，還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美帝扶植西德，威脅到法國的安全，引起了美法之間的矛盾；美帝扶植日本，要把英國勢力逐出遠東市場，又會造成英日之間的矛盾。最近（一月二十七日），美帝與西歐八國所簽訂的「雙邊協定」，更使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基本矛盾，從一個分散的矛盾形勢發展爲一個集中的矛盾形勢。因爲，這個協定的簽訂，已使美帝把所謂西歐「經濟整體化」的侵畧計劃，向前推進一步了。

就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說，今天也已發生了新的變化。這次大戰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已從一個守勢的鬥爭局面發展到攻勢的鬥爭局面，帝國主義再不能憑藉它們的堅鎗利礮，把當地日益壯大的革命隊伍鎮壓下去了。印尼人民站起來了，越南人民共和國已宣佈成立了，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在走向勝利了。帝國主義這只紙老虎是戳破了。這一個新革命形勢，還要繼續發展下去，它將以摧枯拉朽之勢，來扭斷帝國主義統治的鏈鎖！

資本主義世界里的這三大基本矛盾，現正一天天在擴大，它的尖銳化和惡性化，更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總崩潰，也就是更激化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四、「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所有這些，就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總危機所表現的基本特點。杜魯門主義也好，世界主義也好，美國主義也好，它都改變不了歷史的發展規律。不管是馬歇爾計劃、還是西歐聯盟、或是北大西洋公約，它同樣阻攔不住人民民主的革命洪流。眞如列昂節夫所說：「美國經濟大恐慌的妖魔，正像一件屍衣一樣，籠罩着今天的歐洲。」儘管美帝在瘋狂地備戰，但西歐人民決不願替它去當砲灰，同時，任何一次戰爭的結果，也祇有加深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要消滅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斯大林語）一百零二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給我們所作的科學預見，已經成爲事實了。「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斯大林語），並且是更加逼近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清晨。

在胡志明旗幟下的越南

薛謀洪

「當一個民族決心為其獨立與自由而戰時，任何東西也阻撓不了它的成功與勝利！」

——胡志明

（一）帝國主義者的侵入

越南，擁有七十四萬方公里肥沃的土地和二千四百萬優秀的兒女。它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南民族，佔全人口百分的七十二；其次是柬埔寨民族，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二；再次是老撾民族，佔總人口百分之四・五；其他尚有芒族、占族、和馬來族等，以及三十多萬的華僑。

在法帝國主義侵入越南以前，在越南的絕大部分土地上統治着封建的阮氏王朝。它佔有北圻、中圻和南圻，成立了一個安南王國，作為中國的藩屬。和這個安南王國並存着的是老撾和柬埔寨二個小王國，他們經常處於安南王國的威脅之下。

法國的開始注意越南，遠在十六世紀。最先來到越南的是法國的天主教士。他們發現這是塊淘金的好所在，就引進了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到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在印度與英國競爭失敗以後，乃決定「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好好地在越南撈一下。於是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種種侵略，就一個緊接着一個地向越南打來。一八六二年佔領了南圻的三省，一八六三年獲得了柬埔寨保護權，一八六七年又佔據了全部的南圻。這一連串的舉動激怒了越南人，也引起了作為宗主國的滿清的注意。他們曾想法停止法國更進一步的侵略，但結果終歸無效。一八八一年法帝進佔北圻，引起了法越戰爭，更轉而為中法戰爭。最後終於在李鴻章手中于一八八五年把越南葬送給法國。

為了防止越南人民團結一致的反抗，法國採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把越南分為交趾支那直屬殖民地（南圻），和安南（中圻）、東京（北圻）、老撾、柬埔寨等四個保護國。由法國派遣總督駐在河內，總攬一切。法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即透過印度支那銀行，在越南購買土地，開採礦產，建立工廠，大量而殘酷地榨取越南豐富的寶藏。

（二）從越共到越盟

法帝在越南的剝削和壓迫，激起了越南人的民族運動。它最先開始於舊安南王國的統治階級所領導的反法勤王鬥爭，其領導者為黃花探將軍所組織的北圻勤王黨。繼反法勤王鬥爭而起的，是一部分士大夫和小資產階級所提倡的農民反抗租稅運動。這個運動由於領導者本身階級本質的弱點，也就經不起法帝的打擊。這時候，由於殖民地工業的逐漸發展，在越南已經出現了無產階級，而在世界的另一角又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國內和國際的條件就成為越南共產黨產生的基礎。

一九一九年，越南第一個馬克思小組在巴黎成立，領導者就是現在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當時的名字叫阮愛國）。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來到廣州，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們幫助之下，創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於香港，成為越共的前身。這個同志會很快地就在越南國內發展了支部的組織。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胡志明跑到暹羅中部靠近湄南河的一個越僑村莊裏去做革命工作，想把革命力量從西而東地滲入越南。這時，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在國內正分為三派，並都改組為共產黨；為了統一革命的力量，胡志明於一九三〇年來到香港，完成三派統一的工作，正式成立了越南共產黨，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

越共自成立以後，就在一條崎嶇的道路上奮鬥着。自秘密而公開，又自公開而秘密。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間他們不斷地在探求着越南解放的具體綱領，想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越南革命的實踐統一起來。一九三七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組織了反日本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掀起偉大輝煌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這一策略的成功，給越南共產黨一個很大的啓示，他們知道要把法帝國主義趕出去，非聯合全國各階層一致努力不可。因此越共馬上開始了越南統一戰線的組織工作，聯合各民族及各革命黨派組成了越南解放委員會，這是走向全國團結的第一步。

一九四〇年法國政府向希特勒投降，在維琪苟延殘喘地度其傀儡的生活。日本帝國主義者立即抓住了這一機會，在法日聯防的口號下開入了越南。

面對着殘酷的法日法西斯的雙重壓迫，胡志明認為更加有團結越南全部人民的必要。因而在一九四一年初，他組織了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來加緊抗日反法的鬥爭。

越盟是由越南共產黨領導十六個越南救國會所組成的。這十六個越南救國會包括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軍人救國會、文化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兒童救國會、青年救國會、父老救國會、佛教救國會、天主教救國會和商人救國會等等。它們分別組織起全國各階層各職業的愛國人士，共同為越南的獨立民主而鬥爭。而越共則派遣很多優秀黨員分別參加適當的救國會。這些黨員不是以黨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但是由於他們革命經驗的豐富和思想意識的正確，他們很快地就成為各救國會的領導人物。這樣，越共就和十六個越南救國會有機地聯繫起來，構成了越盟的基本隊伍。（越南宣佈獨立以後又先後加入了一些新的黨派，這在下文當再提到。）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越盟發表了它的綱領。它號召在越南成立一個統一的民族解放陣線。在政治上它保證人民思想、言論、信仰、集會、結社等自由，實現全民普選，賦予各少數民族以民族自決權。在經濟上它主張耕者有其田，重分公田，減輕自耕農地租（向政府交納者），尊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承認私有財產，鼓勵私有工業的發展，改革農業並發展工礦電氣工業，實行計劃經濟，開展合理的對外貿易等等。在外交上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聯合亞歐各被壓迫民族共建聯盟以反抗法西斯與帝國主義，實行華越親善，提倡世界民主國家的平等合作，擁護大西洋憲章等等。這個綱領就是越南人民多年來鬥爭的總策略。

根據這個綱領，越盟開始組織人民的武裝，名為越南民族解放軍，總指揮是從延安抗日大學出身的武元甲將軍。這枝軍隊剛成立的時候只有三十五個志願兵，兩枝步槍、三枝獵槍、一枝毛瑟、以及刀、矛等。民族解放軍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從不斷地和法日強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鞏固起來的。

（三）對日戰爭的勝利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日本解除了在越南的法軍武裝

，摧毀了法國的越南總督德古，更直接地控制了越南。爲了要和緩越南人民的反抗情緒，日本於三月十日策動「安南帝國」的「獨立」，以表示日本「對越南並無領土及主權的慾望」，「日本之來是解放黃種人趕走白種人」。在日帝導演之下越王保大變成了安南皇帝，從法國的傀儡過渡爲日本的傀儡。

在傀儡政府中扮演角色的，是兩個奴才政黨：大越黨和青年黨。這兩個奴才政黨是在日本進佔越南後不久才產生的，是兩個極端親日的政黨。他們對人民叫着說「黃種人團結起來爲驅逐白種人而鬥爭」，「日越親善，歡迎日本人解放越南」，想用此來欺騙人民。日本接收法國政權以後，就叫這兩個奴才政黨出來組織僞政府，由陳仲金充任總理大臣。日本並責成這個僞政府組成一支由日本加以裝備的僞軍，用來應付越盟的游擊隊。

日本的這些鬼計結果是完全失敗了，越盟馬上向越南人民指出：「日本的宣佈越南獨立不過是一種欺騙。我們要加緊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我們要用高度的戰鬥來取得我們的獨立。」人民看到日本的剝削和僞官的貪婪，知道越盟的見解是對的，因此很少人上越奸的當，相反地，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越盟。至於那一支派到北圻來「剿匪」的僞軍則完全成爲越南民族解放軍最好的軍火輸送隊。僞軍派去「剿匪」的數量越大，民族解放軍所得的武器裝備就越多，而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也就越快。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投降，越盟知道對日總反攻亦將爲期不遠，乃決定於八月召開全越越盟代表大會，討論在越南實行武裝總起義及如何配合盟軍登陸作戰的問題。但是在會議的第一天晚上，就得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因此越盟立即下令全國武裝部隊開始行動，解除日軍武裝，奪取政權。八月十九日，民族解放軍解放河內，僞皇帝保大在人民的壓力下宣告退位（八月二十四日）。在他退位的詔書中他曾公開宣稱：「得爲一獨立國家的公民感覺無限歡欣」，「朕絕不再戀棧帝位」，「希望全國不分階級黨派一致合作，澈底擁護民主政府」。誰想到這個封建的餘孽在五年後又當上了僞王，甘心再作法帝的傀儡！

在全越越盟代表大會上曾選出一行使臨時政府職權的「中央委員會」，胡志明被一致推選爲主席。偉大的八月革命成功以後，中央委員會遷至河內，當時胡志明的第一個建設就是改組這個臨時政府，容納所有愛國民主黨派的代表和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以貫澈統一戰綫的原則。這個建議立即爲中央委員會所接受，許多委員們要求自動退出，把位置讓給非越盟的人士。結果就組成了一個新的臨時政府，其中有一半的席次是由越盟外的其他黨派和人士所主持的。胡志明又被一致推選爲越南共和國的主席。這個政府是全國一致的政府，連廢王保大都被延聘爲高級顧問。

臨時政府請胡志明主席負責起草越南的獨立宣言，於九月二日公開發表。宣言中宣佈：「法國人已經逃跑，日本人已經投降，保大皇帝業已退位，我們人民已經擊碎了近百年來法殖民主義者所加諸我們的奴隸枷鎖而建立了獨立的越南，我們人民更推翻了那不知統治了多少世紀的君主制度而締造了今天的民主共和制度。因此，我們——越南臨時政府——代表越南全體人民，鄭重宣佈不受法國一切舊條約的約束，並取銷法國在越南的一切特權……一個敢於反抗八十年來法國人的奴隸統治的民族，一個敢於數年來和盟國並肩作戰去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民族，這個民族應該獲得自由，這個民族應該獲得獨立。如前所述，我們——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鄭重地向全世界宣佈：越南有享受自由和獨立的權利，而且事實上已成爲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越南全體人民堅決動員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資源及犧牲一切生命財產來保衛它的獨立和自由。」這篇宣言是越南人民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它宣佈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根據盟國間的協議，接收越南日軍投降的工作是由中英兩國分別負責一部分的。在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日軍由中國受降，在北緯十六度以南的日軍由英國受降。中國乃派盧漢帶領了國民黨的第四方面軍開入越北。

國民黨政府認爲越南是法國從中國手中奪去的，因此對於越南的獨立在當時並不感興趣。那時蔣介石很希望自己成爲亞洲的霸王，因此在重慶扶植了朝鮮的獨立黨（金九），而在柳州則分別支持着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這兩個政黨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政黨，始終抱着反越盟的態度。當盧漢於九月十三日率軍入越時，這兩個政黨也就跟着到了越北。在國民黨軍隊庇護和幫助之下，他們組織了自己的軍隊，以武力割據中越邊境的若干地方，並在芒街成立「越南國民政府」，想藉中國國民黨之力以攫取越南的政權。但是由於人民擁護越盟而不擁護他們，所以他們的計劃終難實現。

中國國民黨的軍隊看到它的兩個傀儡在越南已不能獨霸天下，樹立一個親蔣介石的政權，乃迫越南的臨時政府與越南革命同盟會及越南國民黨「合作」。越盟一向主張全國統一戰線的建立，因此當武鴻卿（越南國民黨）和阮海臣（越南革命同盟會）來到河內時，越盟立即和他們討論到精誠合作的計劃。結果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將臨時政府改組爲正式政府。任阮海臣爲副主席，以越南國民黨人主持經濟部。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也就在表面上暫時而勉強地加入了越盟。

（四）英法進攻、民主選舉、與三六協定

上面已經說過，北緯十六度以南的駐越日軍是由英國受降的，因此在九月一日，英國的軍隊開到了西貢。當時西貢完全在越南人民政府手中。越方與英軍司令談判的結果，英軍表示它來越的唯一任務是解除日軍的武裝和維持過渡時期的治安，越軍乃許英軍順利進入西貢。但是英軍一進入西貢之後，竟立即命令日軍恢復執行西貢的警備權，並把一九四五年三月越南事件中爲日本解除武裝的四千維琪軍隊重新武裝起來。等到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英軍於九月二十三日晚在西貢宣佈戒嚴，由英法日的聯軍向越南人民的軍隊進行攻擊強制接收了西貢所有的公共機關，誣蔑越盟爲親日派，並殺了無數越南的愛國志士。越南的人民忍無可忍，乃在南圻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神聖鬥爭。

在反英法帝國主義鬥爭的進行期中，越南人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舉行了全國總選舉。越南人民知道武裝的鬥爭是必須和民主的改革雙管齊下的。所以全國上下用最高度的熱誠展開這越南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民主普選。在臨時政府控制下的地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選民參加投票，河內投票的選民竟佔該區全部選民百分之九十九。在中圻的南部，游擊戰士是一手拿着槍一手拿着選票在戰場上進行選舉的。而在法國佔領下的西貢和堤岸，則採取秘密的投票方式，由男女青年志願者於黑夜中拿着藏在衣服下面的投票箱去逐家收集選舉票。就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下，還有百分八十二的選民行使他們的選舉權。但是有四十五個志願者是被捕犧牲了。這是一次可歌可泣的選舉呀！

在競選的初期，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是相當賣力的。然而他們終於發現人民完全不擁護他們。因此在選舉的前夕他們聲明放棄競選。越盟不願因選舉而發生內部的分裂，所以向兩黨表示願意在三百三十名議員席次中爲他們保留七十席。但是他們還是不答應，原因是他們根本沒有合作的誠意。結果參加競選的就只有越盟、越南民主黨、社會黨、和地方士紳。越盟命令他們的盟員在非盟員參加競選的地區盡量退讓，因而所選出的議員中，仍具有極廣泛的代表性。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越南的第一屆代表大會在河內舉行，大會通過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憲草並於翌日組織了新的抗戰聯合政府，由胡志明阮海臣分任正副主席。政府內十部則由越盟、越南民主黨、越南國民黨、越南革命同盟會、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各推二人担任。此外政府內又設一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武元甲和武鴻卿分任正副主席。

抗戰聯合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對法和戰的問題。一九四六年初，中國已決定將北緯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地區交給法國帝國主義。法軍源源開來越南，並準備隨時「接收」越北，而政府內部又因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搗亂而不能通力合作。胡志明知道此時有對法帝作暫時妥協的必要，於是開始了對法的和平談判，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訂立法越協定草約，其內容如下：

一、規定越南爲法蘭西聯邦的一部。

二、法國承認越南有自治權，可自行設立議會，並享有財政上與軍事上的自主權。

三、越南共和國聯合政府所統轄的區域包括東京和安南。至於交趾支那的地位，則於三個月後由公民投票決定。

四、越南政府允許法軍開入越南，依據同盟國的協定由法軍順利接替中國軍隊的防務。法軍之任務、數量、駐紮地點、及駐防期限等則於另一附約中訂明之。

至於越南的外交權與法國人在越南的經濟地位等問題則將來在河內、西貢、或巴黎再行繼續談判。

又附約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接替華軍防務的軍隊有法越雙方軍隊，其中法軍一萬五千人，越軍一萬人，渠等全受法最高指揮官的指揮，但越人得協助之。至於駐軍、行軍、及調動軍隊等問題，則由法越雙方司令部召開之參謀會議決定批准之。

二、法國軍隊撤退離境問題，須依下列三項辦理：(甲)負責警戒及辦理日軍俘虜善後事宜的法軍，須於任務完畢時即行撤退，無論如何，撤退期限不得逾十個月。(乙)凡有與越軍共同負責維持治安責任的法軍，每年須撤去五分之一，五年後法軍完全撤回。(丙)凡負有防守海空軍根據地責任的法軍，其撤退期限由雙方會議另定之。

三、凡法越軍駐防地區，須將駐區劃分清楚。

四、法國政府決不利用日俘於法軍隊伍之內。

這個協定在最初並不爲全體越南人民所了解，因而迫使胡志明主席不得不向人民詳細解釋簽訂該協定的原因。他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並向人民保証「胡志明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是一個賣國賊。」

(五)從三、六到九、一四

法國對於三六協定並沒有遵守的誠意，儘管胡志明主席在協定中已經對法國作了很大的讓步，但還無法滿足法殖民主義的慾望。皮杜爾(法內閣總理)當時之所以要簽訂這個協定，是因爲他們急於要接收越北。他們以爲把軍隊順利開進越北在各地佈防以後，就可反轉來撕毀那個協定，把越南完全置於自己勢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法軍開入越北後變天，就開始了違反協定的種種行動。他們攻擊越南的軍隊，逮捕越盟的盟員，要想在越南全境恢復他們的法西斯統制。

另一方面，法國又利用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出來反對越盟。這兩個政黨最初指胡志明是賣國賊，說胡出賣民族的利益。但是人民不受他們的欺騙，因此他們就孤注一擲，調他們自己的軍隊攻擊越南的民族解放軍。然而這個叛亂很快就又被撲滅了。於是這批狐群狗黨們有的逃來中國，有的包圍着保大逃往香港。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在越方一再催促之下，法越雙方又在越南中部的茶叻開會，商談法越間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於法國的毫無誠意，會議一無結果。會上越南要求的是：一、越南在法國聯邦中，其政治地位與法國聯邦的其他部分一律平等；二、在外交上越南得自由與外國簽訂條約，並以獨立國地位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會議；三、南圻應爲越南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三點要求都是建立獨立統一的國家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法國卻始終不肯答應。

正在茶叻會議期中，法駐越高級專員達尙禮安導演了一幕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的醜劇。達尙禮安是一個典型的殖民主義者，主張採取軍事征服和分化政策來內外夾攻越南。當一九四五年九月法軍攻佔西貢後，就成立了一個以阮文盛爲首的傀儡政權。(後來阮在輿論攻擊之下自縊身死)到了一九四六的六月一日，即三六協定規定實行南圻公民投票的那一天，達尙禮安又用最卑鄙的手段强姦民意，成立了「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達尙禮安這種做法是法國獨佔資本家所最稱許的，因爲南圻是越南最富庶的一區，它的米和橡膠每年不知爲法帝國主義者的荷包裝滿了多少錢。同時南圻又擁有越南最大的海港西貢和最大的軍港金蘭灣。佔有了這兩個地方就控制了整個越南。所以法國死也不肯放鬆南圻，而達尙禮安也就演出了這齣無耻之戲。

法國這種做法引起了越南人民無限的憤怒，越盟也向法國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七月初，胡志明率領越南代表團赴巴黎，想對越南問題和法國作一次最後的談判。會議從七月到九月，始終得不到結果，法國對於越南所提出的政治獨立、外交自主、國家統一的要求完全置諸不顧。越南代表團團長范文同不堪皮杜爾那種反覆無常的外交手腕而憤然歸國，由胡志明親自出馬，卒於九月十四日簽訂了另一個包括十項條文的臨時協定。這個協定對於法越間的主要問題都沒有解決。胡志明也知道這個協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他認爲「一個臨時協定總比完全沒有協定來得好一點。」

當胡志明正在巴黎的時候，達尙禮安在越南又演出了一齣新的把戲。他在西貢召集了交趾支那、老撾、柬埔寨的「代表會議」，宣佈了老撾的「獨立」，和交趾支那、老撾、柬埔寨的合組爲「越南聯邦」，並宣稱它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毫無關係，但越南共和國如願加入時，可以成爲聯邦的一員。這就是達尙禮安分化越南的第二步。

正如三六協定一樣，九一四協定在法帝國主義者看來也只是一張廢紙。在胡志明回越後不久，法國就把它撕毀了。它動員了大批的飛機和坦克，向越南人民進攻，又在各地大量屠殺革命者，破壞它自己釋放政治犯的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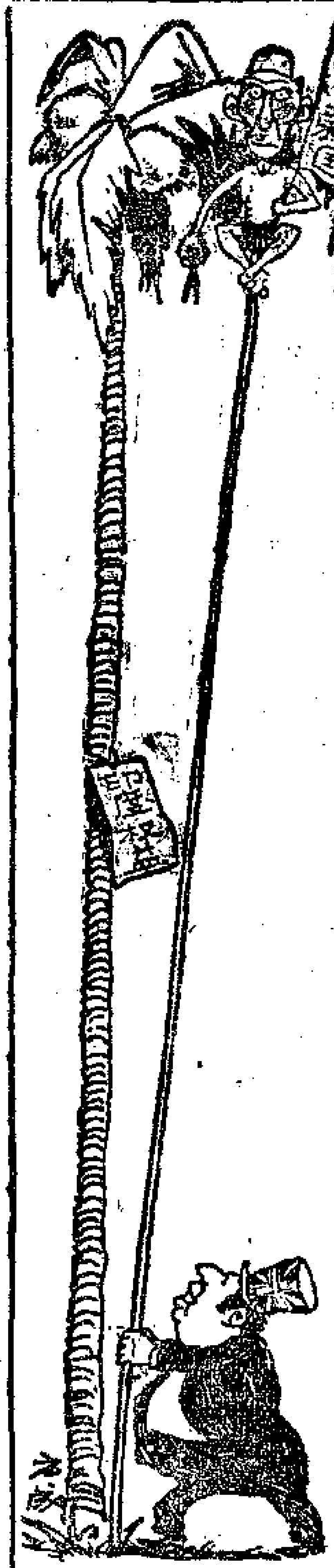
從此，越盟就展開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對外要抵抗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要消滅地主官僚賣國賊的僞政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就一定消滅他。」越南的人民就抱着這樣的決心繼續着他們英勇的戰鬥。

(六)民主改革與民主憲法

越盟在一九四一年春成立的時候，曾提出了它的建國綱領，作爲越南人民建設自己偉大祖國的指南。隨着武裝鬥爭的勝利和解放區的日益擴大，在日本投降以前，越盟綱領中的許多措施如土地改革、發展工商業等就已在廣大的地區實現。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以後，越南的人民政府就更其大力而有計劃地在全越實行民主的改革。

越南原是個出產大量糧食的國家，但是由於天然的災荒、奸商的囤積、和法日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在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全國人民正陷於空前未有的大饑饉中。因此越南臨時政府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增加生產。他們的辦法是在全國實行普遍的土地改革，提高農民的生產熱情。一面提出「不荒廢一寸土地，一寸土地一寸金」的口號，自胡志明主席開始，撒開全國性的生產運動。同時，爲了提高農業技術，人民政府也盡了它最大的努力。胡志明親自率

觀察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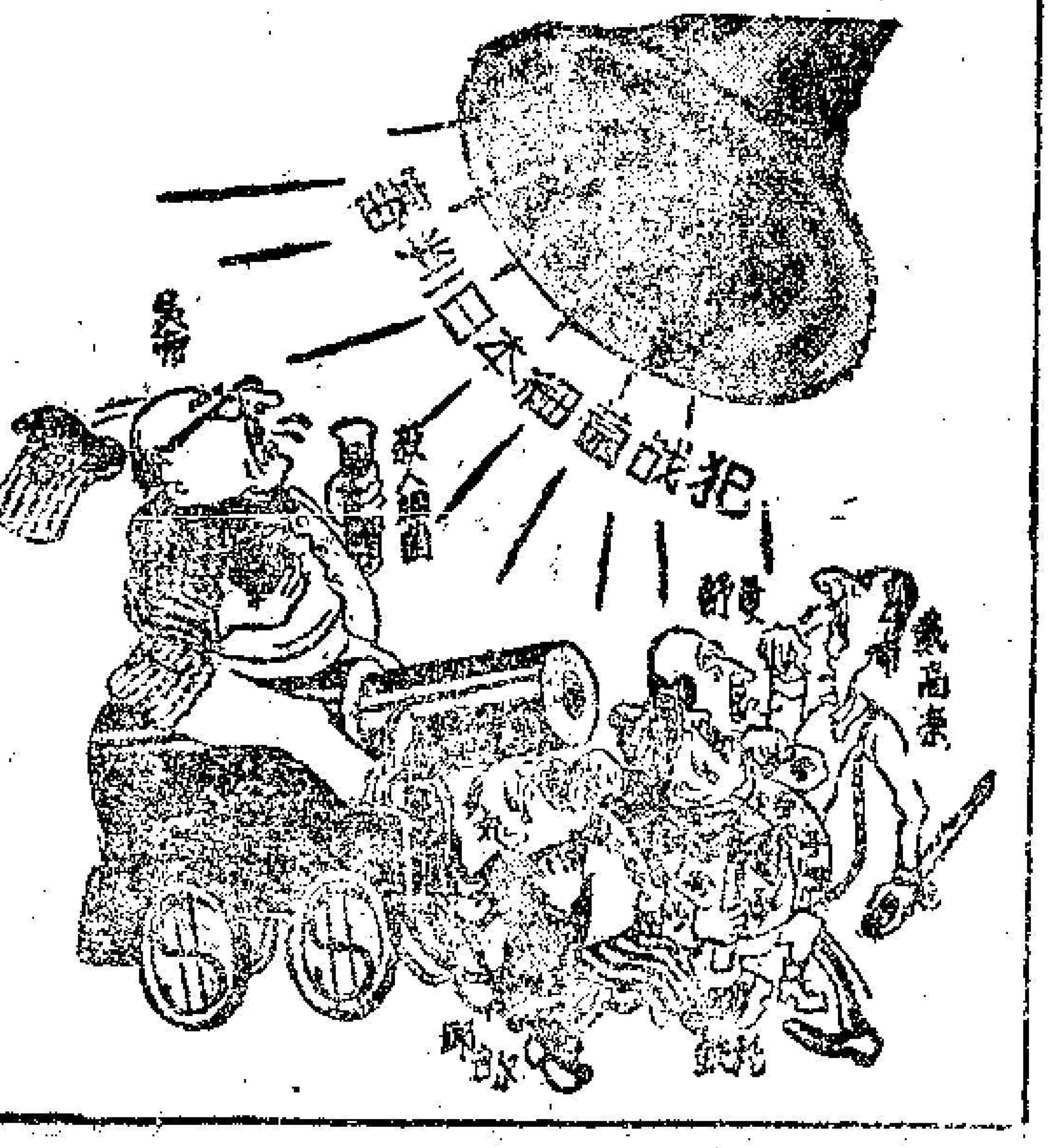


→ 狂人日記

方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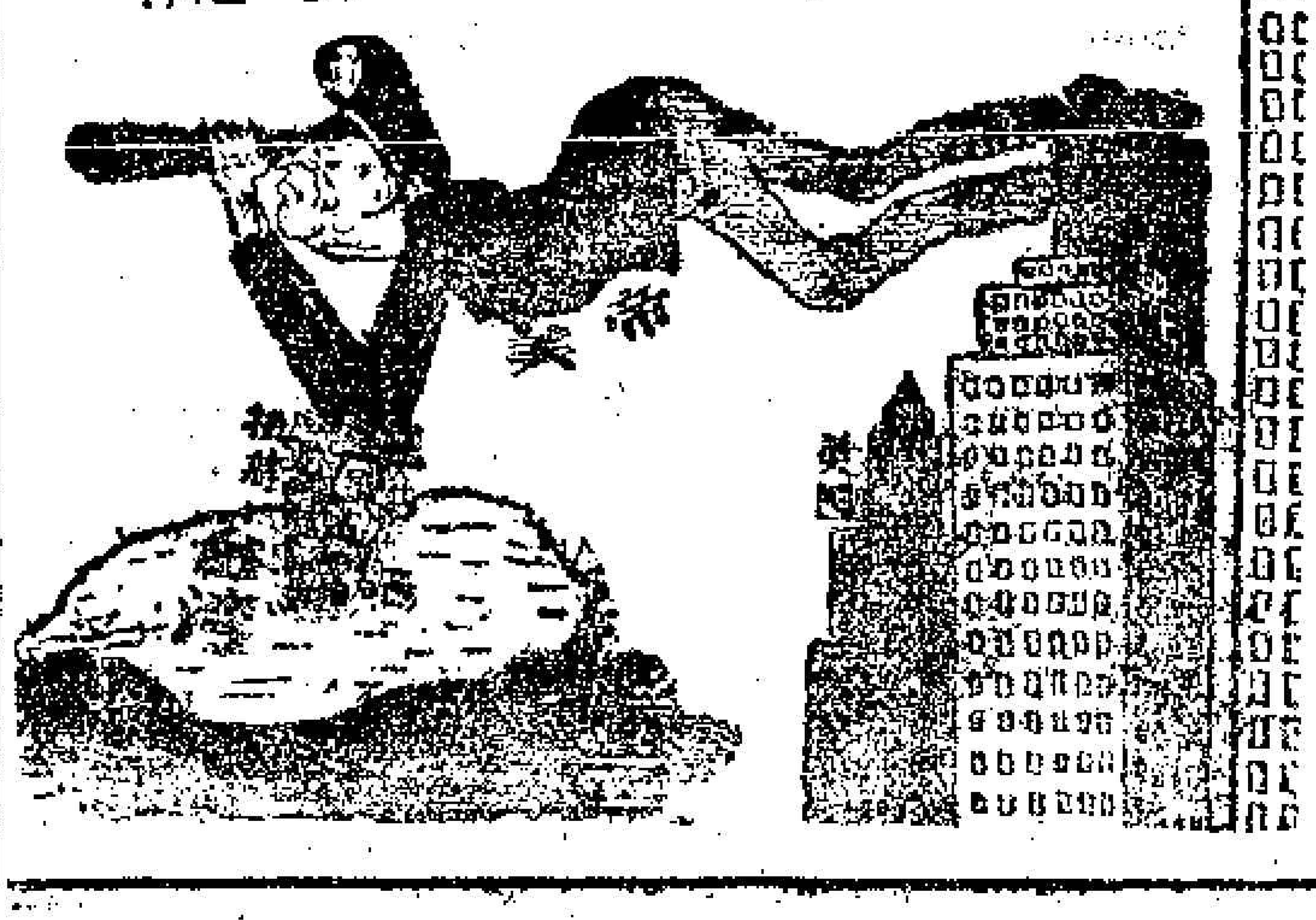
→ 警告

李俊岐作



↓ 美帝侵華的據點

劉迅作



領越南的閣員們到處巡視水堤，發動農民起而築堤灌溉。此外，胡志明又建議實行一個自動的獻募運動。呼籲全國同胞實行節食，將所餘糧食收集起來，分配給貧窮的同胞。

就在胡志明英明的領導之下，越南人民戰勝了災荒，征服了飢餓。

在增加生產的工作以外，越南政府又擬訂了一個肅清全國文盲的計劃。越南在法帝愚民政策之下，解放前的文盲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越南臨時政府的第一次閣議上，胡志明就提議政府展開掃除文盲的鬥爭。在胡主席號召之下，學校和識字班像雨後春筍似地到處發展着。單在河內就有兩千多男女青年請求做無酬的志願教師。他們沒有筆，就用木頭和竹子來代替；沒有紙，就在沙上、地上、和蕉葉上寫。就這樣地越南政府在短期內把文盲從百分之九十減少到百分之十五。這是胡志明在文化戰線上的偉大勝利。

此外如禁止鴉片、消滅娼妓、解決失業問題等等也都有輝煌的成績。

一九四六年十月，越南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一屆國民大會所擬訂的憲法草案，正式創訂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憲法。它向全世界宣稱：「越南爲一民主共和國，國內所有一切軍政大權都掌握在人民手中，並無種族、貧富、階級、性別、與宗教之分。」（第一條）。「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領土，包括中南北三部的完整統一，決不能將之分割。」（第二條）。在政治上它保證越南公民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上的一律平等，賦予他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旅行、居住、通信的自由，年在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除失去知覺及褫奪公民權者外，且一律具有選舉權。國家之最高權力機關爲人民議院。其議員由公民普選產生，任期三年，在其不稱職時人民可予罷免。人民議院選出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爲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它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副主席及內閣，主席爲國家之元首。在經濟方面則明白規定私有財產獲得保障，知識勞動及體力勞動之權利，國家將予保證，老弱殘廢無力生活的公民且由政府加以救濟。至於文化的措施，則決定實行小學強迫教育，貧苦學生，政府應予援助。對於少數民族，「除賦予平等權利外，並可獲得各方面之援助，俾能迅速達到和全國人民相同的水準。」（第八條）。他們可設立自己的小學，以自己民族的語言教育自己的子女。此外，憲法第十六條更宣佈：「爲民主自由而鬥爭的外國人在越逃避者，均得在越南領土上[illegible]首。」

這是一部民主的憲法，它體現了五年前越盟的建國綱領。

（七）海防事件，波拉特的來越，和保大的復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法國的大選，法共獲得勝利，成爲法國的第一大黨。皮杜爾內閣提出辭職，由法共領袖多列士出而組閣的呼聲最高。這就迫使法國的反動份子不得不緊密地聯合起來，和法共相對抗。他們知道法共是反對對越侵略的，因此一面設法阻撓多列士的組閣，一面想儘速解決越南問題。在法國大選後的第二天，達尙禮安飛回巴黎，他看到越南人民的日益團結，和法共勢力的日益壯大，知道非馬上用武力征服越南不可。於是他向已辭未卸的皮杜爾內閣提議在越南開始軍事行動。他對法國的反動派保證，可以「在三星期內解決越南。」基於這個保證，一等到法共組閣的失敗成爲確定的事實以後，法國就在越南發動了海防事件，掀起了全面的法越戰爭。

十一月二十日，法國因破壞越南的海關權引起了越南的反抗，法國即以此爲藉口，向海防的越軍開始攻擊。胡志明會極力設法用和平談判來解決彼此的糾紛，但爲法國所拒絕。十二月十七日法軍以哀的美敦書要求越軍放下武器，越軍置之不理。十二月十九日法軍乃進攻河內，胡志明被迫率領越南人民政府的人員撤往河內近郊，從此結束了法越間一年多來若斷若續的外交談判。越南政府決定以武裝鬥爭作爲民族解放的唯一形式，他們知道和平鬥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出乎法國反動派的意料以外，越南的軍隊是極端難對付的鋼鐵隊伍。在每一次戰鬥中，法軍傷亡的數目是可怕的。而龐大的軍費担負（一天約需一萬萬法郎）又非戰後支離破碎的法國經濟所能勝任。十二月十七日成立的勃魯姆內閣（社會黨之清一色內閣）到了一月二十二日就垮了台。繼之而起的是社會黨拉馬迪任總理的聯合內閣。在這個內閣中，法共固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它在本質上還是代表着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一九四七年的二月間，它派遣了一個海外部長和幾個社會黨議員，到越南去「調查」。他們來越南以後，馬上發現問題的嚴重性。「法國絕不能在短期內解決越南問題，要解決越南需要二十萬的兵力和兩年的時間」，這是他們的自供。

軍事上既不易解決越南問題，法帝就決定運用其政治手腕，想以新的分化政策使越南就範。三月間它調回達尙禮安，換了一個急進社會黨員波拉特，散佈出和平的空氣。拉馬廸且公開宣稱：「波拉特的任命表示法國對越軍事的結束和和平的開始。」

達尙禮安在去職之前，還會大放厥辭，以逃避自己的責任。他認爲越南軍事進展的所以不能如意，法國之所以不能在三週內征服越南，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對越南給予許多援助和支持。他說：「胡志明和武元甲是奉延安的命令而行動的。」並要美國出來制止「馬克思主義在越南的蔓延」，這種做法和蔣介石被中國人民打敗後大罵蘇聯而求助於美國的醜態同出一轍。

波拉特來到越南以後，口裏喊的是和平，而心裏想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國的軍隊仍源源不斷地自海防、西貢、峴港等地登陸。胡志明雖答應和他談判，但波拉特所提出的條件仍是「越南民軍完全放下武裝」。這自然爲越方所堅決拒絕。因此人們在波拉特漂亮的演辭以外，總看不到一點和平的影子。

波拉特是有他的一個錦囊妙計的。他要在和平的幃幕下部署他的陰謀。一方面他派人到香港，勸誘保大出山，一方面調兵遣將，想用武力護送保大回越「執政」。他想用政治軍事同時並進的辦法，達到法帝奴役越南的目的。

保大是很希望再過一過皇帝癮的，但是他飽嘗過法國主子的毒辣手段，又知道越盟在越南的勢力是無法被戰敗的，因此他不敢貿然答應波拉特的建議，而有所期待。

波拉特見保大不肯馬上出來，而越南軍事又無把握，感到無限彷徨，乃於七月間飛回巴黎，向法閣請示。法閣經過十幾天激烈的辯論，決定仍派波拉特再行赴越，盡一切可能貫澈他的原計劃。波拉特乃回到河內，於九月十日發表了對越長達數千言的「和平廣播」，內容有三點：

一、關於承認越南在法聯邦中的獨立自由，波拉特稱：「法國並不從事侵略，或有再次佔領的企圖。同時法國亦澈底放棄保護與統治的政策。吾人願意將政權轉交各方『合格』的政府，同時吾人將視各該政府的需要而派遣若干公務人員與技術人員來『協助』。印度支那各民族將自其精神的特質而自行決定其本身生活的條件。各該民族將自行組織其本身之議院、財政、司法、教育、醫院，法國對各該組織不予干涉。」

二、關於外交問題，波氏稱：「惟在外交立場上，越南各官員不論其地位如何崇高，始終只能充作法聯邦的代表，此爲任何人所公認者。憲法聯邦係一整體，僅有唯一的外交政策，而其有關會員國均應遵從之。因此，聯邦對外所締結之條約，絕不能因其中某一會員國之反對而廢除。」

三、關於軍隊問題，他說：「關於聯邦防衛問題，法

憲法亦側重聯邦統一的精神，依照憲法第六十二條的證實，各會員國將盡其能力以組成保障全聯邦之防衛力量，法共和政府將負起聯絡此種能力之重責，以適當之政策籌劃此種共同的防衛措施。法聯邦之於軍隊，一如其外交政策然。」

總之，法國的建議是越南的外交不能自主，軍隊由法國統一指揮，而內政則由法國認爲「合格」的「各該政府」在名義上主持。這種奴役分裂越南的辦法，越南自無法接受。胡志明立即向越南人民指出：「波拉特此次自巴黎攜回之建議，不啻以無肉之骨饗犬，吾人所要求者，爲在法國聯邦內完全獨立，今失去權力淪爲乞丐之法人，猶圖行使最下等方式之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吾人決不接受。」

波拉特早知道胡志明不能接受這賣國的條件，因此在「和平廣播」的同一天，就在香港導演保大召開了一次「越南黨派代表會議」。參加的都是聲名狼藉的官僚政客和買辦如阮海臣、阮祥三之流的人物。他們打着「國家統一同盟會」、「越南抗戰陣線」、「國民聯合陣線」、「越南國民黨」等招牌，包圍着保大，攻擊越盟，要保大復辟，但是保大還是不肯答應。法國爲了要壯一壯保大的胆，曾在是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北部發動了所謂「冬季攻勢」，但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香港會議後不久，它的兩個要角阮文參與武三英就在西貢爲越南人民所殺。同日，法國在河內的傀儡頭目張庚芝又爲越南人民所槍決。越奸內部的意見乃大爲動搖。法國知非立即抬出保大，大整旗鼓不可。乃多方引誘保大，終於說動了他，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赴歐。

一九四八年一月，保大與波拉特在日內瓦會晤。保大向波拉特表示如果要他復位，必須在表面上給予越南獨立與統一，使他足以向越南人民有所敷衍。法國顧全保大的面子，並使他可以成爲欺騙越南人民的傀儡計，乃向保大提出了若干欺騙性的條件。其中包括：一、越南王國在法國聯邦中獨立與統一；二、越南可自有陸軍與警察，但海空軍及其他武裝人員則由法國軍官統率；三、越南得自派領事，但公使與大使之派遣須得法國之贊同。保大對於法國這些條件相當滿意，但他不知道散處在越南各地的傀儡政權對他的復位是否加以擁護，因此還是不敢馬上答應。一月十四日他發表一個聲明，宣佈自己願意復位，但須以全國人民對他表示擁護爲條件。法國看保大之意已動，乃令波拉特趕往西貢，發動一個「歡迎保大回越」的運動。

三月十五日保大回到香港，法國派它在北圻、中圻、南圻的三個大傀儡鄧有志、陳文理、和阮文春，在法國所識別的吳庭豔領導之下，代表「越南人民」向保大表示他們的「忠誠愛戴」。保大躊躇滿志，乃令他們組織一個臨時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由於越奸各派系的爭權奪利，到五月二十七日才組織成功。保大乃赴海防外的阿朗灣與波拉特訂立「獨立條約」，該約承認「越南立憲君主國」在法國聯邦內的「獨立」，並宣稱「法帝國與越南今後將在經濟、軍事、文化、與外交上訂立協定。」必然地，等到這些協定訂立以後，越南立憲君主國的獨立也就名實俱亡了。

這些協定的談判是在去年一月由保大及其「內閣總理」阮文春在法國進行的。法國對保大提出了一連串苛刻的要求，迫使保大頗感狼狽。一月十九日法與保大雙方訂立了經濟與軍事的協定，但是關於外交問題則始終未獲協議。法國在一九四八年的日內瓦會商中會允許越南可自派領事，但大使和公使之派遣須得法國之同意，保大認爲「越南立憲君主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已經出賣了偌大的利益，如果在外交上不能維持形式上的獨立，則他將「無顏以見國人」。因此雙方堅持不下。這時美帝眼見中國人民的力量已經有強大的發展，深恐法帝與保大談判的決裂將使越盟大蒙其利，故令駐法大使館於一月二十六日勸告法國政府「以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反共政府來解決越南的問題」。而所謂民族主義者的反共政府，即指保大而言。接着在去年二月戰爭販子蒲立特赴越南考察，在他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又指出胡志明的勢力非常強大，並肯定地說，用武力方式已不能解決越南問題，而再三強調「利用保大從內部來破壞越南共和國是現在所剩下的唯一道路」。美國務院根據蒲立特的建議，復再度對法實行壓力。法與保大雙方乃終於在美國「勸告」之下，於三月八日獲得了協議。保大得到越南立憲君主國名義上的獨立，事實上一切外交內政均操諸法人手中，傀儡政府中僱用大批的法國顧問，重要的據點和海口成爲法國的軍事基地。法軍可在僞越自由行動，而法國獨佔資本家則仍可對僞越無限制投資。此外法國尚保有「特別裁判權」，僞越各學校且規定必須繼續講授法文。總之，法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對越南仍是一點也不肯放鬆。保大就抱着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回到越南，在去年的六月十四日登上了「王位」。

去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保大又和新任的法國駐越高級專員皮農在西貢簽署了所謂「移交政權」的協定。它規定海防和西貢等地地方法院中十年內由法國人任檢察官。越南的某些保安隊仍由法國高級專員直接指揮。國立大學的校長由法國總統任命。而越南地方行政機關則須大量聘請法人担任顧問。從這些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保大的「獨立」是怎麼樣的一種「獨立」。

（八）統一在望、勝利在望

保大的上台一點也解決不了越南的問題，相反地它引起了越南人民對法帝對越奸更大的仇恨。越南的武裝部隊是更其英勇地進行武裝的鬥爭，而越南人民則更其積極地支援前線的戰事。根據越南人民政府的公報，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法軍進攻河內起，到去年上半年止，越軍共擊死擊傷法軍二十萬人。（去年下半年度的總戰果尚未公佈）。現在越南的民族解放軍已經解放了全國百分九十五的土地和二千一百萬的人口，而人民的武裝則由二枝舊槍三枝毛瑟的三十五個志願兵發展到今天整整五十萬的強大部隊。在解放區內，全國人民展開了前方作戰後方生產的偉大運動，一九四八年單是解放區的農業生產量就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越南全部的農業生產量。至於工業的發展，其速度也非常驚人，一九四九年的工業生產指比一九四七年要增加兩倍。這些輝煌的勝利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

和越南人民並肩作戰的，是法國的勞動人民。他們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反對本國政府的對越侵略。這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法共參加拉馬迪內閣以後，法共的中央委員會即曾發表宣言，公開反對對越戰爭。此後法共即本此立場，組織全法的勞動人民，展開對越的和平運動。去年十二月法共人道報上又發表了法共領袖加香的一篇論文，題爲「組織起來，反對可恥的戰爭」，要求全國人民起而迫使政府立即與胡志明進行和平談判。他罵法國政府是瘋子，痛責法國獨佔資本家對越南的剝削，呼籲民主越南和民主法國的團結與合作。

今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又通過了決議，揭穿「法越協定」的侵略本質。它指出法國政府這種做法是企圖欺騙越南人民，使他們允許那個昨天是日本侵略者的代理人而今天又一身兼任法帝國主義者及其美國主子的工具之遜王保大當權。法共政治局認爲只有以胡志明爲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才眞正代表着正在爲自由與獨立而奮鬥的越南人民。此文宣稱：「議會批准阿里奧爾與保大所締結的協定，將使戰爭繼續延長，而銀行家、商人、投機家都在藉此戰爭以發財致富」，而號召法國的勞動人民團結起來，抵抗戰爭販子的一切威脅，並授權法共的議會黨團在國會內投票反對批准「法越協定」。

接着在第二天，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發表演說，痛斥「

在卑鄙的越南戰爭後面，負責的軍方人士和國會議員正在從事醜惡的植黨營私和陰謀詭計。」在多列士領導下，法共議員在國會內展開了抨擊法越協定的鬥爭。他們高呼着「給越南和平」的口號，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對越不名譽的侵略。

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又給越南人民極大的鼓舞，正如胡志明在評論中國情勢時所說：「由於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我們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擁有九百萬盟員的越盟和五十萬戰士的越南民族解放軍，正同全體越南人民一道，在胡志明的旗幟下展開了全面的總反攻。今年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年，也是越南人民的勝利年。這兩個國家在今年的一月十八日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加強了兄弟之邦間的友誼與合作，使東南亞的人民革命運動又揭開了新的一頁。蘇聯也於一月三十日與越南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使越南更堅強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營的一面。

勝利在望了！統一在望了！八十年來越南人民艱苦卓絕的鬥爭，即將得到光輝燦爛的成功。

二月一日於北大

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台被殺是政治性暗殺的種種事實

李何林

前年四月我從台灣大學逃到上海，經過平津，進入華北解放區。當時距離哄動全國的許壽裳先生在台灣被暗殺事件的發生不過兩月，大家記憶猶新，各地友人相見，均以「有無政治原因」相詢。我當時倉卒間簡單的答覆是：「有，有種種情形和證據，證明不是小偷殺人，有政治原因。」間亦畧述事實，但未能一一詳舉。今許先生被殺已二週年，我又來到了許先生所曾經任教多年、而且長期居住過的北京；他的親友和學生們見面時，仍多詢及「有無政治原因？」他們似乎被蔣匪集團這一次暗殺的巧妙安排或掩飾，以及中央社的欺騙宣傳所影響了：不能肯定「有政治原因」。

許先生在「台灣省編譯館」任館長，在台灣大學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我都和他同事，在約一年半的時期中，朝夕相處，他把我當着一個進步的人、可以和他深談的人看待。他向我要香港「華商報」和「文萃」等進步刊物看，他託我代買進步書刊（如買過范文瀾同志著的「中國通史簡編」等），他向我談：他遭受台灣特務在報紙雜誌上的一再惡毒謾罵，造謠中傷，他憤慨，但不答覆：「沉默是最好的答覆！」他被暗殺後的一切情形，和反動派在宣傳掩飾上的一切安排與佈置，我都親眼看見；我了解許先生的處境和反動派對他的情況，我能綜合他被暗殺前後的一切情況，得出結論說：「這是蔣匪集團幹的！」我面對着這樣一位相當進步的、鬚眉皆白的、被殘殺的善良學者，魯迅先生的終生老友，「亡友魯迅印象記」「魯迅的生活與思想」的作者，我不得不寫下這篇紀念文來！

許壽裳先生于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在台灣省會台北市寓所床上，於睡夢中慘被砍殺；十九日晨噩耗傳出，全市震驚！人們很快的聯想到這是聞一多第二，因為他們都是開明的有良心的學者。但也有人以為許先生沒有聞先生為民主鬥爭的政治積極性，或者不會是政治性暗殺？猜測紛紜，莫衷一是。然大多數人以為既決不是「仇殺」，也決不是「圖財害命」，則真象易明。因為許先生一生待人和藹寬厚，決無仇人；向為公教人員，廉潔自守，毫無積蓄，無財可圖——即使是圖小財，而外省人在台灣被本省窮苦同胞偷竊者，二年多以來又何止數千起？被偷者連受傷的也沒有，何況被殺！剩下的一個可能性，大家就都以為是政治性的暗殺。故當時除特務及其外圍工作人員外，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的公教人員及工商界人士，無不痛憤于當局的這一暴行！這樣一位蒼然白髮、鬚眉皆白的六十六歲高齡的文字學教授，他平日教書不問現狀，作文不談政治，今竟被暗殺，真是人間何世！所以就是當時把持在政學系手中的上海「大公報」，也在二月二十一日刊出一篇紀念短文：鄭士鎔作「悼許壽裳先生」（聞鄭係陳儀時代長官公署的機要秘書），予叙述許先生的為人及在編譯館時許多成績以後，末段痛云：「世變日急，豺狼橫行，這還成什麼世界！豈將殺盡天下好人而後已耶！」（手邊無該報，未能全錄）故雖在三日內兇手被捕，當局在報上宣佈所謂「案情大白」，中央社向全國播送這「圖財害命」案子發生的經過及兇手供詞，欲釋群疑，而群疑滋甚！當時台灣的公教人員及一般社會人士仍然感覺許先生被「小偷」殺的可疑，大家都向政治原因方面聯想；全國其他各地人士亦多如此。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特務這一次沒有用殺聞一多李公樸兩先生的手槍，也不是公開的殺死在街頭上，而是用柴刀，用台灣一個工人在偷竊的煙幕下執行，以期混淆天下人的耳目，但明眼人是決不相信的，煙幕終被人認為不過是煙幕。筆者現在提供一些事實來證明，以供大家參考；另方面也替許先生洗一洗他的不白之冤！

一、被暗殺前許先生遭嫉的原因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的私交固然甚厚，同時他和陳儀的私交也頗深；所以許先生之去台灣任「省編譯館」館長，是陳儀約去的；據說陳原想請許先生任台灣大學校長，因教育部通不過，未成。其實自魯迅先生逝世，許先生不斷為文闡揚魯迅先生的人格和思想以後，CC及一般文化特務早已對許先生大不高興了，所以在抗戰初期，許先生即被擠掉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文學院長的職位，自那以後許先生即未再能作一個公立大學的校長、或院長，只能在一個教會大學（成都華西大學）教教書，在考試院作一個沒有實權的專門委員；勝利後陳儀才把他約到台灣去。在政學系的陳儀統治下，CC未能阻止許先生被任為省編譯館館長。（這是蔣匪集團內部矛盾）許先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抵台，不久即開始在台北市出版的一個比較開明的雜誌「台灣文化」上發表關于魯迅先生的文章，前後一共大約有

七八篇，後來集印成一本書，叫「魯迅的生活和思想」。但這中間立刻惹來了黨軍兩方面文武特務的譏罵：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為發行人的「正氣」月刊上面，首先發表了曾今可化名的文章，（曾今可已不只是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無恥文人，在台灣還是一個文化特務，）說魯迅這人怎樣壞，怎樣壞，至多不過寫了一點小說，會罵罵人而已，有什麼了不起！你許壽裳不應該因為和他有私交，就亂捧一陣，那害處是很大的，云云。以後聽說還有這一類罵許先生的文章刊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台灣辦的「中華日報」也登過這類文章。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主任委員莊鶴礽為發行人的「平言」雜誌，登過一篇「羅孩師資」，那簡直是以造謠代謾罵了：它造許先生兒女的謠言，想藉此中傷許先生，說本市某大學（台北市僅有一個台灣大學）的一位老教授，他的兒子在本市某學院也作教授（許世瑛在省立師範學院任教）；他的這位兒子和兒媳如何鬧離婚，家中鬧的如何糟……，全與許先生兒媳辦理離婚事實經過不符。文中又說：「這位老教授的女兒在該大學讀書，終日招蜂引蝶，以戀愛為事，男友甚多，老教授不但不加阻止，心中反以為我的女兒長的漂亮，理應這樣惹人喜愛。」真是憑空造謠，擠眼說謊，極盡下流無恥之能事！許世瑋小姐在台大有一位男友是事實，但並沒有許多男友；她也並不漂亮，既不燙髮，也不塗脂抹粉，招什麼蜂，引什麼蝶？而且他們這些東西怎麼知道許先生「心中」的情形！謠言居然造到別人的「心中」！

這些文章許先生都看見了，他一概置之不理，他向我說：「我既不答覆，也不辯解，別人自然一得出他們的下流和無恥！我若理他們，反而抬高了他們的價值。」但許先生並非不會回答，他的回答是：加緊的完成了「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于一九四七年底在上海出版了。那後幾段講到魯迅先生後半生在上海十年間鬥爭的情形，取材是如何大膽，寫的是如何疾惡如仇啊！那一定觸到了國民黨反動派過去罪惡的瘡疤，引起了他們的不快。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間許先生還應台北市記者聯誼會的邀請，去演講了一次，講的也是魯迅，又大「捧」了一番，文武特務們亦莫奈何他。

許先生在編譯館時，有一次在紀念週上向全體人員鄭重地宣佈：「我們編中小學教科書，要有人民大眾的立場，要合乎科學和民主，我們不能開倒車、復古、或落後！」當時在那種法西斯反動統治的環境中，一個政府機關的首長，居然敢公開說出這樣的話，不能不令人興奮！一九四七年一、二月間，上海大公報在社論地位刊出了一篇批評「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的文章，作者的姓名我已經忘記，它嚴厲地指責了這些教科書的落後、倒退、反動，以至法西斯的思想和內容；（那時的大公報「小罵大幫」，對這類小問題是要表示它的「進步」的。）許先生看過後，把它剪下來，送給全體人員傳觀，說「以供參考」。大家想想，有五六十個工作人員的編譯館，裏面能沒有「做情報工作的」（即「特務」）麼？許先生的這些言論和行動，隨時都被作為很好的「情報」，報告上去了。

以上許先生的這些「罪過」，日積月累，當然越積越多；但有陳儀在，一切得平安度過。「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全省人民反蔣政權大暴動）後，許先生又作了一件令特務們大不高興的事情：三月二十八日編譯館兩位編審張常惺、劉世模被警備司令部第二處（即特務處）捕去了，許先生去找陳儀三四次（陳兼警備司令）催得很緊，說「這二人平日思想言行都很好，且都有病，一切由我担保，請快點釋放。」結果一人押了八天，一人十天，先後釋放了。假使沒有許先生和陳儀的交情，或者許先生不這樣熱心去營救，他們一時兩月內是不會出來的，一個瘦弱、一個胃病，他們多半要瘐死在獄中！許先生在這件事情上，使特務們覺得「這個老頭很可惡！」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政府宣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以魏道明為主席。陳儀是下野了；編譯館的人覺得各種工作都只作了一半，尤其是暑假後急需的全套中小學教科書，須到七月底才能完稿，編譯館是否會隨着陳儀離職而很快的取消，許先生大約也未料到。他和新發表的省府秘書長徐道鄰曾三次同事，但許先生不去看他，以免有為自己職位活動之嫌。那知五月十五日魏道明抵台，在十六日上午第一次的省政府會議上，即由魏親自提出裁撤編譯館一案，當然一致通過；這表明這一案是魏道明從南京帶來的，不是到台灣後一夜間匆促的決定。南京的CC大約早已得到台灣CC李翼中（省黨部主任委員）關於許先生的許多情報了。陳儀既去，編譯館如何能不立即撤銷，以免遺「毒」將來？但省政府宣佈裁撤的理由，是「節省開支」。而奇怪的是，「交響樂團」養了一二百人，每月經費比編譯館多，工作的意義沒有編譯館大，並沒有被裁掉，編譯館被裁的原因還不夠明白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許先生為「台灣文化協進會」（上述「台灣文化」月刊即該會編印）計劃了文藝講座的舉行，把中國三十年來的新文學介紹給台灣，所有約請講者，擬定講題，都是許先生作的，共講了八個晚上，雖在環境的壓迫和限制之下（也要料到一定有特務在聽講），有二三位講者也還相當大膽地用進步的觀點講述了中國新文學的各方面——這是不是可以使特務們認為：許先生是台灣文化教育界進步份子的領導者和組織者？（講者共十人，有六人是台大教授）「打蛇先打頭」，「殺雞駭猴」，先消滅許先生以警告他人呢？

有了以上這些事實，請大家想想許先生的被暗殺是不是政治性吧？但證據還不僅于此，請再看以下的情形和事實：

二、被暗殺的情形，破案經過，及其他可疑之點

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過上海，和朋友們談到以上許先生在台灣時的情形；朋友們都說：「既然這樣遭特務們的嫉恨，許先生倘使隨陳儀離開台灣就好了，他為什麼不走呢？」我說：「照以上情形看，依常情而論，政府未必重到要殺害許先生的程度，因為全國各地大學教授及文化界人士，有很多比許先生更惹特務們的痛恨，但除聞李二先生外，尚無公開被殺的。況國內正在戰爭中，台灣被大家認為是世外桃源，編譯館裁撤的消息一在報上宣佈，三五日內台灣大學就把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聘書送給許先生了（這表示特務還不能支配校長陸志鴻，陸是一個學究型的人，對文化教育以至政治的思想還糊塗，對許先生的為人則表示欽佩）。這對于許先生是很合適的工作和很合適的生活環境，所以他沒有走。」朋友們說：「特務們的行為是不能依常情論的；他們要把台灣的進步份子肅清，使他們的統治鞏固、預備京滬危險時把政府搬到台灣去。惟其因為許先生不如全國其他教授對于政治積極，使大家認為不夠暗殺的資格，特務們才方便殺他，而達到警告他人的目的。」當然這種警告是沒有用的，只有使人更痛恨這種殘暴黑暗的統治！

許先生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暗殺了，十九日晨一個朋友的女孩騎着自行車來通知我這噩耗，我立刻跑到青田街六號許先生的寓所，看見昨天還見面的面帶紅潤精神矍鑠的許先生，現在已經面無血色，躺在床上。在頸下頭部幾乎被砍斷了，肌肉向外翻着；一個慈眉善目、蒼然白髮的老人臥在血泊中！太慘了！看的人無不流淚！並且都以「唉！唉！」的長的重的嘆息，來表示他們的憤恨！有人說：「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世界！」我當時立刻聯想到李聞二先生被害後停放在雲南大學醫院裏血肉模糊的慘狀！我咬牙切齒，心裏想：這些血仇，我們必須

要報！「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語)。我們決不能寬恕，也決不應該寬恕他們！時間愈久，我們要記得愈牢！我們要為死者復仇！我們要報復！革命雖然不是報復主義，但也不是婆婆媽媽的人道主義！對于毫無人道的人，也不應該講人道主義！我們大家要記住！

警察、憲兵、便衣特務們、廳長、處長、參謀長、校長、院長、市長、局長、法院醫生……都來了，他們在詢問今晨被發覺時的情形，在各處查看，取指紋，在探問許先生家的事，在翻看許先生的日記和私信(警察拿去了許先生一本日記，和很早以前沈鈞儒先生的一張名片)。在追問十三日晚被竊的自行車的下落。在研究凶器，那一把劈木柴用的刀，一位便衣人物說：「根據這把凶器，我們就可斷定兇手是什麼身份。」這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貧民小偷才只會有這種凶器，政治暗殺向來是用手槍的。但我們也可以轉過來說：誰也想避免是政治暗殺，他們才故用柴刀！當時同行台大的幾個學生在低聲地說：「事情很明白，不要再追問什麼自行車的下落了；十三日夜來偷自行車也是煙幕，是先來踩着路線，預備怎樣下手的！偷東西都是煙幕！」

十九日下午大家在許宅斜對門的李季谷宅(李是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後為偽國大代表，戰前許先生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時，李任教務長，相交已久)，開治喪委員會的籌備會議，教育廳長、市長、台大校長、教授們、新聞記者、省政府新聞處長林紫貴(後為偽國大代表)……等均出席。會後，林紫貴低聲地向全體新聞記者說：「明天大家發新聞，要指出來或暗示出來這件案子與政治無關！」事後一位朋友說：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說法，越說明越壞！

這件案子使台北市的人心驚疑不安，議論紛紜，各機關學校都在談論着：倘是政治暗殺，則台北市的公教人員夠資格的就很有一些；倘是小偷殺人，圖財害命，兼因台灣人仇恨外省人(並非全體)，及台灣青年在日本武士道教育之下殘忍成性，因而有此殘殺，則全體外省籍公教人員的生命，就太危險了；所以二者無論屬于那一種，都使人心不安，必須很快地破案，以安人心。「狗急了咬人」，二十一日的中華日報(不要忘了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台辦的報紙！)上就登出了一段新聞，大意說：案情已獲八九，即許世瑋小姐的男友陳耀祥的皮鞋上留有血跡，陳在警察局已承認，……而許先生不贊成他們的婚姻……云云，消息刊出，真是仇者快，親者痛！真象好像已經大白了。但偏偏也就在廿一日，所謂「真正兇手」高萬俥被捉住了，「人贓俱獲」，(我想這是特務內部之間以及特務和中華日報之間，沒有聯絡好)，二十二日的報上就登出了破案的經過，人贓照片和兇手供詞。同日中華日報並用一行小字聲明：「昨日本報所刊許小姐與陳君新聞一則，查與事實不符，特此更正。」與事實不符，就是造謠污衊，就是血口噴人，就應該賠償被害人名譽上的損失！所以台大有一部份學生憤激異常，主張對該報社去質問，要求公開道歉，賠償損失；經人勸解，恐釀成更大的事端，有礙許先生後事的料理，他們才沒有去。這種乘人之危，不擇手段的造謠害人的東西，當時實在應該把它砸掉！

許先生對于陳君是不很滿意的，但也並沒有阻止他們的來往；即在許先生被暗殺前的當日晚飯席上，陳還在許宅與他們全家五人(外加長子世瑛)共餐；所以中華日報的造謠消息刊出，一般知內情者都不相信兇手會是陳君。

兇手初被捕時，供出還有一個幫兇；此事以後不但報上未提，即法院亦未再認真追問。只是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在最後一次作為「公審」時，(像公審李聞的兇手似的，事先都編好了一問一答的詞句)，法官淡淡的很快的問了一句「有人指使你沒有？」兇手答「沒有。」就過去了。二月二十九日的追悼會已經開過了，許先生的家屬有一天去問李季谷：「兇手初被捕時，供稱有一個幫兇的，現在怎麼不追究了？」因為李與官方頗有往來，此次許先生的喪葬及追悼會的籌備等對外一切事宜，都由李一手辦理。(開追悼會的那一天，事先台大學生們知道大半是些黨政特務出席說話，屆時去的人很少；大家認為這樣紀念是侮辱許先生；以後上海舉行的追悼會也一樣，)李答道：「因為要是當眾追究，怕幫兇聞風跑了，不能破案，所以沒有在報上再提。」這是李在替特務當局作辯護。同時，早在十五六年前魯迅先生在致李霽野的信裏面就說過：「貴本家教務長乃壞蛋一枚！」(見「魯迅書簡」一書)當時李季谷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務長。抗戰初期他作湯恩伯的幕僚，當過豫皖政治學院院長，和許先生雖然是多年相交，但以友人的血作為自己榮華富貴的資本的人，我所見所聞的已不少了。此次暗殺即使李季谷沒有參與，但也確盡幫忙掩飾之能事！

報上發表的兇手供詞中有一段說：「晚上八時我跳牆進到許宅的院裏，在牆角黑暗處等了約二小時，進到會客室裏，在沙發上坐了二三小時，約摸許舘長睡熟了，我才到他睡的屋裏偷東西，聲音驚醒了許舘長，我看見他拿一白色東西要打我，我才拿刀把他砍死的，砍死以後我又繼續偷東西。」這情形與事實不符，十九日上午我在許宅，法院的法醫說：「在睡時被殺死的人，兩手是握得緊緊的，成拳狀，現在許先生兩手伸得平直，是在睡夢中被砍死的。」而且在黑暗中，兇手怎能看見許先生手裏拿的是一個白東西？假使許先生在醒的狀態，你砍他第一刀後，第二三四五刀(共砍五刀，據法醫說)，他能不躲閃麼？怎能叫你四五刀都砍在一個地方？顯然是在睡夢中，老老實實地被砍死的。而且兇手是進到屋裏先殺人，目的是在殺人，殺了人然後翻東西；翻東西，偷東西，都是煙幕。

兇手被帶到許先生的靈前，竟然放聲大哭了起來：「『許舘長，我不該殺你啊！』」警察就把他很快的帶走了。中央社陸續發的消息上說：『兇手是被許開除的前編譯舘工友，由于失業，所以懷恨在心』，又說：『許舘長罵過他』，『兇手好賭，因需錢甚多，所以偷人』，『兇手在日本統治時代曾經從軍，作過殺人犯，光復後得教育』，『兇手在日本武士道教育之下，殘忍成性，故下此毒手。』事實呢？事實是：許先生不但對職員和氣，對工友也和氣，他從未罵過工友。兇手在編譯舘時代常到許宅工作，每遇有水果或點心，許先生常請他吃，待他甚好；許先生並未開除過他。編譯舘結束後，兇手繼續在接收編譯舘工作的編審委員會裏工作，直至本年一月底即殺許先生的十八天以前，才「自行辭職」，「另有高就」(據該會事務主任毛守仁說)。好賭與否，筆者不知，但報上說他在讀「高級日語補習班」，他是一個修理電燈自來水的技術工人，二十一歲，上進之心還有，該不會怎樣好賭的。從軍或者有之，供詞上並沒有說作過殺人犯，日本武士道教育所影響的台灣青年何止他一人？因蔣政權的統治而失業，而飢寒交迫，迫得偷人的台灣青年，又何止千百人？外省籍公教人員二年多以來被偷者，全省又何止數千人？何以都未殺人？都未被殺？連傷人受傷的也沒有？難道許先生是老人麼？丈夫出外，婦人小孩留在家裏而被偷的也並不少，何以都未殺？

煙幕一面在報上散佈，一面還要用口頭宣傳，關于破案經過，有下述一段神話似的故事：據說是台北市警察局長說出來的，很快地就流傳開去。許宅親友及台大教授等知道的人很多，這不是我的捏造，我是聽李季谷在一次治喪會上說的，我也問過許先生的一位親戚，他說：「奇怪，想打聽一下對門姓白的是做什麼事的，只聽說是白崇禧的姪子。」我說：「這就夠了，一切還不明白！」故事是這樣的：「當局限短期內破案，警察局長忙了二天，毫無頭緒，非常着急，他是迷信的，就禁不住禱告，說：許老

先生！你的案子，我們雖然努力偵緝，但是毫無線索，請求你老人家在天之靈幫助我們一下，你顯一顯靈，我們把這個案子破了。給你老人家報仇。禱告是在廿日下午作的，二十日晚間許宅對門白宅，有四人在打牌，忽然一陣風吹來了一束桃枝，掛在窗子上，院內是沒有桃樹的；繼之是一把掃帚從外面飛進院裏來。對面許宅昨晚剛發生兇殺案，今晚這裏又鬧掃帚和桃枝，大家不禁毛骨悚然；當即報告了警察局，局長以爲是許先生顯靈了，就研究出來說：掃帚是告訴我兇手是拿掃帚掃地一類的人，是工人，是與許先生有過關係的工友；桃枝是表示兇手逃向桃園（離台北一小時火車路）去了。于是就傳訊所有過去當過許宅去的舊編譯館工友及許宅用過的女工。其他都不是，結果就抓住了高萬俥，他已買好了火車票要到桃園去，從火車站回來拿東西，就被捕了，當即搜出贓物一部分，人贓俱獲。案子就這樣得到許先生的幫助，找到了線索。」這是告訴社會：他們有這樣線索才破案的，兇手不是他們自己獻出來的。

其實傳訊工友並不在二十日晚間以後，十九日下午已開始傳訊了。警察局長會否禱告，白宅會否飛來一束桃枝、一把掃帚？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聽人家有計劃的在散佈的。兇手怎樣被捕，被捕時的情形怎樣？我們也不知道，一任中央社和官方的報道。

台大陸校長在許先生被害後約一個月，一天和省立博物館館長也是台大教授的陳兼善閒談；陸說：「有人說，許先生要去作長春大學校長。」陳說：「這有什麼關係，那是我們這邊學校。」陸說：「說的人意思說許先生想在那裏等候八路軍；又說許先生要去解放區作魯迅大學校長，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這樣一個大學？又說本校文學院有左傾教授，許先生就是一個，其餘還有。」這個談話是另一位台大教授聽陳兼善說，然後告訴我的。陸校長之所謂「有人」，一定是蔣政軍方面的人物，是特務方面的情報，說不定是想藉此警告陸校長的。特務們眞以爲這是事實，那他們還肯留着許先生去作解放區的校長嗎？

謠諑汚蔑也好，用種種方法散佈煙幕也好，終於遮掩不住人們的眼睛，也模糊不了人們的心！以上我敍述的那些事情，雖然瑣碎一點，但不這樣全盤托出，不足以見出事前後的政治意義，不足以看淸這一慘案的眞象；也不足以透澈了解蔣匪集團種種卑鄙汚濁的手段！

「殺人償命」理所當然，而況殺得太慘，對此案人人痛恨；所以台灣法院不得不判決死刑。但在剛一宣判，兇手還未決定是否上訴時，報上就登出台灣法院表示：「爲愼重人命，保護人權起見，兇手如自己不上訴，法院決代爲上訴。」這好心眞是難得啊！可惜對於在台灣陸續被捕的青年和民主人士，未見法院作過同樣的表示，你怎麼不限他那些將寫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呢？你怎麼不執行「提審法」呢？兇手也終於上訴了，上訴到「南京最高法院」。筆者到現在爲止，也不知道所謂「最高法院」會否把兇手判處死刑？不過，即使最後判處死刑，也看是否拿別人替死，像槍斃聞一多的兇手似的，（殺李公樸的兇手至今無消息），即使眞正當衆「驗明正身」，確把高萬俥處死，那也不過表示他是被別人收買或愚弄的一個可憐犧牲者，臨刑時口裏塞上棉花，不能言語，或竟自始至終他並不知道自己是被愚弄收買的，雖能言語，也說不出別人。但事實的眞象是這樣麼？眞正的兇手是誰呢？

一九五〇年二月於北京中央教育部。

（上接第二頁）

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人民郵電部公佈中朝通郵通電協定。

政務院舉行第十七次會議，通過天津、成都、歸綏等市市長人選。

西北軍政委員會首次會議閉幕，通過彭德懷主席關於目前西北地區工作任務等報告。

河北省人民政府組織救災委員會赴重災區工作。

蒙古外長拉姆蘇倫發表聲明揭露艾奇遜企圖破壞中、蘇、蒙友好關係的陰謀。

一月二十八日

全國婦聯舉行常委擴大會議確定今年婦運方針任務。

民盟召開二次中常會。

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向劉副主席呈遞國書。

土可曼共和國成立廿五週年，聯共中央致電祝賀。

法共書記多列士指斥反動派威脅和平。

一月二十九日

新疆省鮑爾漢主席揭露前美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勾結股匪從事間諜活動陰謀。

政務院指令鐵道部製訂貝體工作計劃，分季按月保證實施。

華東軍政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饒漱石主席報告今後總任務。

一月三十日

新華社受權痛斥美帝一連串愚蠢造謠。

解放軍總部發表上月份我軍戰績，消滅西南匪軍七十八萬。

鐵道部發佈全年工作計劃概要。

賽福鼎率新疆省人民政府代表抵莫斯科參加中蘇會商工作。

蘇越建立邦交。

一月三十一日

紀念北京解放一週年，葉市長廣播演說。

政務院頒發全國稅收實施要則。

首都證券交易所開幕。

（上接第三十六頁）

產資料的成本是六六．八五元，抵償生活費用的是一八三．八六元，剩餘勞動的收入爲270.15元—(66.85元+183.86元)=19.34元，而佃農所受的地租剝削爲二八．五一元，那末，地租不但奪去了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而且侵佔了農民的必要勞動（即一八三．八六元）的百分之三十七．二六。因之，農民便生活在極端的貧困裏，因之，也便無力改善農田的經營。同時地主利用其對土地的壟斷，還給佃戶加上了許多的額外剝削，如要給地主拉抗抹牆，紅白喜幫工，年節送禮等。而地主富農還利用農民的貧困以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及其政治勢力來盤剝農民。

問：富農屬於半封建剝削嗎？爲什麼說半封建土地制度比封建土地制度還要苛？

答：不，不能籠統提出「富農屬於半封建剝削」！因爲富農有兩種：第一種是在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存在的富農，他們和地主階級一起壟斷了土地的絕大部份，他們雖然自己參加主要農業勞動，但是經常依靠以半封建方法剝削僱工，或以其它封建剝削，如出租部份土地，特別是其中的壞地。富農中也有兼做二地主的，他們之中，都利用其餘糧餘錢放高利貸等，作爲其主要或重要生活來源（封建性剝削收入超過其總收入的二分之一，在一般條件下，也都超過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我們稱這種富農是舊富農；他們和地主結合一起成爲農村中的統治者。這種富農是半封建的階級。

第二種富農，是在推翻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後，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由那些勤勞致富的農民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農民。因之，這種富農的剝削屬資本主義性的剝削，而不是半封建性的剝削。

根據以上的回答，就不能說「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比封建的土地制度還要苛刻」，因爲它不是兩種互不相同的制度，當然也就不能互相比較。

那麼，是否半封建性的剝削比封建性的剝削還要苛呢？也不是。而相反的，一般的說，地主的剝削是封建性的，富農的剝削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土地法大綱中就規定了對地主和富農不同的處理辦法。

（一月二十七日東北日報）

售價與訂費

自二月十五日起，本刊每份售人民幣二千元，訂費調整如左：

三個月六期：一萬二千元

六個月十二期：二萬四千元

外埠訂費于二月十五日以後寄到本社者，均照新價計算。

原文献残缺

北京大學一年來的改革與學習

彭越明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上大轉變的一年，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了。新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圍繞着「新民主主義」這一個目標為中心而加以改造，在學校裏則以搞好新民主主義學習為中心任務。本文準備介紹北京大學在展開新民主主義學習這一年來的改革過程與其學習進行情形。

教學改革的三個階段

自去年一月北京解放到現在，已整整一年了，北大一般教學的改革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從接管到校務委員會成立——北京解放，同學們都異常興奮，因為多少年來渴望着的一天終于來到了，所以紛紛展開了對改革學制的討論。但是因為這時學校行政上沒有一個領導機構，而政府方面對一切又極慎重，高等教育方面是採取「暫維現狀，逐步改革」的政策，僅對不合理的訓導制度及若干反動的課程予以取銷。因此同學們對于學制改革的討論不久又沉寂下去，在這個階段內對業務課的學習情緒也不太高，所以這可以說是一個彷徨摸索的階段。

（二）校務委員會成立至去年上學期（即一九四九年春季）結束——一九四九年五月，校務委員會在北京文管會領導之下正式成立了。學校行政開始有了領導，一切設施也在逐步改革中。校委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課程改革工作，這是針對同學們的迫切需要而來的。譬如大一國文改為選修，大一英文則改革了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並且開出了一些新課如「新哲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等。這時同學們的學習情緒普遍提高，尤其是法律系更有大刀闊斧的改革，差不多大部分的舊課都停開而以新課代替了，可說整個捲入了新的學習高潮。這個時期內，「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也宣告成立，具體來領導各學校的改造工作。不過這個時期內，理工農醫各院系課程多涉技術，所以沒有多大變革。

（三）去年下學期（四九年秋季）開學到現在——這是正式展開新民主主義學習的一個學期。早在去年暑假中，為了準備下一學年的學制改革工作，各系大都召開了師生大會，展開對課程改革、教學方法、學校行政等問題的討論，各項改革的準備工作大都在假期中完成了。各系課程也都確定：那些是要停開的，那些是要增開的，那些課程的內容應加以改革等等，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這時高教會根據了各校的意見並經過反覆討論後，將文法兩學院的具體課程也規定而公佈了。並且加開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門政治課程，為各院系共同必修。以下擬就政治課的學習情況和收穫及業務課的改造情形分別來談談：

政治課的進行和收穫

關于政治課方面：去年九月十日高教會曾召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座談會，會上決定各校在四九年秋季要加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課，為全校同學共同必修，目的在使同學能正確建立與掌握唯物的觀點、無產階級的立場與辯證的方法；以自學為主，討論為輔，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並且要通過政治課做到「師生互助」與「教學相長」。學校方面在學期開始時就首先成立了「政治課教學委員會」，由校委會聘請教員四十人，黨團代表及學生會代表共同組成，以領導政治課的教學。政治課學習全校共分十七個大班，一百九十個小組，每小組大約十五至二十人；學習採三三制：即三小時大課，由教員作啟發報告，並進行大班討論，三小時自學，三小時小組討論。完全採取了新的學習方法，一反以前那種教條的、注入式的教學方式。學習的內容主要為「社會發展史」，已經進行了：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世界；五種生產方式與階級鬥爭；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國家與政治；社會思想意識；共同綱領等。同學們在小組會上大都能將理論聯繫實際，並且暴露自己的思想，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所以經過一個學期的政治課學習以後，可以說在思想上大體都提高了一步。

在政治課學習以前，同學們的思想情況是很不一致的，免不了有些知識分子的自大性，認為自己的思想沒有什麼改造的必要，「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超階級的思想還是濃厚而普遍的存在着，有的以為只要精通業務就夠了，有的甚至以為「無產階級」領導只是一種政治口號。對政治課的看法則有的以為自己的理論修養已經很好，不必再學了；有的則希望教員給予一些理論上的知識，不明瞭政治課主要是用來改造思想的；學理工的同學則認為他們學自然科學的不必學什麼政治課。

在學習了一學期政治課以後，多數同學的思想上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並且也解決了好些以前曾經懷疑的問題，初步建立了勞動觀點、階級觀點、群眾觀點與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明白了社會發展的規律：知道在階級社會裏超階級是不可能的；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結合才有前途；知道為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需要改造；對國際主義也有了新的認識，關于中蘇關係與東北問題也搞通了。學習情緒由冷淡轉變積極，也不再厭惡集體活動了。

在師生方面也不再像以前只限于是講壇上的關係，教員們大多參加了同學的小組討論，與同學生活有更進一步的接近。再則一般同學與黨團的關係也有了改變，有些人以前總覺得學術要自由，黨團不應在學校活動，這種超黨派的思想現在已根本不存在，反倒發現黨團員同學在學校裏能帮助同學改造思想，有推動學習的作用。

這期政治課之所以有這樣的收穫，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革命形勢加速發展，同學們的政治認識與覺悟程度一般提高了；並且暑假中很多同學參加了學習團、訓練班與其他各種工作，思想提高了不少，進步的同學們又能帮助落後的同學解決不少問題。2.政府的重視與學校的領導——高教會（現在為教育部高教司）至少每一個月總要舉行一次政治課座談會，各校教員都參加討論；學校的政治課教學委員會與全體教員也盡了最大的努力。3.學習方針把握得正確：如着重理論聯繫實際，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並且課程進行也是有重點的與有系統的。

業務課的改革

關于業務課的改造方面，這裏分別從課程改革及精簡、一般學習情況、教學方法的改進與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點來談：

在這學期開學時，文法兩學院的課程已經基本的改革了：應該開的新課差不多都開了出來，應該停開的舊課也大都予以停開。如哲學系停開了「知識論」、

「形而上學」、「孔孟荀哲學」等，新開了「辯證唯物論研究」（艾思奇所開）、「毛澤東思想方法研究」（胡繩所開）、「費爾巴哈論」、「自然辯證法」、「黑格爾哲學研究」等；史學系加開了「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史學名著選讀」、「俄國史」、「亞洲各國史」、「民國史料研究與整理等」；中文系改「西洋文學史」為「世界文學史」，新開「文藝學」（楊晦所開）、「民間文學研究」等；西語系則添設俄文組，以曹靖華先生為主任。東語系新開「國際問題」、「民族問題」、「東南亞各國國別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印半島及馬來亞歷史」等，語文課程更空前增多，如梵文、藏文、阿剌伯文、日文、蒙文、暹羅文、緬甸文、安南文、朝鮮文等，還有「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如倮儸語文等）；法學院三系共同開了「政策法令」，法律系新開「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馬列主義法律理論」、「刑事政策」；政治系有「馬列主義名著選讀」、「中國地方行政」、「東南歐政治經濟現況」等；經濟系有「現代中國經濟結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近代中國經濟史」、「資本論研究」、「政治經濟學」等。

理工醫各院的課程則在名稱上沒有什麼改變，但內容上則大都有了改變，並且開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研究自然科學。

四于精簡課程方面：這一學期以來，由于同學普遍高漲的學習熱情與部分同學的好高騖遠，以致選修學分數目較之往年普遍增加，最多有超過二十七學分者，以二十至二十五的為最多。結果師生整天忙于上課下課、趕看參攷書、趕習題、趕報告，完全處于被動狀態，無法求得透澈的了解，不能主動地有計劃地展開學習。同時，另一方面，又嚴重地影響了同學的健康，因為每人每週學習時間都超過七十小時，工學院有工作八十五小時者，醫學院則有一位同學根本沒有好好睡過，只和衣躺一會兒又起來工作。針對此種情況，適當的精簡課程已成為必要。首先校委會廣泛蒐集同學與先生意見後，規定出學分制度的變通辦法和學生選修學分總數以不超過二十個學分的原則，並號召同學每週學習總時間不得超過六十小時，如有超過，各系級可根據具體情況精簡課程。在開始實行時，部分教授與同學有不同的見解：有些教授以為精簡課程學生就會偷懶，不好好學習；有的學生認為精簡了課程，教授只能講些基本課程，既不「高深」，也不「難懂」，有失學術「尊嚴」。在學習了「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文教政策」之後，大家認識到精簡課程不會降低功課水準，而是為了求得對課程深入透澈的理解，於是精簡課程乃得交付實行。各院同學退選了不必要的課程，保持十七至二十個學分，教授即精簡講課內容，或調整課程鐘點，或停開一部分不必要的課，或將一些必修課程改為選修。

各系級精簡課程時，一般是師生合作，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共同提出精簡計劃，並且在實行中逐步改進，這樣也就推動了課程的改革。文學院各系各班並規定了一門或兩門為重點課程，師生集中力量共同討論，共同搜集資料來改造、充實其內容，如中文系重點課為「文藝學」及「中國文學史」，西語系重點課為「俄文」及「英文散文」，哲學系則以「唯物辯證法」為重點等。

經過了課程改革與精簡之後，師生的教學信心都加強了，同時學習情緒也大為提高，這可以具體的統計數字來比較與證明：譬如圖書館的閱覽人數，去年一月份（尚未解放時）是三五、二五九人，五月份四四、六二四人，十一月份（課改以後）為五五、七六〇人；出納圖書去年一月份是一萬五千册，五月份為二三、七六五册，十一月份為三三、四三一册，增加在一倍以上。因為課程的適當精簡，使生活趨向了規律化，加強了學習的計劃性，提高了學習的效率。

教學方法方面也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別。如中文系的「中國文學史綱要」的教法，甚為同學稱道，該課完全運用了「唯物史觀」來講文學史，在每講一個階段之前總是先分析那個時代的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以後再來講文學如何如何；別系的不少其他的課程也都是如此。並且在教前先定好計劃與講授大綱，交同學討論後再為講解。政治系的「政治學概論」一課由該系四位教授共同負責，各人分担一部分，教材是經過集體討論後才拿上講壇的。還有「中國地方行政」一課是請北京市人民政府各局處負責同志分別担任一個專題報告，如「解放區行政組織」，「土改工作」等。這是學校與政府各部門取得密切聯繫的先聲。

這一階段的業務學習當然也存在一些缺點，如：第一、課程改革未完全掌握馬列主義觀點，此種現象在若干課程中比較顯著；第二精簡課程，距離理想尚遠，量的調整與質的提高尚未能達到合理的標準；第三行政對于教學雖已逐漸發生領導作用，但尚缺乏全校性的通盤計劃，各院系的計劃也不夠完整，因此院系之間的聯繫和課程間的配合尚嫌不足等。

學習經驗的總結

為了總結這一階段的學習經驗，鞏固學習成果，並克服一些目前可能克服的缺點以便把新民主主義的學習更推進一步，所以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召開了一個全校性的「師生代表會議」以「總結學習」的方式來紀念北大解放後的第一個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根據這個會議的一些報告和提案可以總結這階段的一些經驗如下：

一、關于行政領導教學方面：學校行政應克服過去偏重事務的缺點，以領導教學為其中心任務。因此應建立校、院、系三級領導教學的制度。過去院、系務會議組織龐大，行政性與群眾性不分，未能充分發揮領導作用，故應成立院、系務委員會，由院長或系主任、教員代表和同學代表若干人組成之。院、系務委員會作為集中領導的機構，人數宜少，分別對校、院務委員會負責，在院、系務委員會中，院長、系主任應有最後決定權。院、系委員會的任務為討論和參與製訂院系教學計劃並檢查其執行，至于各系教員間教學內容及方法之研討、經驗之交流及教學任務之具體保證，則可在各系工會小組內實現。

二、關于課程與教學方面：課程應着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繫，再行精簡，並確實作到每週學習鐘點不超過六十小時。課程的訂製應有通盤計劃，除各有關院、系、科須取得密切聯繫外，每門課程的內容、上課時數及進度，亦須同時規定，並須按時完成任務。教材的選擇，應符合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教學法應本「師生互助」、「教學相長」的精神注重啓發與討論。

三、關于政治課學習方面：進行革命政治理論學習是新民主主義教育政策的中心環節，所以必須加強與改進目前的政治課：甲、加強教委會的領導，交流各班教學經驗，統一各班進度，不使自流；乙、學習小組下應分為若干互助小組，以保證自學與進行互助，通常以不超過五人為原則；丙、學習小組討論時，理論要聯繫實際，尤其要聯繫自己的思想，並且要配合一些實際問題來討論，如中蘇問題、政府各項政策等，要多暴露自己的思想，並好好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丁、大班學習形式應適當運用，如討論問題應求集中，啓發報告中解答問題部份應增加

（下接第三十一頁）

記上海解放後肅清特務、强盜、竊盜以及救火的工作

曹錫珍

一、上海的治安問題

上海的治安，一向是地方當局焦慮的中心。帝國主義統治時代如此，日、偽、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代亦如此。祗有在人民政府接管八個多月以後，上海的治安工作才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上海治安所以成爲問題，不在它是一個華洋雜處擁有六百萬屬大人口的大都市，而是六百萬人之中，幾乎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即一百萬人是沒有正當職業的。在這一百萬沒有職業的人群裏，就包括相當數字的違犯法律、擾亂治安的不良份子。其中有專靠敲詐勒索爲生的地痞流氓，有以刼竊爲生的强盜與小偷、扒手，有以乞食爲業的乞丐和難民；蔣匪帮崩潰之後，更留下許多散兵遊勇、槍支彈葯、與怙惡不悛的特務。這樣，就愈加加深了上海治安底複雜性，使那批初自解放區來上海接管與負責治安工作的人員，面對着這棘手異常的工作環境，格外感到困難。

別的不說，且說對付盜案吧。初來上海的，對盜匪的偵緝、搜捕、審訊，當然說不上經驗；就是接到盜案的報告之後，要馳往出事地點，對付那些陌生的路名和里弄名字，就得用「地圖」、「新舊路名對照表」、「里弄所在表」來幫忙。如此這般之後，至少化掉幾分鐘，再趕到出事地點，强盜早已完成「任務」，安然「撤退」了。

儘管工作環境是如此的艱困，可是，解放八個月後的上海，在治安方面，却換上了一副嶄新的面貌。國民黨特務，基本上已經大體肅清了；盜匪與火警已日漸減少；人民的生活獲得了安全的保障。對於遊民、流氓、扒竊和乞丐等收容與改造，本刊上期已有通信詳盡報道，記者現在就解放以後七個月中上海人民政府如何和國民黨特務、盜匪、竊盜、火災鬥爭的輝煌成果，簡略報導如左：

二、肅特工作

上海人民政府，對潛伏本市，企圖陰謀危害革命秩序的蔣匪帮殘餘特務份子，本『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既定政策與方針，積極進行肅清和進剿的工作，以維社會治安。治安當局在肅清特務工作的具體執行過程中，堅决進行了中央既定政策。對少數首惡份子，進行昭彰而甘心與人民爲敵者，堅决加以鎭壓，嚴厲懲處。如對武裝潛伏、僞造人民幣的艾中孚（戰犯白匪崇禧副官），李星字（僞蘇吉安邊區挺進第三路少將）、丁兆成、蔡伯鈞、施子良、周勝官等六名特務，曾殺害解放軍多名的武裝特務「長江縱隊」首惡份子黃志英、徐錫昌、朱國範、江山、朱鼎鑾、盧建民、黃連寶等七名，先後予以鎗決。而對脅從份子，凡願自首悔過，立功贖罪者，均酌情寬大處理；使一般過去受蔣匪帮欺騙蒙蔽的脅從者，有及時悔過自新的機會。如於去年十月七日，公安總局就將馬霍元、孫阿狗、陳志炎等四十三名脅從特務份子，集體釋放。

根據淞滬警備司令部發表的材料，在從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底這七個月之間，由於逐步掌握了軍政集合、軍民聯系、寬嚴並濟等剿匪肅特的方針，全體指戰員積極主動進行圍剿追捕，和廣大群衆的協助，已獲得顯著成績，根據七個月不甚完整的材料（缺某軍十二月份戰績）可以分述如下：

（一）剿滅與破獲大小特務案件共四三二起，計捕獲匪特「治安軍總副司令」、「縱隊長」、「支隊長」以下二、二七三名。在政治攻勢下投誠來歸者五二名，另收容匪軍散兵游勇一八、五四一名，合計共二萬零八百餘名。

（二）繳獲輕重機鎗三一挺、長短槍七五槍支、小砲一三門、卡平一一支、槍彈七萬餘發、電台六架、報話機一部、電話機五部、印刷機一部、信管一、二〇〇只、汽車六輛、製造假黃金及銀元器具三部，另文件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三）殘餘特務之番號，計僞「淞滬中央反共救國軍」、「通海縱隊（又名長江縱隊第九支隊）」、「中央青年救國團江蘇分團」、「國民政府國防部特務處淞滬特務縱隊」、「淞江獨立旅騎兵大隊」、「第一綏靖區突擊縱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蘇浙皖挺進縱隊」，「江蘇省人民反共自衛軍川沙大隊」等數十種。

三、盜案減少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局電訊簿上，强盜案件的發生數字，佔着極大的比重。最多的時候，一日之間，竟發生十餘次之多。譬如去年六月份，一月之中，共發生一七三件，平均每日有五・七七件。

盜案爲什麼發生得這麼多呢？

（一）因爲國民黨匪軍狼狽敗退之後，大量散兵游勇，留散本市。這批壞蛋，就三五成群，結帮爲盜。（二）匪軍撤退時留下許多槍枝與彈藥輾轉流入慣盜手裏。（三）由於國民黨在上海解放之前，在美其名所謂「大赦」之下，將監獄內數千名竊盜犯，無條件予以「釋放」。這批竊盜，「釋放」之後，不知悔改，仍操「舊業」。治安當局所捕獲的許多竊盜犯，其中過去判過刑，坐過監獄的人，佔着相當的比例。（四）國民黨特務，參加盜帮。特務與强盜，在某種場合，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特務在上海經常與流氓、無賴、盜匪、相互勾結，混爲一體。如僞「江南反共救國軍」，「國防部二廳三八一一部」、「青年服務縱隊」等特務組織，同時也參加强盜組織。殺人刼貨，無所不爲。（四）在上海解放初期，軍管會派在治安機關裏的同志，整天忙於接管；同時，對盜匪情況，不甚熟悉，瞭解不够，捕盜經驗，亦較爲缺乏。而留用員警，起初顧慮太多，工作不够積極。一般盜匪，在這「青黃不接」，新舊不能十分密切合作的時期，大肆活躍。再加上解放初期，對舊有留用員警，沒有發給槍枝與子彈，盜匪遂益加猖獗，肆無忌憚，橫行不法。

因此，盜案累累，紀錄極高。去年六月份發生一七三件，七月份一三三件，八月份一〇〇件。九月份以後，盜匪案件，才逐漸減少。十月份發生八五件，十一月份六九件，十二月份五六件。

在去年七個月中，根據與盜案件發生的數字，搶刼方式及其活動特點，可以找出幾個特徵，劃分三個階段：（一）自解放（五月二十四日晚）到六月中旬，是盜匪猖獗時期。（二）自六月中旬到九月，經治安當局不斷打擊，呈現萎縮狀態。部份盜匪，轉向郊區活動，路刼增加；市內搶刼，方式轉變，大都採送禮、送信、或冒充軍管會同志，或僞造公安局紅色臂章，騙得開門，入內

搶劫，又稱「軟進硬出」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盜匪分散瓦解，由公開對壘方式轉爲潛伏隱蔽狀態。(三)十月至十二月，盜匪活動，已成個別現象。由一二人或二三人偶然湊合而成。沒有固定形式，亦不利用旅館等公共場所爲集議及分臟場所。市郊盜匪，相互竄擾。目標與對象，亦不固定，逢到就搶，搶過就溜。

在去年七個月中，強盜案的發生與破獲，有一個極爲顯明的特徵與對比。即：發生案件，每月減少；破案數字，則逐月增加。看了下面的數字，將更爲明顯與具體。

案件	發生數	破案數
六月	一七三	六二
七月	一二三	九八
八月	一〇〇	一二五
九月	一三一	一一二
十月	八五	一〇六
11月	六九	一〇一
12月	五六	六一
總計	七三七	六六五

【附註】表內八、十、十一、十二數月內破案數字超過發生數字，因爲包括過去的積案在內。

六月份的破案數字僅及發生數三分之一。自七月份起，即達百分之八十強。八月份之後，除九月份以外，每月破案數字，均超過發生數字。總計發生七三七件，破案六六五件；破案佔發生數的比例爲百分之九十點二。破案佔發生數達十分之九的成績，在我國治安史上，的確是空前的紀錄。國民黨匪幫統治上海的時代，強盜案破獲數佔發生數僅爲百分之三八·二八。相形之下，竟爲九〇·二比三八·二八，相差達一倍以上。

爲什麼共產黨領導下的治安機關能有如此優異的成績？這，首先應歸功於治安當局，正確掌握政府的政策。即對怙惡不悛的頑固份子，堅決實行鎮壓；對願意與知道悔改的，准其將功贖罪，給予自新機會。在這個原則之下，慣盜紛紛向政府自首，要求向人民戴功，供給線索，協助緝捕餘盜。因此，往往一案既破，接着就連破數案。(二)由於廣大群衆的合作，對盜匪自動檢舉，供給情報及予以監視。(三)解放軍駐滬部隊嚴密警戒、巡邏、以及各方面的配合。(四)最主要的，由於公安局領導方面，能根據盜匪活動具體情況的轉變，主動地靈活訂定各種不同的對策，給猖獗的強盜，予以打擊、分化，逐漸使盜匪無立足之地，減少發生數字，增加破案數字。去年六月至九月，利用「盜匪反盜匪」的策略，利用已捕獲到的盜匪，打入盜匪內部，使匪夥互不相信，分化瓦解，充當內線，領捉同黨。九月份以後，改用「以案件破案件」代替「以盜匪反盜匪」。「案件破案件」是「以盜匪反盜匪」這一方法的繼續與擴大，但並非單純的反覆，而是更向前提高一步。「以盜匪反盜匪」祇是抓住少數盜匪，要他們將功贖罪。「以案件破案件」是有計劃地從所有案件中蒐集情況與材料，整理研究，從一個案件，再從而連續破獲其他案件。如一月底破獲轟動全滬的李祖夔兇殺案便是通過這種策略而獲致成功的。

上海最近盜案很少發生，特別是冬防工作展開以後。至於要整個將盜匪肅清，一方面要靠治安當局繼續努力，偵緝搜捕；同時，在基本上，還待各方面促成減少強盜發生的因素。

四、竊案仍多

強盜案發生數每月下降，破案數則每月增加，已如上述；而偷竊案的發生，則每月增加。本年六月份發生一、二二三件，至十一月份，竟增加至二、二九五件。解放後七個月竊案的發生、破獲及破獲佔發生的百分比如左：

月份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百分比
六月	一、二二三	六〇二	四九·二二
七月	一、一一八	六〇二	五三·八五
八月	一、六四三	八八〇	五三·五六
九月	一、五六七	九一七	五八·五二
十月	一、五〇二	七五六	五〇·三三
11月	二、二九五	一、三二〇	五七·五二
12月	二、〇八二	一、二一二	五八·二一
合計	一一、四三〇	六、二八九	五五·〇二（平均）

強盜案破獲的百分比，從六月份的百分之三五·八四到十一月份的一四六·四，遠超過發生數一半左右，平均破獲佔發生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但竊案的破獲卻始終徘徊在百分之四十九到五十八之間。

這並非因爲竊案比盜案難破，而是因爲主觀上對竊案不夠重視，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重盜案不重竊案」的偏向，因而減少了破案的可能性。同時，因爲在審訊工作的過程裏，過份強調了「教育釋放」這原則，予竊犯有空子可鑽，滋長了他們的活動。過份的寬大，反而助長了竊案的猖獗性。

竊案發生的數字雖然逐月增加，破獲數也不及盜案，而比起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上海的時候，對偷竊案根本置之不理，則相差又何啻天壤？

五、火警減少

有人這樣說過：盜案與竊案發生的結果，祇是財物所有權的轉移；而火警一旦發生，所有財物就都化爲烏有了。這話雖然不免有寄沉痛於幽默之感，但考之實際，卻也盡然。

在解放以前，上海不但火警頻繁，而且大火累累。如一九四七年農曆元旦武定路大火，同年四月九日茂昌堆棧大火，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河南路衆務堆棧大火，損失浩大，不可計數。

解放後七個月的火警，顯然減少得很多：

一九四九年	成災	未成災	虛警	總計
六月	一四	四四	四	六二
七月	一一	七八	六	九五
八月	八	六二	九	七九
九月	一七	三九	二	五八
十月	一六	七一	六	九三
十一月	七	三三	四	四四
十二月	一一	三三	四	四八
合計	八四	三六〇	三五	四七九

國民黨統治時代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六月份至十二月份逐月火警數字如下：

月份	1946	1947	1948
六月	32	82	124
七月	76	83	98
八月	101	67	102
九月	85	91	78
十月	103	99	109
11月	123	81	103
12月	114	83	95
合計	674	586	709

兩相對照，國民黨統治時代的火警，顯然較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管理下多得多了。一般說來，十一月份是火警發生最多的月份。一九四六年發生一二三次，四七年八一次，四八年一〇三次，四九年呢？僅四十四次。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十一月份平均發生一〇四次，與四十四次相比，相差幾達二·四倍。

去年發生火警最多的是七、十兩月。七月份九十五次，因爲受颱風影響，走電起火者達四十九次；但全月成災者僅十一次，七十八次均未成災。十月份火警九十三次，成災僅十六次。而在這成災的十六次火警之中，大部份又是國民黨匪機投擲炸彈的結果。

解放後火警數字急劇減少，並不是沒有原因的：❶由於人民革命秩序迅速建立與日益鞏固，治安當局全體工作同志努力，使匪特等無從破壞與縱火。❷各公私企業機構、工廠、倉庫職工，紛紛組織消防隊(或糾察隊)；同時，里弄組織加強，如餘姚路等處住戶，先後成立群衆性的救火組織。❸晝夜生活的人日漸減少，無形中消滅了促成了火警發生的因素(過去火災大部份發生於晚間)。❹積極消防工作加強。管理與檢查危險物品工作，發生極大作用。取締違章建築物，也直接促使火警事件減少發生的機會。

解放以後的蘭州

觀察特約記者

蘭州市的解放，在整個大西北的解放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人民解放軍一野部隊于去年八月廿六日解放蘭州後，靈活地運用了迂迴戰術，一面佔據了蘭州的橋頭堡陣地，一面進軍永靖，經化隆入青海，截斷青馬匪的退路，待後者佈署完竣，即由蘭州渡越黃河天險，向青海正面施以壓力，青馬匪的老巢西寧，便在九月五日解放。解放軍爲爭取時機，曾徒步超越拔海五千九百公尺的祁連山（在寰源以北），披荊斬棘，迎風冒雪地星夜進軍，卒於九月廿五日解放了河西重鎮的酒泉，保全了人民祖國財產玉門油礦的完整，使河西走廊的匪軍不得不繳械投誠。與此同時，寧馬部隊也于九月廿三日接受和平條件，脫離反動統治集團；次日新疆也樹起起義之旗。在短短兩個月內，使大西北人民整個的擺脫了血腥統治，獲得翻身。盤踞西北多年的封建軍閥青馬匪步芳、寧馬匪鴻逵、甘馬匪繼援及其爪牙們，包紮了西北民脂民膏積成的細軟，搭乘陳納德的飛機十三架，高飛遠走，逃到香港、台北去。但人民是不會放過他們的，任他們逃到天涯海角，亦必遭受到人民的公審，血腥的債，還需要血來償還！

蘭州市是西北政治的中心，經濟的樞紐，在軍閥反動派的長期統治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和青馬匪的交相壓搾，百業蕭條，民不聊生。解放後，由于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適當的把握了政策，在短短的四個月以來，接管了國民黨反動派所轄的交通、郵電、文化、教育、新聞、衛生、農牧、水利及官僚資本所辦的工廠、企業二一百五十多個單位，沒收了戰犯及首要反革命份子在蘭州的產業，對所接管的單位，採取即時復工、復業和復課，使其迅速轉向爲人民服務。

恢復發展生產

蘭州解放後，軍管會對公營工廠、企業及社會公用事業，採取自上而下，原封不動，逐漸改革的方針，一面進行接管，一面迅速恢復生產和業務；對原來公私合辦的工企，只接管官股，保護私人權益。像甘肅貿易公司的私人股份，已公告發還。由于領導上堅決執行以上的方針，同時依靠職工組織清點委員會，所以使接管工作的進行，極爲順利。各公營工廠、企業，除甘肅機器廠因遭馬匪搬移破壞未能復工外，由于解放後數日內復工和復業。更由於領導上重視和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把生產運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十一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時，西北毛紡織廠，蘭州毛紡織廠等廠，發起生產競賽，並有蘭州麵粉廠、軍粉廠等廠熱烈響應，競賽結果，產量倍增，質量也有提高，如西北毛紡織廠在解放前每日一台機最高生產紀錄爲十七公尺，現在則由工人姚煥章創造了三十九公尺的最高紀錄，較前提高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工人蔣志榮的打牙輪，打梢子眼，自做鑽頭，十分鐘內完成了從前一小時的工作，在競賽中職工均發揮了勞動熱忱，並在現有基礎上開展了此後的生產工作。

整頓生產組織

雖然由于職工的階級覺悟提高，發揮了忘我的勞動熱忱，把生產運動向前推動一步，但敵偽遺下的機構臃雜，冗員過多的官僚組織，則大大妨礙了工廠的企業化。爲了恢復和發展生產，公營企業的領導上就在工人階級覺悟提高的基礎上進行整頓生產組織，使其眞正走向企業化。並有重點的先在蘭州毛織廠、麵粉廠、電廠進行試辦，以便吸取經驗，推動一面。據初步整頓的結果，原來臃雜的機構比較精簡了：如毛織廠過去由經理到工人是七層組織，現在簡化爲五層。冗員減少了：如麵粉廠職工人數較前減少了百分之廿九點零九；且其中職員比重較大，如毛織廠職員減去百分之四十七。因此，就初步健全了組織，改善了管理和減低了成本，而給恢復和發展生產創造了條件。

合理的工資制度是發展生產的中心環節，但因問題較爲複雜，爲了眞正達到科學合理，工資研究委員會正在召集各廠職工代表，進行專門研究，先解決技術標準問題，大致求全市的統一；各工廠和各企業機構，也都組織了工資評議委員會，民主具體的進行工資評議工作。

爲解決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動力、燃料問題，一千瓩的電機現已興竣工供電；企業處組織了資源勘查第一隊，到阿干鎮、山漿等煤礦廠調查煤的蘊藏量並探勘地質，準備實行礦業管理。這次還發現大量的石灰石，可以燒水泥，正在化驗中；爲解決建設中的需要，計劃設立日產二十五噸到三十噸的水泥廠。

爲解決新聞印刷用紙，日產十五令到廿五令的造紙廠正在加工建設中，下月即可出紙。

私營工業復蘇

各私營工廠、企業和手工業，因爲解放前遭到馬匪的摧殘和掠奪，解放後有的無力經營，有的袖手觀望，皆有停頓和歇業的現象。但在軍管會的大力扶助下，貸給生產、運銷貸款及收購成品，已漸漸的復蘇。據初步調查，麵粉、紡織、機器等工業恢復和新增共八十家（是自解放後到十二月十四日的統計），其中僅磚瓦石灰業因季節和特殊情況而停業十家。由於工業得到扶助，已將游資逐漸吸收到工業生產中來，而商業資本也有轉向生產的趨勢（如本市十幾家金店銀樓，已轉業甜菜製糖等生產）。

爲了發展生產，依據勞資兩利的原則，適當處理了勞資糾紛案廿七件，並會同市總工會勞委會協助衛生業（浴池、理髮）勞資雙方清理過去的工資，訂立集體合同。

金融貿易一斑

蘭州解放初期，因戰事才結束，人心未定，大軍雲集，供不應求，一部份商人對人民幣尚有疑慮，對政府工商業政策尚不了解，而不敢開門售貨。那時支前運輸繁忙，貿易公司的物資尚不能運到，城鄉物資也不可能交流，再加上投機商人和銀元販子的搗亂，金融一度波動。以後經各方面對人民幣及工商業政策的宣傳，貿易公司又設立了四個門市部，供給日用必需品，調劑市場物價，並建立了城鄉貿易關係，銀行相繼與各大城市通匯，發展了內外物資交流，調節了人民幣在市場的流通量，所以很快的建立了人民幣市場，相當的保持物價平穩。十一月份，因全國性的物價上漲，蘭市也一度受到波及，銀元自十一月十五日禁止流通後，還在暗中猖獗，現在政府除加緊取締外，還呼籲人民造成一個廣泛的拒用銀元運動，以期根絕流通。

文教逐步改革

蘭州解放後，各學校均暫維原狀，迅速復課，逐漸改革。現在除私立育才商校和三所小學因經費無着無法開學外，總計全市開學的有八十六所公私立大、中、小學，實際到校上課的學生達二萬六千五百九十餘名，佔解放前全市學生總數三萬二千一百四十餘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七三，其餘未到校的學生，絕大多數加入了人民解放軍，考入了革命的各種幹部學校和文工團，參加了實際鬥爭和工作。各校師生

並在軍管會的幫助和領導下，組織政治學習，進行校務改革，參加社會活動，寒假期間，還將深入農村工作，一切開始呈現新的氣象。此外，成立人民革命大學一、二部，現有學員一千七百多名（其中三分之二是舊公教人員）；為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成立的藏民學校，有學員百餘名，現已改為革大三部；在企業處領導之下，還成立了職工學校，訓練各工廠各企業所裁減而堪造就的人員，培養新的幹部。

軍管會接收了反動派辦的四個報社，一個通訊社，一個廣播電台，六個印刷廠之後，立即用以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和供給廣大人民新的文化食糧。蘭州解放的第二天，便出版了「新聞簡報」（八開），六天之後，「甘肅日報」（對開）發刊，新華社蘭州分社和蘭州人民廣播電台，同時發稿和播音。不久之前，另一家民營報「新經濟報」（四開）也創刊了。

在軍管會文化處的領導和扶助下，文協、美協相繼成立，工作一天天開展起來，現在正繪製新年畫及組織文藝下鄉工作。京劇已排演了「北京四十天」等新戲五六本，秦腔的研究會即將出一種期刊，說書的也正在改良中。此外，中蘇友協經常放映蘇聯的新影片，俄文夜校已開辦了兩個月，全市掀起學習俄文的熱潮。

建立革命秩序

軍管會從進城的第一天起，便十分注意建立城鄉革命秩序，堅決鎮壓土匪特務破壞活動，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人民公安機關對群眾進行過一些實際生動的教育，使群眾從認識被害親友屍體和追悼遇難烈士的具體事實中，進一步認清了特務匪徒的猙獰面目，提高了群眾的警覺，自動的建立了肅特組織。由於群眾的檢舉和政府寬大政策的感召，有四百四十六名特務份子向軍管會登記和投案，交出證件、武器、電台、密碼、文件和組織。四月來發生的十二件土匪案，已破獲五案；一百七十四件盜案中，破獲了七十九案，目前已結合群眾，加緊冬防，並在現有的基礎上逐漸健全各級公安組織，運用群眾的力量，來保障群眾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市民踴躍支前

蘭州解放之初，軍管會和市政府便組織了人力物力支援前線（那時青海、寧夏、新疆等省及河西走廊甘肅南部各縣尚未解放），曾動員了人工八千三百四十個，牲畜三千八百六十三頭，卡車二百餘輛，大車三百廿七輛，幫助軍隊組織運輸；動員一千九百個人工搶修黃河鐵橋（馬匪潰退時將鐵橋焚毀），一萬五千個人工修築飛機場。工農商各界在合理負擔下，經過民主評議，農民負擔了公糧九千市斤，工商業秋季營業稅，營利所得稅負擔了人民幣十二億元。此外還完成軍鞋近二萬雙，這種種事實，充分表現了各界人民對解放軍的熱情擁戴與積極支援。

群眾組織起來

蘭州解放四月來，能夠順利地完成各項軍管任務，最基本的原因是結合了全市各界各民族的人民，在群眾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截至去年年底止，全市已有三十四個工廠成立了工會籌委會，七千一百零八個職工中入會的已有三千零七十八人；全市三十七個鄉，已成立農會廿三個，農民小組二百零八個，會員一千五百餘人，並已建立了三個區農會；廿一個中等以上學校已有廿個成立了正式學生會，並召開了全市學生代表會，成立了市學聯；工商界已改組了五十四個同業公會，組織了二百六十八個小組；而婦女組織也在健全擴展中；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已召開過兩次，每次都有極大的成就。

各民族大團結

蘭州是一個多民族的城市，所以軍管會很重視少數民族工作。解放以來，由於正確的執行了共產黨少數民族政策，及各少數民族人民的覺悟，他們都積極的參加了各項工作。回族同胞積極協助軍管會處理馬匪軍逃散與遺棄在蘭州的回民散兵游勇和傷俘，並組織了赴青海、寧夏的和平代表團，及到洮、岷、和、康四縣去的宣慰團。維吾爾族同胞也對人民解放軍貢獻了許多關于新疆問題的材料和意見，並組織了工作隊隨解放軍進入新疆工作。藏族同胞組織藏民問題研究班，學習革命的政策和理論，並組織了招生團赴藏區招收藏民學生。蒙族同胞在蘭州的人數雖不多，但也積極參加了學習和宣傳工作。蘭州各少數民族人民所做的這些事情，對西北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業有很大的貢獻！

甘肅省人民政府已于元月八日宣告成立，軍管同時結束，總結這四個月來的軍管工作，已給將來的建設打好基礎，使蘭州市能穩步的建設成一個秩序安定、生產發達、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城市，所以說蘭州市在軍管期的成就是圓滿的，勝利的！

（一月九日寄自蘭州）

（上接第二十八頁）時間，報告要避免背書與不入題，要多舉實例等。

四、關于群眾組織應如何保證學習任務完成方面：甲、群眾組織應與行政緊密聯繫，協助行政，廣泛搜集群眾意見，制定學習計劃，並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保證學習計劃完成。其他福利康樂等工作，不得妨礙學習計劃的進行，而應配合學習，圍繞着學習而展開。乙、為了加強同學在自學基礎上的集體學習，減少時間的浪費，提高學習的效率，各系級政治課與其他一般課程的學習小組原則上應結合為一。同學在學習小組內應組織互助小組，發揮小組的作用，豐富小組中學習與生活的內容。丙、群眾組織應領導群眾制定作息時間，使生活規律化，保證有充分的學習時間，同時應加強本校及其他學校學習經驗的交流，按實際需要舉辦演講會、座談會等以提高學習情緒。

五、關于師生聯繫方面：師生聯系與教學不可分離，良好的師生聯繫可促進教學相長，產生優良的教學成績。但師生聯繫是多方面的，師生雙方要同時爭取主動，才能產生良好的結果。因此，首先應通過政治學習，在思想上與政治認識上取得一致，在教學上師長應重視並多方面採納同學的意見，確立群眾觀點；同學亦應信賴師長，提供積極性的建議，師長並應多多參加同學各種康樂活動及其他集體活動，在生活上與同學打成一片。

總括說來，北大在這一年來，尤其是這一學期以來的新民主主義學習是有成績的，的確把學習從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了一步。當然有好些地方還需要全校各方面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在全國各學校正展開新民主主義學習的過程中，是可以吸取北大的一些經驗來致力于改造工作，以共同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的。

（上接第三十六頁）完成國家與人民的重託。」

我發覺自己顯然不是屬於「第一種」，積極努力，生龍活虎，能在實際工作中克服困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完成任務，並創造新的經驗的工作者」；而是：「工作條件順利時，也可做出若干成績，但遇到困難，便缺乏勇氣，不是挺身而出，而是束手無策，或知難而退。他們也有抽象把工作搞好的念頭，但是遇到新問題，辦法很少。其工作方法經常是一般的、抽象的，而不會具體鑽研問題，具體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一般的服從組織，但也盤算個人利益，在不「如意」時，就不能踏踏實實、專心研究事業。」我感到這第二類幹部於我有着很近的距離！

「榮譽是屬於誰的？」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是屬於人民大眾的，也是屬於「第一種」的工作者的。

我要在任何崗位上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能力獻給人民事業，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要向這一類型的幹部們看齊！

（原載西安「群眾日報」）

記蘇聯勞動英雄烏巴伊杜拉耶娃的談話

于夫

蘇聯最高蘇維埃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米哈爾·烏巴伊杜拉耶娃同志，也是列寧勳章、金星獎章、勝利勳章、勞動優越獎章的獲得者，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時，代表烏茲別克共和國出席來京，在大會場的招待室裏，和中國記者們作了一小時多的談話，報告了她的英雄故事、幸福的生活、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下面是她的談話的節錄。

一九二三年，我生於塔什干，我家庭是貧農階級。我父親在一九一七年時是農夫，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參加了集體農莊的工作。

我在一九四二年於七年制的中學畢業，那年正是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蘇聯、斯大林格勒大戰激烈的時候。集體農莊中許多男人都上了火線，我感到我有權利獻身給祖國，便向父親所在的集體農莊上了呈文，要求分派工作。一九四三年，集體農莊吸收我作莊員，當時我是計算工時、成品的工作，並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四四年我又再度請求，表示我的計算工作老年人也可以作，我年輕願作別的工作。

我組織了勞動小組，向農莊要求了五海格脫（俄畝，相當中國十六畝）的耕地，和另外三個共青團員種上了蔬菜，我是小組的領導人，並起了帶頭作用，當年的收穫量便超過了原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一九四五年蘇聯產糖區烏克蘭的糖廠因戰爭關係遷到塔什干，製糖的原料糖蘿蔔生產的任務，便落到我們的農莊上了。這年的生產計劃是每海格脫土地應收穫十六噸糖蘿蔔，可是我們這四人小組為了支援前線，發誓保證收穫五十噸，為了完成這個誓言，我們閱讀了許多農業技術和有關種植糖蘿蔔的書籍，並隨時請教農莊的技師，平日我們更以五倍勤勞的耕種、灌溉、施肥的勞動精神來經營，到了年底，我們每海格脫生產了五十五噸，超過規定生產量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七。蘇聯最高蘇維埃為了我的優良成績，頒發給我勞動成績優越獎章，在戰勝德國法西斯後，又給了我勝利勳章。

一九四六年，我們又訂了新的生產計劃，要提高到每海格脫年產八十噸，我又向蘇聯中亞細亞各共和國提出競賽。在這一年我們把勞動方法與技術也提高了三倍，結果我們達到了年產八十一噸的紀錄，超過了規定產量的百分之四百八十三。為了我的努力，蘇聯最高蘇維埃便頒給我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並獎發了列寧勳章、金星獎章各一枚。也使我成為烏茲別克共和國第一個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光榮人物。到現在為止，烏茲別克已有五十多個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了，但是以種糖蘿蔔而獲此稱號的，還只有我自己。

一九四七年，集體農莊分派給我十五海格脫的新土地，和十個新人。在我的組織領導下，分成三組去努力生產，這一年我們又超過生產量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同年，我成為共產黨候補黨員。

我曾被邀到莫斯科，參加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紀念盛典，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頒給我勞動勳章和有克里姆林宮及莫斯科始建者尤利·多爾戈魯基像的莫斯科八百週年紀念章。

從莫斯科回來，我感到責任更重大了，為了對祖國有更大的貢獻，對人民能更多的服務，我便入了塔什干農業學校。這學校須十年制的中學畢業生才能進去，我因為是七年制中學畢業，須讀預科一年，可是由於我的努力，預科的一年功課，我三個月便完成而進入了正科。現在我正是二年級學生，我第一年的成績是優材生。

我現在是塔什干農業學院五百個共青團員的書記，烏茲別克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共青團塔什干州的委員會委員，共青團塔什干區委會委員，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我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還要到各地方作農業的報告。我參加二十五個團體，我的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跑來跑去。我的農莊中的工作，由我父親接替，我妹妹也成了三人小組的組長。

我的生活情形，以一九四六年來說，那年我收入了一萬三千盧布，這筆錢可以買二頭最好的耕牛，此外，我並分得了八百一十公斤的砂糖，一百二十四公尺的布，三十八公斤的肥皂，十四公斤的茶，十二公斤的油脂，我們這十口人的家庭中，除了父親妹妹還可掙錢外，我這批所得已足夠使我的家庭過得富裕和幸福了。

集體農莊並分給了我三百平方公尺的實驗農業的土地，我在那片土地上種了蘋果、葡萄、桃、杏、棉花、土豆、糖蘿蔔。

在我的接種試驗下，我研究出九種不同的棉子，可產九種棉花，現在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種類最多的。其中一種棉花是天藍色，和你們這間屋子窗帷的顏色一樣。我種的土豆又黃又甜。我種的葡萄可以接種出十三種，我能讓一株產三百七十公斤。我種的蘋果，利用各式各樣的接種研究，在一株蘋果樹上可生出四種不同的蘋果，並能讓那些蘋果樹，分別在一年四季中輪流收穫，使我們一年中任何節季都可吃到樹上摘下的新鮮蘋果。

另外我還對菜蔬、洋葱、紅蘿蔔、白菜都有經驗，除了我是棉業專家外，我還是園藝專家，我能把一棵即將枯死的樹木，用藥把它治活。我對不同的種子種植在不同地區的土地上，生長出什麼來，特別有興趣，我很希望能從中國帶些種子回去研究，我要求你們（指往訪的記者們）能幫我收集一些種子。

至於我們在集體農莊的生活，我們莊上有電影院、醫院、產科醫院、收發電台；我們的十人小組中，有自己的休息處所，那裏面有臥室、廚房等等，中午我們可以午睡，夏天的中午我們可以洗澡。莊上有托兒所，白天把孩子托在那裏，晚上把孩子帶回家。

我們生活的這樣好，要吃、吃得飽，要穿、穿得夠，我們不知還要什麼？我們只有想法把工作作好，生產提高。

今天我們過得是多麼幸福美滿！想想過去是什麼樣子？在十月革命前，我們烏茲別克的婦女走在街上，還得帶面紗，且不准斜視，不能去電影院，十四歲便須賣給丈夫。現在，我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不但獲得了男女平權，和工作的保障，也獲得幸福與美滿！今天，我們更走上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了。

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現在還年輕，可是你們有着和列寧斯大林一樣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你們會把國家很快的建立起來，發展起來的。我們蘇聯人民都這樣企望着。

最後，讓我再請求你們，請幫忙我收集一些種子！

在這裏讓我以蘇聯最高蘇維埃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名義，向你們致敬！我代表烏茲別克共和國的人民和塔什干農業學院的學生，祝賀新中國的建設成功。並預祝你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生活得愉快和幸福！

學習了「榮譽是屬於誰的？」以後

觀察文摘

給高崗同志

王文鐸

高崗同志：

我是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滿身帶着强烈的驕傲與清高，我處處願意出浪頭，顯自已，等不能顯示自己的時候，便對革命工作發生怠惰或厭煩。講起革命理論來，我可以滔滔不絕的說上一大套，但問起實際工作來，我的貢獻却是絕無僅有的。一年裏我也有過抽象的把工作搞好的念頭，來克服自己的華而不實。但這種個人名譽和地位的思想常在我心中，就不可能使我進步，因爲有了它，經常使我鬧情緒，鬧不團結。對於比我好的幹部，我不服氣，處處想打擊他，對於不如我的幹部，更瞧不起他來，這樣便使我脫離了群衆。我又一想，孤立也罷，自己搞好了工作也顯得我更光榮。那知道工作太多，問題也很複雜，大小事我都想插進去一脚，結果自己實在辦不了啦，但又不願意交給別人，因爲這樣便顯出自己辦不了，够多丟人呢？這時我便鬧起情緒來，怨別人不進步不主動幫我工作。這樣一生氣，自己就不管甚麼革命工作了，撒手不管落得清閑，使工作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看到了您在東北幹部會上演講的『榮譽是屬於誰的』，我在夜深人靜的燈下讀完了頭一遍，反省了我的已往，我滿臉紅漲，心頭亂跳。我又靜心讀了第二遍，它像一付毒藥走入了我的血液裏。那一夜我沒有很好的睡穩了覺，個人的名譽、地位及享受思想向着您的報告進行掙扎與反抗，經過了反覆的思想鬥爭，但結果是眞理戰勝了。『榮譽是屬於誰的』這篇東西就從那夜起在我心裏扎下了根。

第二天，我把它抄寫在日記本上，帶在身邊，一有空閑，我就拿出來讀它，一個多月裏我記不清讀了多少遍，但很奇怪，它是百讀不厭的。

在我讀到那篇文件以後，我有了膽量在大衆面前承認錯誤，我覺得這是最光榮的最快樂的；我改變了過去瞧不起人的個人英雄主義態度與思想，覺得在革命工作面前，鬧不團結和獨立性，是極端可恥的。我在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以後，把責任分到每個同志的肩上，他們很高興的承担起來，在這十二月裏我們的工作效率比前幾個月有了顯著的增高，同時每個同志的心情都是非常歡悅的，我不再感到同志們不進步不主動了，反而覺得我以前思想的可鄙，我深深的認識到在我的個人主義下大家不能發揮各人的力量。現在我看到了大家的偉大力量，光榮應該是大家的， 我追求個人榮譽的結果，只是損害了革命利益。

前幾天我主持了女工們的年終考試，在這一年裏，我對女工們的學習是比較負責的（但也有時犯冷熱病）。在我寫完了榜的時候，從側面聽到個別成績壞的女工反映說我考試不公平，並洩露試題給某個工人看。當時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大波動，想着『自己費力不討好，以後不管就得了。』這種個人自尊心剛要翻上來，我頓時想起了您的話，立刻壓制住不滿的情緒，經過了一個深夜的檢討，我發現自己在後半年裏對女工們的學習是冷淡的，到考試時候急抓，這顯然是不負責任的錯誤作風。再一個就是評分

「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名詞有什麼區別？

『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名詞是有區別的。斯大林『論憲法草案』裏說：『例如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吧，人們往往照舊稱它爲無產階級。但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就是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資產階級剝削着無產階級那個經濟體系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階級。而在我國，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那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力量的國家了。於是，已沒有剝削工人的資本家階級了。於是，我國工人階級就不僅沒有被剝削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反而與全體人民一起，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它佔有着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全被消滅——於是，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都完全被排除了。既然如此，難道還可以把我國工人階級稱爲無產階級麼？很明顯的，這是不可以的。』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情形和社會主義的蘇聯有不同的地方。剝削工人的資產階級並未消滅，而且還要容許他們存在和發展，私營企業中的工人們在現在和今後一個時期內仍將受到資本家的剝削。但是這種工人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也不相同。因爲在中國，工人階級（包括私營企業中的工人在內）是居於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則居於奴隸地位。至於國營企業中的工人，情形就更不同了。在國營企業中做工的工人，其所生產出來的價值完全歸人民民主的國家和工人自己所有，而不受資本家階級的剝削。把這部分工人仍舊稱爲無產者，就完全不適宜了。所以，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其後的文件中，把過去中國的無產階級改稱爲工人階級。當然，這不是說無論在什麼時候，『無產階級』這個名詞都不能適用。例如在說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係時，就仍然應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對稱。（一月二十七日東北日報）

在無階級社會中的社會發展原動力是什麼？

問

根據近來一些文件上（如『學習』雜誌）講：將來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高度和諧；但在『歷史唯物論』上册（米丁著，沈志遠譯，生活書店發行）第二章第六節（一八六頁）中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每一歷史的生產方式的原動力。這種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中，不僅存在於階級社會，亦且存在於無階級社會中。』不知這幾句話應如何了解，是否和前一說法矛盾？將來無階級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

答

蘇聯的社會生產關係，建築在生產手段社會公有的基礎上，人們可以按照自

數時自己作主，沒有經過民主討論。有了這兩個缺點，無怪女工們猜疑自己。第二天早晨開工前，我對全體女工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並保證今後要對學習負責。這時突然有四五個女工走出來伏在我的面前一面痛哭，一面述說自己反映的不正確，不應使我傷心。她們要求我繼續對學習負責，恐怕我一生氣不管了，就誤她們的學習。全體女工們的眼圈都紅了，她們的進取心和誠懇的精神像一股偉大的熱流，感動的我也掉下淚來了。

高崗同志！沒有『榮譽是屬於誰的』這篇演詞對我的幫助，我是不會和工人們一步步靠攏的。

國營廊坊興花廠　王文鐸　（原載『天津日報』）

要向前看

方　非

讀了高崗同志『榮譽是屬於誰的？』以後，很多同志都作了自我檢討，覺得這篇文章給與我們的啓發與教育是很大的。

但同時也聽到過這樣的話：『我總不是第三種人吧！』這意思就是說：我雖然不是第一種人，但還不至於落到第三種人的程度。頗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聊以自慰的情緒。這恰恰表現出『安於一時一地的微小成就』和『滿於現狀』的思想。我說：『我一定要積極努力，爭取作第一種人』，而拿自己和第三種人來比，這是向落後看齊，我是向前看。這種思想往往會促使我們安臥於極小的工作成績之上，看不到正在形成和發展着的缺點，麻痺我們對錯誤的發掘與檢討。『一點錯誤算什麼，別人犯的還多着呢！』當自己檢討到某些工作做得不好時，隨後又馬上加上說：『某某地方也是這樣，甚至比我們更壞呢。』這樣來寬慰自己，以求得別人的諒解和包涵。當別的同志眞正嚴肅地提出批評時，則又覺得滿肚子委屈，強調客觀困難，條件是如何如何的不好，這是『必然』的現象，性急是辦不好事的……。自己裝着很冷靜，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慢慢來』的樣子；甚至有時還替別人扣上『左傾幼稚病』和『主觀主義』的大帽子。這種『覺得自己雖不能作得最好，但總不是最壞』的想法，會使我們對工作採取敷衍塞責，簡單完成任務的保險態度，缺乏新中國建設者主人翁的精神，正如在高崗同志的報告裏所說的：沒有完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沒有進取性與創造性。

我們要知道第二種人並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實際上，一個人決不可能永遠維持『一般服從組織』，『按步就班』，『基本上還是好的』……或者是進步，或者是不進則退。革命形勢的發展是很快，要求我們所完成的工作也是無限的。如果我們保守，不求進步，不及時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與工作的水平，『不進則退』，各項正確的思想，就會在工作不順利時乘隙而入，尋找發展的地盤，腐蝕着原來純潔的部分。這時就不能不保証落入第三種人的泥坑了。錯誤思想在開始時總是微小的，但當它不被及時制止和消滅而得到發展時，則會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

閱讀這篇文章，不僅要檢查我們的思想，看到自己的缺點，而更重要的是克服缺點，向第一種人看齊，建立和加強革命的新的事業精神，發揮革命英雄主義，努力完成和超過自己負担的任務。我們要向前看，不要向落後看齊。（原載北京『人民日報』）

站穩自己的工作崗位

雷麗珍

我的工作是管理圖書室的報紙、雜誌。在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我就抱定決心『一定把工作搞好，從工作中提高自己。』工作分配停當，等到工作稍爲輕鬆的時候，我又想：『以後的工作較輕閑，我可以趁機會多讀點書，充實充實自己吧』！打着如意算盤，所以一當有空，我就手不釋卷地拿着書報來看。

圖書室開放了，滿屋子裏都擠塞着人，捧着書想一字不漏地看下去的我，這時就有點放心不下了。『這麼多人在這裏閱讀，不留心把雜誌弄掉了或是損破了，豈不要我負責任！』我就不敢再專心貫注地看書了。同志們陸續散去，雜誌東一本西一本、七零八落地躺着，起先我還能拋開自己看的書來加以整理，但日子稍久，看到書剛擺好，同志們一個、兩個……地跑進來，東一翻西一翻又弄亂了，甚至弄爛了要我修理，就討厭起來，『眞麻煩！書也看不成了！』漸漸的認爲管圖書雜誌工作既瑣碎、對自己又無『益處』，於是對工作採取了『混』的態度，不管雜誌放得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理了是要亂的，不理也是要亂的。』將就將就算了。便利用工作時間來做點私事，作文章、寫信，或是看小說。

高崗同志的『榮譽是屬於誰的』在報上發表了，我深深地爲他的透澈分析所感動。是的，『任何一種革命崗位，任何一種革命工作，都是高貴的，不能說那一種是不重要的，因爲離開其他工作配合，任何工作都不能孤立地解決問題，每個革命同志，應該珍愛自己的崗位，站穩自己的崗位，積極地負責地把自己工作搞好。』在我參加工作的時候，我就說過『一定把工作搞好』，而現在呢？我不但沒有『把自己工作搞好』，反而鄙視這種『事務』工作

已的意識有計劃的生產，這創造了生產力和人類精神文化無限發展的條件。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否定了剝削關係的存在，保證勞動人民享用他自己的生產成果。因而每個勞動者都同樣關心於生產力的向前進展，故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道路上，是沒有對抗性的基本矛盾的，但這並不等於沒有矛盾。矛盾的對立統一，是任何事物運動的規律，社會主義社會亦存在着矛盾，但這種矛盾的克服，却是通過人們的自覺意識順利地完成。

如以斯達漢諾夫運動爲例，可以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克服矛盾的新方式。斯達漢諾夫運動打破了舊的過時的勞動生產率定額，創立了新的技術標準，這和依據原有的技術標準所預定的生產能力生產計劃相矛盾。這種矛盾的克服是預定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生產計劃的擴大，以適應此種業已提高的技術標準，這表示一種運動，一種進步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以至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是通過此種人類有意識的矛盾的克服方式來實現的。

這種克服矛盾的新方式，創造出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有力刺激，是無階級社會向前發展的偉大動力。

從發展法則的一般性上來說，任何社會都存在着內在矛盾，因而都辯證地發展着，根據這種一般原則，故長丁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一切歷史的生產方式的原動力，這種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中，不僅存在於階級社會，亦且存在於無階級社會。』

但這種矛盾在階級社會和無階級社會所表現的本質和內容却大有差別，一種是敵對的矛盾，另一種是非敵對的矛盾。列寧亦曾說：『敵對和矛盾絕不能混而爲一，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前者消失，後者依然存在』（列寧選集十一卷三五七頁）。階級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通過剝削階級對於既得利益的頑強的維護來表現。在一特定歷史階段，凝固的生產關係對於發展的生產力必然是一種桎梏，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間的矛盾是敵對的，因而矛盾亦祇可通過革命鬥爭來解決；但在無階級社會沒有敵對的矛盾，克服矛盾的方法亦不需要任何政治革命，因爲勞動人民自己統治着自己的關係，社會將隨新條件的出現而自覺地揚棄舊的，採取新的。新的克服矛盾的方式，表現爲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自覺的適應，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就是高度和諧。故「學習」雜誌上說：『什麼是將來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呢？首先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高度和諧。』（一月二十四日東北日報）

了。我沒有『珍愛自己的崗位，站穩自己的崗位。』我應該馬上糾正這種錯誤的工作態度，如高崗同志所說：『應該珍愛自己的崗位，站穩自己的崗位，積極地負責地把自己工作搞好。』

同志們不是都迫切的需要學習嗎？他們不是一有空就跑到圖書館來嗎？我這工作供給他們精神食糧是多麼重要。是的，任何一件工作，只要你從群衆的利益上來着想，你就會覺得你的工作重要了。現在我要向第一類幹部學習，我要想辦法把圖書雜誌管理好，不亂；而且還要想出各種制度來保證提高工作效率。（原載『江西日報』）

對於『榮譽』的新認識

吳世昌

讀了高崗同志的『榮譽是屬於誰的？』以後，就想起我從前對孫若愚同志談過的那些話來。

一天，我到他那裏去，向他說：『我連年教書，實在沒有趣味，而且是：「數十年不富，一年不教就窮。」請你代我找個別的工作吧！當年曾和我在一起教過書的同志們，現在都當了縣政府的幹部；而我還是舊我，眞是又慚愧又羨慕！』他冷淡地但很鄭重的指出我思想的錯誤，並勸我多看一些關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書籍。當時我覺得他太『不近人情』，我這樣請求他，他不但不替我介紹工作，反而用話來刺激我，大概他自己地位高了，瞧不起地位低的舊友了。不過他叫我多看書，總不算壞的，但我並沒有接受他的好意。日日夜夜總想我個露露頭角的工作，好讓別人來誇耀我。

正當沉溺在苦苦追求個人名位和物質享受的腐朽思想中不能自拔時，讀到了高崗同志的講詞，就像一個旅人在沙漠中飲了甘泉，滴滴涼澈心肺，馬上，一切煩燥都消逝了。原來『榮譽』是指在自己的崗位上把工作搞好，全心全意爲人民大衆打算。『地位』是人民給你的『責任』，『物質待遇』是人民根據你對建設事業貢獻的大小而付給你的適當的『酬勞』。我捫心自問，除了終日孜孜於個人的名利外，幾曾爲人民大衆的事業着想過？而偏偏又希望人民給我榮譽、地位、酬勞，這是多麼可恥啊！

以前的已經過去了，今後我一定努力學習，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自己、充實自己，站在自己崗位上爲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而努力。（原載『皖北日報』）

工作檢討

鄒再萍

在到『民大五部』工作以前，使我不能不考慮到那裏學員的文化程度與自己工作的能力。我想到助教這種工作，在我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頭炮是不好放的！於是，我假想在工作中可能碰到一些什麽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困難並得出成功的經驗。這麼一連串的假想，使我彷彿看到了工作在萌芽、生長、開花、結實，我感到美滿和幸福，這預期的工作勝利，鼓舞我大踏步地走上工作崗位。

最初我被派到十隊裏工作，據說是暫時的，隊部又分配我到分隊去，據說也是暫時的。顯然的，擺在眼前的工作與原先的預料有了職務上的不同，我心裏在當時的確奇怪，但我工作態度表面上還保持着鎭靜，而且還用很原則的話去說服那些對工作現狀不滿的同志。然而心裏卻老在想：『這算什麼助教？』偶然有同志喊我聲『助教』，我即回答以『助什麼教』，聲氣中多少流露着不平。這雖係一兩次，但也足以說明我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虛榮心怎樣在和革命工作矛盾着。同時也反映了我輕視革命工作中小螺絲釘的作用。

不久，我又被派到二隊與七隊領導同學們的一般學習，當時計劃如何將工作重心放在七隊，先搞好學習，再如何掌握與了解二隊一般的學習情況，以及怎樣和隊部及助理員同志建立正確關係，共同搞好工作。結果，我並沒有這樣去做。當我感到自己『沒有具體工作』、或碰到了『冷面孔』、『工作不協調』一些困難時，工作熱情就降低下來，或者將這種熱情轉到自學方面來，或者想等二期開始後再『從頭做起』。或想轉變一下環境，好再『從新做起』。這種『從頭做起』和『從新做起』的思想本質，便是不敢面對困難與克服困難的對革命意工想度。

當學員們開始檢討思想和鑑定工作後，我的思想再度掀起鬥爭的巨浪，我的確不能再讓工作情緒停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這一消極階段。那麼怎麼辦呢？我決定先革除殘留在思想上的個人主義，然後再鼓起勇氣，克服工作中所存的困難。儘管這種想法是經體驗而失敗過的，但我清楚這是由於主觀努力不夠。繼又決定：首先，有事自己多加研究，進而主動地多和隊上的負責同志接頭，多交換意見，抓緊隊務同志每個會議的參加機會，以便盡力爭取工作上做到『人不靠我，我去找人』。這麼一來，漸漸地糾正了我過去不敢面對困難，設法原諒自己的消極態度，從而使我體驗到，只要在工作中爭取主動，多研究分析，多和群衆商量，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群衆日報上，我讀到了高崗同志在東北幹部會上的講話『榮譽是屬於誰的？』以後，立刻感到內心的責備和不安。我接着檢討自己，有沒有『站穩自己的工作崗位，樹立對當前的革命事業的進取與鑽研精神，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智慧，發揚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兢兢業業，克服困難，（下接三十二頁）

什麽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問：『什麽叫半封建土地制？』

答：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三條原文爲『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你提出『什麽是半封建土地制』的提法是不恰當的，因爲在舊中國存在的——也就是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廢除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並立同存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兩種。

那麼，什麽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

在舊中國或在土地尚未實行徹底改革前，各地區的『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各地有多少，但按一情般況來說，大約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爲單位計算），而他們所佔有的土地，按一般情況，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主席：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農、貧農、僱農則只佔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說廣大農民處於無地或少地可耕的土地制度。正是這樣的土地分配也便決定了農村中土地使用是在嚴重的地租剝削下的（地租量約達正產物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耕作。

正是這種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便決定了、產生了農村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剝削。在這裏首先是地租，如鬱林二十六家佃農的全年支出與收入如下表：

這二十六個農家的全年支出平均數：

（一）生產資料	支出數目（單位元）
種籽	一九•二八
肥料	二二•七八
設備	五•一五
畜養	一九•六四
合計	六六•八五

（二）生活費用	支出數目（單位元）
家庭	一七七•七二
傭工	六•一四
合計	一八三•八六

這二十六個農家的全年農場收入平均數爲：二七〇•一四（元）

（見『近代中國地租概說』十頁陳伯達著）

從以上可看出農民從他們的農產物收入中，拖償生（下接第二十四頁）

每册售貳千元 （京）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期字五六號
經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八一號